



目 录

刊 首 语

- 3 赵 泓 / 循序渐进 精益求精——《俄罗斯研究》发行三十周年寄语

高端论坛：上海精神与上海合作组织

- 6 M·伊马纳利耶夫 / 上海合作组织：十年安全与合作之路
8 A·拉希德 / 成就巨大，前景灿烂
12 C·沙赫赖 / 建立促进上合组织繁荣发展的评估机制
15 Д·卢基扬采夫 / 推动上合组织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专题文稿：革命与俄国

- 18 A·梅杜舍夫斯基 / 20世纪初俄国革命历史编纂学的基本问题
48 邵丽英 / 叙述创新与问题转换——俄国“十月革命”再思考
78 E·普里马科夫 / 十月革命的历史是不能改写的
87 封 帅 / 观念、体制与领袖——阿齐·布朗视野中的俄罗斯转型

经 济

- 100 庄晓惠 / 从“转型性贫困者”的形成看俄罗斯转型期的制度及个体适应性问题
119 郭晓琼 / 俄罗斯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研究
135 胡 彦 辑 / 俄罗斯大事记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冯绍雷

副 主 编：陈大维（常务）

李敏焘

杨 成

刘 军

封面设计：王 洪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电话：021-62233816

021-62232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出版日期：2011年6月23日

俄羅斯研究

Оглавление

Чжао Хун

Шаг за шагом всё к большему совершенству—К 30-летию со дня первого выпуска журнала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3)

Муратбек Иманалиев

Шанхай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десятилетний путь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6)

Рашид Алимов

Великие достижения, яркие перспективы..... (8)

Шахрай Серг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оздание стимулирующего процвета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ШОС механизма оценки..... (12)

Лукьянцев Дмитрий

Продвижение гармоничного и устойчив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ШОС..... (15)

Медушевский А.Н

Основ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 русских революций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18)

Шао Лиин

Инновации в описании и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е вопросов—Переосмысление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в России..... (48)

Евгений Примаков

Историю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не перепишешь..... (78)

Фэн Шуай

Идеи, институты и лидеры—Вид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Арчи Брауном..... (87)

Чжуан Сяохуэй

Изучение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х проблем и вопросов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й адаптации в период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й в России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группы «бедняков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й» (100)

Го Сяоцун

Изучени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между промышленной структурой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м ростом в России..... (119)

俄羅斯研究

2011 年第 3 期 (双月刊)

Contents

Zhao Hong

Advancing Gradually and Striving For Perfection---Remarks at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Russian Studies*..... (3)

M. Imanaliev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Ten Years on Path of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6)

Rashid Alimov

Great Achievements, Splendid Prospects (8)

Sergey Mikhaylovich Shakhray

To Establish Evaluation System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12)

Dmitry Luk'yantsev

Promoting Harmoniou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15)

A.N.Medushevskii

Problems on Historiography of Russian Revolution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18)

Shao Liying

Narrative Innovation and Problem Transformation---Rethinking Russian "October Revolution" (48)

Yevgeny Primakov

The History of "October Revolution" could not be rewritten (78)

Feng Shuai

Ideas, Institutions and Leaders: Archie Brown's Perspectives on Russia's Transition..... (87)

Zhuang Xiaohui

On the System and Individual Adaptability in Russian Transition from the Aspect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Transitional Poor..... (100)

Guo Xiaoqiong

Study on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Russia..... (119)

刊首语

循序渐进 精益求精

——《俄罗斯研究》发行三十周年寄语

赵泓*

三十年前，亦即1981年，经教育部和中共上海市委批准，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合作创办的上海苏联东欧研究所成立了。这是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老领导陈沂同志和上海社科院以及华东师大的负责同志高瞻远瞩，基于高度的政治敏感性而作出的重要决策。当时，中苏之间由激烈的论战发展到国家关系的对峙和交恶已持续了20多年。许多人预测，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这种不正常的国家关系必将有所改变。但我们当时对苏联及其影响下的东欧各国都缺乏足够的了解和研究，因而在讨论确定上海苏联东欧研究所的办所宗旨时就提出“要立足本国、放眼世界，研究苏联、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对外关系、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理论和实践。”而研究成果需要有发表的园地，研究所也需要有自己的喉舌，发出自己的声音。为此，研究所在成立之初就决定要办一份自己的刊物，对这本刊物的要求是成为“了解苏联东欧的窗口，研究苏联东欧问题的园地。”由于中苏之间长期隔阂、封闭，所以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着重了解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现状，研究苏联及东欧各国的当代问题，故将刊物定名为《今日苏联东欧》。1981年6月，第一期《今日苏联东欧》出刊，这本没有任何装帧的“赤膊”杂志，距今已经有整整三十个年头了。由于当时尚未完全办妥正式出版手续，刊物全部赠阅，供与兄弟单位及有关部门交流之用。

1982年，《今日苏联东欧》在第5期上发了一个征订启事，称：“经上级批准，本刊自1983年起正式作为内部刊物发行，双月刊。除继续报道苏联东欧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动态、资料外，将增加篇幅，发表上述各个领域的研究文章和综述。每期十至十二万字。”这说明《今日苏联东欧》已经正式被批准为全国国际问题期刊中的一员了。经过精心的筹划准备，1983年，一本彩印封

* 赵泓，《今日前苏联东欧》和《今日东欧中亚》副主编。

面的正式刊物出版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今日苏联东欧》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各类稿件也纷至沓来。

1987年起,上海苏联东欧研究所改由华东师范大学管理。经上级批准,《今日苏联东欧》刊物也改由华东师大单独承办。机构的调整自然给刊物的正常运作带来一系列问题。首先是1988年第一期、第二期刊物未能按时出版,结果以第一第二期合刊的形式加以弥补;其次是经费拮据,需要花费许多心力去争取。然而困难最终被一一克服,《今日苏联东欧》每年都出满六期。

回顾近三十年来所走过的路,翻阅一期又一期的杂志,《今日苏联东欧》犹如一部苏联东欧的现、当代史,它不仅记录了苏联、东欧各个领域所发生的形形色色的重大事件和变迁,而且还加以研究,加以评述。最令人关切、令人震动的莫过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苏联与东欧各国的剧变。《今日苏联东欧》紧紧跟踪事态发展的进程,发表了不少综述和分析、研究的论文,诸如《蒙蒙改革梦》、《1980-1988年波兰大工潮的前前后后》、《波兰:从圆桌会议到政府组阁》、《急剧变化的匈牙利政局》、《齐奥塞斯库政权垮台的经过及原因》、《不容乐观的苏联现实》、《值得注意的两德统一问题》、《风雨四十年——东欧七国历史演变一瞥》、《自毁联盟》、《关于当前国际局势与独联体国家的发展前景》,以及重要资料汇编《1991年苏联剧变大事记》等,把这场政治大地震的真相及其发生的原因,尽我们所能地报告给广大读者,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和重视。

苏联东欧的剧变也给刊物的名称带来了困扰,《今日苏联东欧》不能再用了,因为苏联已经不复存在。但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没有变,依然是原来苏联所覆盖的欧亚地区和东欧各国。经过再三斟酌,实在想不出一个既符合实际又简约的名称,而刊物必须如期出版发行。最后决定暂时在苏联东欧前加一个“前”字,即《今日前苏联东欧》。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苏联东欧问题》更名为《东欧中亚研究》,与之相呼应,我们也于1995年将《今日前苏联东欧》改名为《今日东欧中亚》。同年,杂志由内部发行改为公开发行。

《今日东欧中亚》1997年第5期是《今日苏联东欧》的总第100期。为了纪念刊物出版100期,主编姜琦、副主编赵泓合写了一篇短文《新的起点》,指出《今日东欧中亚》肩负着桥梁和窗口的使命,为苏联东欧研究开辟了一块园地;强调要始终坚持既定的办刊方针,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跟踪和研究对象国的各方面情况;希望以此为起点,继续努力,把这块园地办得更好,为我国的东欧中亚研究做出更多的贡献。

为此,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努力提高刊物的质量,博采众长。我们不仅在这块

园地发表本研究所同志们的优秀研究成果，也欢迎全国苏联东欧问题的专家、学者们提供高质量的稿件。同时，我们还不断发表我们的接班人——青年学生的优秀论文和作品，使他们也有一块表现自己、提高自己的园地。可喜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在已成为这方面的精英。

我作为曾经负责这个刊物具体编辑出版工作的一员，回顾从《今日苏联东欧》到《今日东欧中亚》20 年来所走过的路，心中充满了感慨，欣慰之情油然而生。

2000 年，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成立，同年 9 月被批准为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0 年 12 月，《今日东欧中亚》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更名为《俄罗斯研究》。

《俄罗斯研究》尽管与《今日东欧中亚》有着接续的关系，但《俄罗斯研究》是以崭新的面貌问世的。无论形式和内容，较之《今日东欧中亚》都有质的飞跃。首先，在形式上由小 16 开改为大 16 开并请德高望重的汪道涵同志为封面题字，显得大气、稳重。其次，编辑部采用“双向匿名”的方式组稿，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刊发文章的转载率、引用率较前明显上升，影响力正在逐步扩展。尤为重要的是，近年来《俄罗斯研究》更加注意每篇文章之间的内在逻辑性，每期都会就某个主题给读者带来较为系统的认识。整体而言，该刊现在既关注热点问题，又能从历史的长时段去分析，且注意展示不同国家、不同理论派别的学者在同一问题上的不同看法，真正做到了“百花齐放”，这一点值得充分肯定。同时，整期篇幅有了明显的增加，可以刊登更多的佳作。内容上则以学术性、研究性的论文为绝对优先，少量兼及反映国内外斯拉夫-欧亚研究最新成果的综述、述评，作者队伍也扩展至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尤其重视藉优秀稿件进行方法论的推广。此外，刊物的格式规范、严谨，每篇文章前均有内容摘要和关键词，新设了英、俄文译文。经过主编、副主编和编辑部同志们 10 多年的精心培育，如今这本刊物已经是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订阅量也达到了历史最高点。

尽管《俄罗斯研究》办刊 10 多年来已经硕果累累，但编辑部的同仁们并不满足既有的成绩，在近期刊物的封四上刊载了编辑部致读者、作者的一封信，信中提出要将刊物打造成体现我国俄罗斯问题和相关领域研究成果和水平的重要平台之一，还将把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作为工作的一个重要目标，并提出要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空间。相信经过努力这些目标一定能实现。

衷心祝愿《俄罗斯研究》更上一层楼，获得更大的成功！

（责任编辑 常喆）

高端论坛：上海精神与上海合作组织

【编者按】今年6月15日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十周年的日子。在这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时刻到来前夕，2011年5月27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在上海举办主题为“弘扬上海精神，促进和平发展”的学术研讨会，回顾总结这一新型国际组织十年来的成长历程和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并展望其发展前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上合组织首任秘书长张德广，副理事长、全国政协常委、外交部原副部长刘古昌，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太彤，上合组织秘书长伊马纳利耶夫，吉尔吉斯斯坦驻中国大使库鲁巴耶夫，塔吉克斯坦驻中国大使阿利莫夫，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驻中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乌兹别克斯坦驻中国大使馆参赞，上合组织各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驻沪总领事，中国外交部和上海市有关部门官员，京沪两地有关研究机构及高校的学者共一百余人参加了研讨会。

征得报告人与主办方的同意和授权，本刊选出其中四位外国政要及高官的正式发言稿予以刊发（文章标题均为本刊所加），目的在于展示他们视野中的上合组织、上海精神及未来上合组织的发展理念。这四篇文稿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既表达了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共同诉求，也体现了各方在议程设置问题上的细微差别，值得读者细心揣摩。

上海合作组织：十年安全与合作之路

M·伊马纳利耶夫*

上海合作组织十年的发展经验表明，上合组织国家一贯遵循“上海精神”，坚定奉行本组织的宗旨和原则，缔造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国际组织，有效地推动了本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

十年前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做出的抉择，成为加强共同应对21世纪威胁与挑战的重要战略步骤。在十周年纪念即将来临之际，上海合作组织显得成熟稳重、生机勃勃而又前景广阔。

* M·伊马纳利耶夫（M. Иманалиев），上海合作组织现任秘书长。

在过去的十年里，上海合作组织为坚定向前发展打下了牢固基础。一系列共同原则和充实的国际法基础的建立，正积极推动本组织区域内多边合作的开展。

2010年在塔什干举行的本组织第十次峰会宣言指出，各成员国领导人决心继续努力发展各领域的合作。为实施这一战略制定了上合组织2010-2011年措施计划，以及由主席国哈萨克斯坦方面起草并经上合组织各成员国同意的活动计划。

本组织各领域工作的优先方向，无疑是确保上合组织地区的和平、安全和发展，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及非法贩卖毒品和武器。2001年通过的打击恐怖主义上海公约，是这方面工作所迈出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于2002年设立了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机构，这是促进各方在此问题上进行协调与合作的常设机构。2005年，结合已有经验，形成了上合组织成员国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构想。

在上合组织安全会议秘书会议、总检察长会议、国防部长会议和公安内务部长会议等会议机制的框架内，各方就进一步加强合作和完善机制、共同反对“三股势力”、打击非法贩卖毒品和武器，以及其他形式的跨国犯罪活动和非法移民，进行了有效协调。可以确定，现已具备了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开展系统、持续的安全协作的一切必要条件。

上合组织各国在打击毒品买卖和有组织犯罪方面开展合作，对阿富汗局势发展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上合组织成员国认为，阿富汗问题必须通过联合国主导并吸收阿富汗人民参与，经过周密组织的谈判进程，以和平手段解决。国际社会在联合国协调下，就阿富汗问题开展密切合作，应在此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

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对上合组织的兴趣不断增长，体现了本组织声望和影响的日益提高。上合组织目前共有4个观察员国：蒙古、巴基斯坦、伊朗和印度，白俄罗斯和斯里兰卡是本组织的对话伙伴国。为建立接收新成员国的法律基础，2010年通过了本组织接收新成员条例。现阶段正在起草关于申请国义务的标准文件。

众所周知，上合组织对与赞同本组织宗旨和原则的各国际组织开展互利合作，持开放态度。上合组织近年来形成并有效运转的全方位对外联络体系，证明了这一点。

2010年签署的上合组织秘书处和联合国秘书处合作的联合声明，使我们能够同联合国系统的专门机构、组织、规划和基金加强实质性合作，从而有利于共同落实前述领域的具体项目。

为加强禁毒工作，秘书处倡议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以及国际麻醉品管制委员会建立联系。目前正就与这些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开展积极工作。

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机构已与独联体反恐中心建立了工作联系，地区反恐机构正在与联合国安理会反恐委员会一起开展工作，并与其他国际组织建立了定期的业务联系。现在我们正在实施相关文件中达成的协议。

发展经济合作问题曾经是，也将仍然是本组织工作最重要的方向之一。

2001 年在阿拉木图签署了《政府间关于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目标和方向、以及启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进程的备忘录》。2003 年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理事会上批准的《多边经贸合作纲要》，确立了基本的远景发展方向。

在 2009 年叶卡捷琳堡峰会上，各国元首认为，应采取措施消除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鼓励开展更加密切的地区经贸和投资合作。为此，2009 年上合组织政府首脑理事会会议通过了有关文件——《共同倡议》。为应对危机，上合组织框架内的有关协议得到了及时的、分阶段的落实。

目前上合组织共有 20 多个专门机构负责处理经济合作事宜。其中包括经贸高官会，以及负责投资、海关合作、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开发过境运输潜能等特别工作组。

农业合作正在顺利开展之中。上合组织各国正就发展农产品贸易、交流农产品生产的规范法律信息进行探讨。2010 年塔什干峰会上各方签署了《政府间农业合作协议》，为我们各国在该领域进一步开展合作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和银行联合体的工作非常重要。最近实业家委员会和银行联合体的合作快速发展。2010 年 1 月在蒙古首都首次召开了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理事会会议，除上合组织成员国外，观察员国的实业界代表也出席了此次会议。

我想再次指出，10 年前成立本组织的决定是我们迈出的重要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一步，这开启了基于上合组织各国人民历史上长期睦邻友好所形成的巨大潜能。

成就巨大，前景灿烂

A·拉希德*

首先，我想感谢会议的组织者和上合组织首任秘书长张德广先生。能够受邀在上合组织成立 10 周年的前夜，参与到此次在上合组织的发源地——上海举行的代表论坛中，我感到十分荣幸。

* A·拉希德 (A. Рашид)，塔吉克斯坦共和国驻华特命全权大使。

对上合组织成立这十年来主要成就的评价，我们希望 20 天之后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由各成员国领导人作出。到那时，上合组织未来的发展方针也将制订出来。

我在自己的简短发言中，只是想描绘出未来上合组织活动的几个方面，并表达自己关于以后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相互合作的一些想法。

关于上合组织的起源

任何新事物的出现都有其一定的历史前提。众所周知，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是建立在欧亚大陆国家过去半个世纪里复杂的历史关系基础之上的。1996 年 4 月 26 日在上海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参与协议签署的有五个国家：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中国、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

由五个国家达成的边界管理和军事互信协议，体现出了对安全的新认识——它是建立在相互信任、平等、合作的基础之上的，同时协议也促进了相互理解和睦邻友好关系，对保证广泛区域的稳定作出了建设性的贡献。

很难想象，15 年前“上海五国”的参与者就想把“上海五国”变成永久的区域性活动组织。但就是在那时，“团结一致打击跨国威胁和挑战、在长期合作的基础上进行多边协作”的信念，把他们聚集到了一起。

众所周知，在“上海五国”向上海合作组织转变的进程中，历史性的一步是 2000 年 7 月 5 日在杜尚别完成的。今天应当记起，当时各国元首在峰会的杜尚别宣言中指出：“……五国在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和积极的作用，五国将继续促进成员国共同发展，各方将努力使‘上海五国’转变成一个在各个领域开展多边合作的地区组织。”

这是向上合迈进的第一步，正如历史所证明的那样，当时的期望已经实现了。

关于“上海精神”的思考

今天没有人会怀疑，上合组织是地区和全球政治中的重要一环。其实际工作切实连接了所有成员国的利益。同时，创建、发展和巩固上合组织的过程，丰富了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许多新的、独一无二的思想和观念。其中就包括“上海精神”。

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相互协作，是解决诸如加强相互信任、减少军事对抗等问题能力的有力证明。在上海和莫斯科签署的标志着上合组织成立的协议，在世界外交史上开创了先例。因此，它们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因为这是广大欧亚地区稳定的保障。

当我们说到“上海精神”时，首先指的是组织内成员国之间，以及成员国与其它有意与成员国一同合作、并愿意遵守上合组织宪章的目标与任务的国家之间，相

互信任、尊重对方的选择、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原则。上合组织与其它国家和地区之间并不是对立的关系。

“上海精神”以自己鲜明的目标和准则，吸引了其他国家和组织的注意。这种趋势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过去 10 年间，外界对上合组织的看法发生了质的转变，在实践中证明了上合组织不是“反对某些集团的组织”，而是有效的多边合作工具。它促进了信任和理解，在寻找双赢的地区安全和共同发展问题的解决方法上，作出了贡献。

上海合作组织愿与其他国家、其他相关国际和地区组织进行对话和交流。在我们看来，这也是值得所有上合组织创始人所骄傲的上合组织的意义之一。

共同打击“三股势力”

上合在这 10 年中所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积极并建设性地参与到新型的安全体系的构建之中。这个体系能够团结广泛的国际力量，来抑制威胁全球或地区稳定的新威胁和挑战。首先指的是集体对抗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以及非法毒品走私。

恐怖主义的威胁在过去的时期里并没有被消除，它机动地适应形势，运用现代技术手段。但上合组织也完善了自身的反恐措施，扩大了全球反恐合作的平台。重要的是，上合组织不仅成功地对恐怖活动给出了恰当的反应，还能够提前出击。

在这样的环境下，对上合组织来说，最重要的议程之一，就是与阿富汗的关系问题。阿富汗作为系统性的安全威胁，情况日益严峻。用武力手段解决阿富汗问题被证明是不可行的。国际社会对阿富汗的经济援助，也由于各种原因没法取得预期的效果。

“2014 因素”^①，在我们看来，需要上合组织额外的政治、经济和行政资源的投入，以加强上合组织对阿富汗事务的和平参与。阿富汗复杂的军事政治局势是区域一体化和国际运输发展的主要障碍。

经济合作

众所周知，上合组织在各个领域的互利合作都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广阔的前景，其中就包括经贸领域。上合组织成员国在总体上具有不容置疑的优势和独一无二的竞争力。其中包括其空间规模和重要的地理位置，即连接欧亚的桥梁。值得注意的是，据多方鉴定，上合组织成员国的矿产开采量在世界所占份额巨大，石油占 20% 左右，天然气占 40% 左右，铀占 50% 以上。近年来能源燃料领域的合作在上合组织内越来越受到重视，具体的项目正在实施当中。

① 此处指美国从阿富汗撤军问题。——译者注

独特的人文、经济和资源潜力，以及 6 个上合组织成员国拥有的辽阔疆域，使得实现宏大的过境运输项目成为可能。一旦项目得以实现，将促进成员国人民的繁荣和富裕。在这方面，位于“欧洲运输十字路口”中心的塔吉克斯坦，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上合组织发展的新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应反映其成员国对实现共同经济繁荣的愿望。因此，在共同发展中，可优先援助和推动经济上较弱的国家。随着良好的投资、社会经济和交通运输环境的建立，执行和实现区域经济合作的上述理念，是最重要的，是最终降低中亚社会紧张程度、稳定区域局势的决定性因素。

在此背景下，我们认为重点是要关注那些与区域土地开垦和水资源经济有关的项目，以及那些在农业、水电站建设和合作建设基础设施领域扩大合作的项目。在新的质量水准上的石油和天然气（在上合组织“能源俱乐部”框架下）领域的能源对话，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中也包括伊朗——上合组织观察国——的资源和潜能。需要建立起上合组织框架下的统一的天然气市场。

上合组织的经济潜能是巨大的，但需要增加新的动力。塔吉克斯坦将在最大程度上推动上合组织优越性的发挥，竭力促进经济合作。

关于上合组织的未来

对于上合组织的兴趣，在过去的时期里有了显著的增长。今天不仅是区域内的国家，同时还有远远超出上合组织界限的其他国际组织，表示出了对它的兴趣。这是“上合合作模型”的魅力和吸引力的有力证明。

上合组织的威信、号召力和影响力在增长，地区和世界上的威胁和挑战也在增多。上合组织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和在 2001 年及之后几年确立下来的基本方针，使自己转变得更为多功能、更全球化，积极应对在今天必须解决的各种新的内外问题。

上合组织进入了新的关键阶段，这就是为什么成员国感受到了对组织命运和决策的重大责任感。显然，在不久的将来，重点将放在对实际问题的解决和对人民需求的满足方面。

不出预料的话，在阿斯塔纳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十周年峰会，将受到广泛的关注。最后签署的文件，将对区域和全球合作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上合组织的活动核心，仍将是广大欧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三股势力”、非法毒品和武器走私作斗争，以及发展经贸和人文合作。对此感兴趣的不仅是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国家，全世界都在关注。已经无法想象没有上合组织的世界政治地图。

（赵玲 译）

建立促进上合组织繁荣发展的评估机制

С·沙赫赖*

2011 年对于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中俄双边关系都是具有丰富纪念意义的年份。在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 10 周年的同时，今年又恰逢“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订 10 周年和“中俄面向 21 世纪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发表 15 周年。

我想特别祝贺“促进上海合作组织政治与经济合作上海中心”（Шанхайский центр стимулирован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ШОС в области политики и экономики）成立一周年。我相信，中心的工作成果将成为创造性的源泉，上合组织成员国将不断地从中汲取发展自身政治和经济合作的新思路。

今天我十分高兴来到这里，来到新征程的奠基典礼上。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上合组织大厦”长久而成果丰硕的生命将从这第一块奠基石开始。

因为今天的典礼是在筹备庆祝上合组织成立 10 周年的框架下举行的，所以我要说一说我所见到的上合组织的成果和前景。

毋庸置疑，上合组织是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组织。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上合组织成员国的陆地面积占世界的五分之一（3000 万平方公里），人口占四分之一（约 15 亿人），GDP 占全球的 15%。

尽管上合组织成立的时间不长，但它无论是在加强持续发展所必要的组织和法律基础方面，还是在实现其成立的目标和任务方面，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过去 10 年里，在深化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政治互信、保证地区安全和稳定、扩大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和人文合作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成果是“上海精神”的传播。“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原则，成为成员国关系的坚实基础。这一国际合作的新思想，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拥护者，并在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具体事务、文件、共同项目和重要方案中得到了现实的反映。

上合组织是在旧的国际关系体系（建立在对抗和霸权主义原则之上）瓦解、并向多极化世界（多极化世界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承认不同文化和文明的同等价值）过渡的背景下产生的。有别于“输出”民主和西方价值观的政策，上合组织并不将自身的观念强加给其它国家。我们只是努力按照“上海精神”行事，以自

* С·沙赫赖（С. Шахрай），俄罗斯著名法律学者，俄罗斯联邦审计院秘书长，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身为典范，展示国际关系新概念在实际中如何运作，带来何种结果。事实上，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对上合组织的事务越来越有兴趣。更进一步讲，上合组织运作的形式和思想方法是正确的。

众所周知，今天在上合组织内，除了作为组织核心的正式成员国之外，还有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这一有效、智慧的机制，可以同时保证组织的刚性和柔性。一方面，利用这种机制，有助于为潜在成员国逐步参与上合组织事务创造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可以降低由于仓促扩员而在上合组织产生内部冲突的风险。以欧盟为例，其遭遇了新老成员国之间严重的利益冲突。我们看到，建立这种安全机制是多么重要。

“共同发展”是“上海精神”的原则之一，这一原则要求合作过程中的共同繁荣，学习和借鉴伙伴的积极经验。这是非常重要的任务。

但是，为了客观评价上合组织及其成员国的发展有多么成功，需要在互相协商和尊重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建立共识：我们给“发展”和“繁荣”这两个词注入什么思想？在现代世界，什么是我们所认为的“进步”？成功表现为何种具体的社会和经济指标？我们想要达成何种目标？我们的成果应该同哪种样本进行比较？

上合组织的文件并未对这些问题作出直接回答。但是，可以看到一些成功发展的标准，例如，缩小南北差距以及克服社会贫富阶级的巨大差异。毫无疑问，这是重要的标准，实现这些标准要求我们这些国家持续关注，并投入巨大的力量和资金。但是，对于制定长期发展战略，仅仅这些是不够的。

我认为，更为深刻、更有前景的是“和谐”的思想和“和谐发展”。但是，为了将哲学原理转化为标准和指标体系（借助于这些标准和指标，可以评估上合组织和整个地区的发展），我们这些国家最好的专家必须十分努力地参与其中。在俄罗斯，包括俄联邦审计院，以及俄罗斯科学院，正在积极地制订新的发展标准的体系。我们十分乐意就这一课题，与上合组织的同事们开展学术交流。

众所周知，如果有了能在海洋中正确定位和定向的专业工具，那么任何船只都更容易到达理想的彼岸。所以，我认为，建立有关成功发展（успешность развития）的监控与评估机构，对上合组织是有益的。

在这条道路上的第一步是采取行动，统一并完善上合组织成员国的统计体系，建立专门的机构，负责汇总及分析上合组织及其成员国成功发展的统计数据 and 指标。

我认为这一任务十分重要，因为正是现代经济和社会统计信息不甚理想的状况，成了许多国家和大型集团无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正如你们所知道的，

2008年，应法国的倡议，成立了“国际经济表现与社会进步衡量委员会”^①。该委员会的一个结论是，不仅应尽快完善现有的关于发展的评估指标体系，而且还必须尽快完善国家统计体系，制定并引入新的评估工具（包括对人类富裕的理解），远非单纯的经济增长指标。

在我看来，虽然在这一方向上还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但应等待，因为对于“人类幸福”的理解千差万别。但是，一些新的思想认为，发展的核心在于为提高人们的富裕和幸福水平创造条件。这样的观念，在学者和政治家中正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我认为，上合组织的研究机构，可以在这方面做出巨大的贡献。

在此情况下，我支持在上合组织范围内，建立自己的评级机构^②的想法。其实，制定上合组织经济空间内评级的共同标准的必要性，不止一次地被提出，特别是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曾多次提出该问题。

当一些私人的评级机构，用自己的评估引起世界市场的崩塌，并将主权国家变成金融破产者，使成千上万的民众失去工作时，我认为这是不正常的情况。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条件下，曾经最权威、最受尊重的评级机构，失去了自己的声誉。他们的活动动力，并不是来源于保护社会利益的思想，而是企图扩大自身的利益。投资者对于传统评级信息来源的信任动摇了，所以对于建立真正独立而专业的新机构，出现了有利的条件。评级机构的跨国性，是维持这种独立性的保证之一。

从实际的观点看，除了建立上合组织自身的评级机构外，研讨并重新审视评估国家信誉的原则和方法、广泛地与学术界和商业界开展讨论，是非常重要的。

现代世界发展非常迅速，并不断面临新的挑战，只有既能快速反应又不改变自己内部原则，并有效运作的机构，才可以应对这些状况。可惜，我听到了对于上合组织无法适应时代精神、行动迟缓的批评。所以，我认为，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必须持续关注如何完善上合组织的内部工作机制。上合组织的各机构应当成为有能力快速应对任何挑战的有效工具。为此，必须加强培养上合组织的干部，并提高其技能。受过良好培养的专家，不仅应当掌握必要的专业知识，还应当深入理解“上海精神”，并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遵守这些原则。

我认为，在上合组织大学框架下的五个优先方向培养专家^③的同时，为了上合组织项目和机构的工作，还应当制定并实施干部培养以及轮训的计划。目前，在上合组织现有机构中的固定工作人员并不多。但是，随着组织的发展以及实施的合作项

① 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al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

② 2010年11月末，在杜尚别上合组织成员国总理会议上，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正式提出这一想法。

③ 区域研究、IT技术、纳米技术、能源、生态。

目的增加，我们需要更多有能力、高效工作的专家。可能，还应该为在上合组织机构和项目中的专家建立统一的专家职业标准。

(施海杰 译)

推动上合组织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Д·卢基扬采夫*

我认为，本次研讨会以及此类活动，为广泛开展学术争鸣搭建了平台，会议成果既可以为国际问题领域的专家和学者提供重要的思路，也可以为决策者提供借鉴，因此具有很高的价值。本次会议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 10 周年之际举行，具有特殊意义。今年 6 月 15 日，上合组织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将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召开。会议期间将庆祝上合组织成立 10 周年，回顾 10 年的工作，总结各领域合作的经验，确定本组织下一个历史时期的工作内容和发展方向。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本届峰会非同寻常，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借此机会，请允许我向缔造上合组织的各位国务活动家、政治家和学者们表示感谢，向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上合组织首任秘书长张德广先生表示感谢，向张德广先生的亲密战友刘古昌先生表示感谢。

上合组织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这里我就不再一一赘述。更重要的是，在牢记成就的同时，要深入思考并透彻分析当前面临的、以及今后几年必然会引起我们关注的任务和问题。对一个国际组织来说，10 年不是一个很长的时段。上合组织成立之初，我们无法预见到受多种因素制约的各种变化。客观上讲，这也做不到，尤其是无法预见风云变幻的国际和地区局势。因此，目前一些机制和程序上的不足，也在情理之中。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下一个 10 年对上合组织提出了非常具体的要求。上合组织及其全体成员，能在多大程度上顺应这些要求，有效应对这些要求，将最终决定上合组织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也将决定上合组织的实际绩效。因为上合组织确保各国人民幸福安宁生活的宗旨，只有在实际成果中才能获得体现。

自成立之日起，确保各成员国的安全与稳定，是上合组织最重要和最核心的任务之一。各成员国联手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共同应对各种挑战。

* Д·卢基扬采夫 (Д. Е. Лукьянцев)，俄罗斯联邦驻华使馆高级参赞，俄罗斯联邦驻上合秘书处常任代表。

尽管成员国采取了多项措施并已取得显著成果，但遗憾的是，安全挑战并未因此降低。上合组织已经建立健全了安全合作法规，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认为，下一阶段，上合组织各成员国有关部门和机构之间的密切协作，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在打击“三股势力”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打击毒品走私，因为毒品走私和“三股势力”往往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在这一领域，除了集上合组织之合力并开展双边合作外，与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等本地区其它多边机制，在协商一致和互补的基础上展开合作，是相当明智和切实可行的举措，因为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代表着联合国全体成员国的共同利益。

当然，经济合作也是上合组织重要的工作方向。繁荣经济，一方面可以提高人民福祉，另一方面，也可以消除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据我们所知，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非常深入。应当集各国学者的智慧，制定上合组织内部经济合作的体系和标准。应当承认，私营经济对市场需求和局势反应积极迅速。目前，上合组织已经为各国之间开展经济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平台，包括成立了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和银行联合体。各国实业界要更加主动地深化经济领域的互动。当然，这种互动与国有企业参与经济合作绝不矛盾，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在部分特殊行业经验丰富，掌握着雄厚的资源。客观地讲，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大型项目，在下一个历史时期将更具有吸引力，这些项目既能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又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

人文交流也是上合组织颇有发展前景的合作方向。上合组织所在地区的各国人民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极大丰富了世界文化宝库，人文合作基础良好。在历史上，各国人民在不同层面上友好往来的优良传统，具有现实意义。此外，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积极沟通，是我们共同的出发点，也是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任何一个重要区域性组织持续发展的基础。因此，我们对去年（2010年）9月启动的上合组织大学先导性项目，和2009年成立的上合组织青年理事会，寄予厚望。我们坚信，人文合作必将极大地巩固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加深各国人民之间的理解，这也充分符合“上海精神”的要求。

上合组织“扩员”问题日益引起关注。补充新鲜血液，是任何一个多边组织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客观需要，欧盟、东盟都经历了这样的成长。相信上合组织也不会成为例外。

上合组织的声望和影响日益提高，一些国家，包括本地区以外的国家，都表示成为本组织对话伙伴国、观察员国，以至成员国的愿望。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中亚各邻国充分认可上合组织在中亚地区解决各种问题的能力，承认本组织是中亚地区的重要机制。在上合组织的核心文件中，均明确规定了本组织的开放性。开放

意味着可以吸收新成员。与新加入上合组织机制的国家开展合作，还可以带来利好。鉴于这两个因素，我认为，上合组织的发展扩大是大势所趋，也十分有益。当然，成员国数量的增加，应当以提高组织内部合作的实际效能为最终目的。因此，在吸收新成员之前，必须做大量的调研工作，包括进行细致客观的分析，以及基于多重因素的预测。从便于实际操作的角度出发，应当全面妥善地制定接收新成员的法律、行政和财务标准，这一标准应当适用于任何时期。目前，各国专家正在开展有关工作，并已取得初步成效。去年（2010年），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在塔什干峰会上，批准了“上海合作组织接收新成员条例”。下个月，阿斯塔纳峰会期间将通过上合组织“申请国义务备忘录”。

当然，“扩员”不是今天，甚至不是明天就能完成的。需要关注的问题还很多，而且远非那么简单。但是，我们认为积极开展这一工作，毫无疑问是必要的。

以上概述了上合组织面临的主要问题，各成员国要共同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推动本组织在今后几年和谐和可持续的发展。当然，本组织还面临着其它问题。但是，上述问题都是涉及上合组织根本的基础性问题，也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责任编辑 陈大维）

专题文稿·革命与俄国

20世纪初俄国革命历史编纂学的基本问题

A·H·梅杜舍夫斯基*

【内容提要】二月革命是俄国民主发展的历史分界线。但半年之后，就发生了十月革命，民主体系瓦解，20世纪俄国和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也就此根本改变。俄国第一个共和体制垮台的主要原因是，在等级社会、资格选举体系和群众政党缺失的条件下，建立经典议会制的思想却在革命领导人的意识中占居统治地位。二月革命虽然没有完成，但它的历史意义非常重大：由它宣告的自由主义改革纲领在后苏联时期开始得到实施。二月民主体系破产的经验，对20世纪末宪法危机的解决也产生了影响。在廓清会导致民主改革间断的社会因素时，重要的是要及时地用详细制订的解决冲突的方法与这些因素相抗衡。

【关键词】俄罗斯 二月革命 十月革命 民主 历史编纂学

【中图分类号】K512.5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1)03-0018-(30)

二月革命是俄国民主发展的历史分界线。这条界限与等级社会向公民社会、君主政体向共和政体事实上的过渡的开端相联。但是，仅仅过了半年，这一政体（第一个共和政体）就遭瓦解，成了反民主政变的牺牲品。这一发生于1917年10月25日的政变被称作十月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在俄国开始形成的民主体系的瓦解，从根本上改变了20世纪俄国和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①。同时，这一危机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一系列反民主政变的开端，这些政变导致了议会制的瓦解和各种政治倾向的独裁体制的建立，使人类陷入到一系列的战争之中，把世界分裂成敌对的两个阵营。墨索里尼征伐罗马、魏玛共和国的覆灭、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及中东欧国家独裁的建立，都是宪政主义同一个周期性进程的

* A·H·梅杜舍夫斯基（A.H.Медушевский），历史学副博士，哲学博士，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祖国史》杂志主编，莫斯科高等经济学校教授。

① Модел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переустройства России. XX век. М., РОССПЭН, 2004.

表现。民主体系在俄罗斯无法站稳脚跟的原因何在？本文将解释这一现象，并将它置于其他过渡进程的语境中，以判断其类型特征，揭示侵蚀民主的机制和方式。

一、转型进程概念语境中的俄国革命

独裁主义向民主制转型的理论已成为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比较宪法学和政治学的中心理论之一。这一理论的出现与需要对大量经验材料进行综合有关，1970 — 1980 年代席卷南欧和 1990 年代席卷东欧、亚洲、拉丁美洲和部分非洲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催生”了这些材料；同时，也与需要把这些进程与之前的民主化浪潮相比较有关。创立了一个特别的研究方向（被称为“转型学”）^①，各种研究力求使从独裁向民主转型的情势模式化，并找到管控这些过程的准确公式。1917 年的二月革命是这些过程的基础，也是它们在欧洲和全球历史中的出发点。

在中东欧国家发生的三次民主（宪政）改革浪潮都与世界大战和地缘政治变迁有关。第一次浪潮出现的背景是：一些庞大帝国的解体（日耳曼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和一些民族国家的成立、民主宪政的施行，它们通常实行议会共和或君主立宪形式的议会制度。^②但是，这一成果并不牢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从巴尔干到波罗的海，实际上所有东欧和南欧国家都实行总统或君主独裁形式的专制体制。^③第二次浪潮同试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回归议会政体形式有关。但是，有名无实的苏式宪政（由 1936 年斯大林宪法为代表）很快被推广到所有这些国家。^④第三次浪潮出现在 20 世纪末，与苏联开始改革有关。^⑤所有这些国家过渡时

① Linz J., Stepan A.,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in Southern Europe, Latin America and Southeast Asia*, Ed. By D. Ethier.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9; *Transiciones y Diseños Institucionales*, Maria del Refugio Gonzalez, Sergio Lopez Ayllon (Ed.) Mexico,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onoma de Mexico, 2000.

② Европейские монархии в прошлом и настоящем. XVIII-XX века. Спб., Алетейя, 2001; Судьба двух империй: Российская и Австро-Венгерская монархии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развитии от расцвета до крушения. М., ИРИ РАН, 2006.

③ *Autoritäre Regime in Ostmittel- und Südosteuropa 1919-1944/ Hrsg. Von Oberländer E. in Zsarb. Mit Ahmann R. et al.- Paderborn etc.: Schöning*, 2001; Тоталитаризм в Европе XX века. Из истории идеологий, движений, режимов и их преодоления. М., Наука, 1996.

④ Из истории 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парламентаризма: Испания и Португалия. М., 1996; Из истории 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парламентаризма: Италия. М., 1997; 1917 год и российский парламентаризм. Спб., 1998; Британск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традиции и реформа власти в России. М., Посольство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в Москве, 2005; Парламентаризм.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мысль России XVIII -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М., 2005. С.383-385.

⑤ Хантингтон С. Третья волна. Демократизация в конце XX века. М., РОССПЭН, 2003.

期的内容都有相似的参数——从有名无实的苏式宪政制转向真正的宪政。但在实际上，转型的困难要比转型开始前所预料的严重得多，这引起了对转型模式的批评。

因此，在下列方面克服“转型学”方式的局限性便显得十分重要：第一，放弃预设一系列问题和结果的简单化的线形转型模式（以宪政形式的周期性更替概念来代替）；第二，摆脱狭隘的欧洲中心论模式，确切地说，摆脱将现有公式机械地照搬到世界其他地区的做法，扩大讨论的信息基础；第三，提出关于过去存在过类似过程的问题，^①其中包括，在二月革命时期由专制制度向君主立宪制和向民主共和体制过渡时以及由此向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过渡时都有过的类似的过程。

二、俄国革命社会学模式无效性的原因及重新理解其历史的可能性

俄国革命主要的社会学模式：系统理论、结构理论（阶级冲突的理论）和行为理论是由当时的学者提出的，并在以后的历史编纂学研究中得到了发展。

系统理论（А·А·波格丹诺夫）把革命看成是组织学通用规律表现形式的个别情况——是社会体系组合与分裂过程的个别情况。这些过程与外部环境改变有关，并伴随着构成要素的形式和内部界限的质变。革命在社会中就像是“社会界线的裂点”，如同物理过程（水的沸点就是液体与气体间物理界线的裂点）或是生物学过程（死亡就是机体生命联系的裂点）。^②这一理论的贡献在于提供了对旧的社会形式的解体进行分析的可能性，但却没有解释新的社会形式建立的机制及其法律表现。

结构（阶级）理论把在危机各个阶段占统治地位的各种斗争力量的更替看作革命进程的逻辑。这种更替以近代经典的欧洲革命为基础被模式化。Н·罗日科夫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为一个过程，由四个主要部分组成：第一、准备革命，第二、革命的首次高潮，第三、反应，第四、第二次革命或者是取代它的战争。在一些革命中，第二和第三部分之间，还会有军事或者君主专制独裁”。^③但是，这种理论难以很好地解释俄国革命，特别是不能解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革命正是在这一时刻开始，而从第二阶段向第四阶段的过渡所占的历史间隔是如此短暂，并且还伴随独裁制度的出现。М·Н·波克罗夫斯基试图对这一事实作出解释。他问道：“为什么 1905 年的革命遭到了失败，而 1917 年的革命未能被专制制度制止？”在解答这一问题时，他认为，原因在于 1917 年“帝国主义上层集团”无法挽回的分裂，

① Медушевский А.Н. Теория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ых циклов. М., ГУ-ВШЭ, 2005.

② Богданов А. Всеобщ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ая наука (Тектология). М.-Л., 1925. Ч.1-2. С. 113.

③ Рожков Н. Рус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в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освещении (Основы социальной динамики) М.-Пб., Книга, 1923. Т. VIII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в Западной Европе). С.256.

以及他们在世界大战的条件下不能达成一致。两种民族资本——工业资本与商业资本的尖锐冲突正是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达到了白热化，1917年俄国革命因得益于这一冲突才获得成功。实际上，执政精英发生了分裂，导致了政府在革命的紧要关头陷于瘫痪。^①阶级理论的这种变形，且不说其实际上具有的争议性，并没有解决问题，而是把事情归结为执政集团内部力量配置的特殊性。Л·克里茨曼认为，俄国革命进程具有特殊性的原因，在于它结合了几种通常是自主展开的革命的类型的类型：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农业革命、部分的殖民地革命。Л·克里茨曼把它称为“复杂的革命”，并最先试图对“革命机制”作政治学上的分析，将这种机制放在实现革命性变革的破坏性和建设性功能的五个阶段中加以展开剖析。随后，“在取得胜利并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之后，革命也将死亡”。^②“革命死亡”这个论题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是异端邪说，但与循环模式——“不断革命”理念相对照的话，便显得是有道理的。这个论题建立在对革命性变革进程中革命阶级与专政之间相互关系的独创性（但是未经证明的）推测的基础之上。

行为主义理论（П·А·索罗金）将心理学要素——群众被压制的无意识行为与其惩罚性压制之间的冲突视为革命的意义。社会的大部分对于压制加剧的基本的本能的（“不能保证最低限度地满足这些本能”）回应，成为革命的直接原因。^③这一理论（后来在历史编纂学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把社会心理看作是革命发生的机制。但是它没有解释，为什么在事件自生发展的情况下，会有形式和结局重复性的存在。除此之外，它还不能够对革命与普通暴动、起义和造反进行区分。这种分别不是由这个或那个历史学家的主观评价决定的，而是由事件持续的客观长度、卷入革命的人数和位于事件根源的社会原因确定的。

复合型的方式包含前面考察过的所有观点，力求弄清系统理论、结构（阶级）理论和行为主义理论间的联系。А·М·奥努总结道：“革命是一种社会生命的抽搐，是一种痉挛性、强制性行为，引发原因是焦躁、不愿等待一切自发形成、愤恨、确信制度不稳定——先是默默地忍受着的人们决定用暴力手段推翻这种制度”。^④

上述所有理论的不足在于：第一、它们都过于抽象：对革命进程不同时期的划分只是从属于单方面的（经济、阶级和心理的）诠释，与在革命进程中具有一定地

① Покровский М.Н. Очерки русск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XIX-XX вв. М., Главполитпросвет, 1924.

② Крицман Л. Героический период великой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опыт анализа т.н. «военн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 М.-Л., Госиздат, 1926. С. 26.

③ Sorokin P.A., *The Sociology of Revolution*, London, 1924, p.367; Он же. Дальняя дорога.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я. М., Терра, 1992.

④ Ону А.М.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ая природа революции//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посвященных Павлу Николаевичу Милюкову 1859-1929. Прага, Орбис, 1929, С.32.

位的法律形式的变化没有关系；第二，它们都是线性的，难以解释这一进程中的断裂挫折；第三，它们都有一定目的，不揭示从一个时期向另一个时期转型的发散机制。

可以弥补这些不足的是新制度主义，它能指出错误出在哪里，把学术讨论提升到法律行为、制度、过程和方法层次。设计模式和确定方法的可能性在出现。新（制度化）方法提供的可行性有：弄清革命关键时期法律行为、制度和过程（方法）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机制，包括制度陷阱——导致民主在俄罗斯瓦解的错误决定。法律设计的可能性和界限范围变得明了。^① 还要指出，在其他的革命历史编纂学中，包括在法国革命历史编纂学中，这一研究方向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其代表人物，在过去是这样一些经典作者，如亚·德·托克维尔^②或A·奥拉尔^③，在当代历史编纂学中则是弗·孚雷^④学派。在这个方向上重新认识俄国革命，其迫切性是显而易见的。

从这些立场出发，对俄国革命进行分析的结果是弄清下列问题：在二月革命的进程中和发生之后政权的继承性问题；过渡时期条件下的制宪和宪法权；政党达成一致并通过民主宪法的机会是如何错过的；怎样解决新政权合法化的问题；双重政权和克服这一现象可供选择的方式；政变的方法作为确定政治制度矢量的决定性因素（欧洲议会制全面危机的语境中）；为何俄罗斯第一个民主共和政体遭遇失败，它为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时代提供了怎样的教训。

三、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冲突：在二月革命进程中以及革命之后政权的继承性问题

合法性与合理性之间的冲突是激进革命的特征。摒弃旧的法律体系意味着制宪革命或是变革。二月革命的政治内容是：从二元的君主政体（革命发生时这一政体表现为君主专政）转向民主政体，其宣布的目标是法治国家、议会制、多党制、在由全民选出的制宪会议上通过新宪法的思想。君主退位、建立临时政府、开始（由临时政府下属的法律会议）制订宪法，应该被认为是这个过程最重要的几个阶段。

① Медушевский А.Н.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е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е право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нституты. М., 2002.

② Токвиль А. Старый порядок и революция. М., 1905.

③ Олар А.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Француз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демократии и республики (1789-1804). Спб., 1902.

④ Fret F., Ozouf M. et Collaborateurs, *Dictionnaire Cr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Flammarion, 1992. Vol.1-4.

在这个意义上，政治革命是完全合法的。但是从法律形式的角度来看，出现了法律继承性的彻底断裂，这成为新政权不稳定的原因之一。

第一，在国家杜马和君主的关系中存在着全面的法律上的不确定性，它源自 1906 年版的基本法。^①这是德式君主立宪体系，它把政权结构中的二元论要素同向君主政权提供现实优势的情势结合在一起。在当时的文献中，这种体系被定义为“臆造的立宪主义”，在战争和因战争而广泛使用特别法规制度的条件下，该体系的特点愈加突显。^②由于帝国政治制度体系的瓦解，“国家机器偏离了轨道”。^③根据尼古拉二世皇帝的命令，国家杜马于 2 月 26 日解散，其活动与国务委员会同时被无限期中断。由此，根据现行的基本法律，国家杜马不能召集，但是当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被迫领导已开始的革命运动并把政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时，便出现了其政权的合法化问题。

第二，退位诏书在法律上的不规范性已被多次确认：沙皇只可以自己退位，而不可以让儿子退位；按现行法律，皇位不能传给沙皇的弟弟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大公，特别是，就废黜皇位直接继承人而言，缺乏正式的依据。^④

第三，把权力移交给米哈伊尔大公是不合法的，因为违反了规定的继承程序。专家们认为，3 月 3 日决定的基本矛盾是，大公拒绝接受最高权力，而他在法律上并不拥有这一权力。按 В·Д·纳博科夫的观点，“决定在法律上有价值的内容”应归结到这一点上。^⑤

第四，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本人拒绝最高权力，这一决定的不规范性也被指出了。纳博科夫确认，大公的拒绝（如果假设其合法）只会有利于最高权力，

① Свод Основн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законов в новой редакции от 23 апреля 1906 г.// Свод зако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Изд. 1906 г. Т. 1.

②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Спб., 1905; Чичерин Б.Н.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ый вопрос в России. Спб., 1906; Ковалевский М.М. Общее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е право. Спб., 1908; Лазаревский Н.И. Лекции по русскому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у праву. Спб., 1908; Кистяковский 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право (Общее и русское). Лекции. М., 1909; Кокошкин Ф.Ф. Лекции по общему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у праву. М., 1912; Котляревский С.А.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опыт политико-морф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обзора. Спб., 1907; Он же: Юридические предпосылки русских Основных законов. М., 1912; Гессен В.М. Основы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го права. Пг., 1917. 详见 Медушевский А.Н. Демократия и авторитаризм: российский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ализм в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е. М., 1998.

③ Родзянко М.В. Крушение империи. М., Интербук, 1990. С. 215.

④ Манифест отречения Николая II// Отречение Николая II.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чевидцев. Документы. Л., 1927. С. 223; *The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1917. Documents*, Selected and edited by R.P. Browder and A.F. Kerensky, Stanford Univ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 1961. Vol. I-III; Феврал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ода. Сб. документов и материалов. М., 1996; 详见 Катков Г. Феврал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М., Центрполиграф, 2006.

⑤ Набоков В.Д. Временн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М., 1991; Набоков В. Временн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Архив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Изданный Г.В. Гессеном. Берлин, 1920. Т.1. С.9-96.

也就是立宪会议，而不是有利于国家杜马，更不是有利于临时政府。纳博科夫指出，选择这样解决问题，目的在于郑重其事地加强临时政府权力的完整性和它同国家杜马的继承关系。B·A·马克拉科夫甚至认为，假如退位不伴随法律继承性断裂的话，1917年2月就不会发生革命。甚至在大公是君主的情况下，他也没有权利签署3月3日的宣言。因为在违反现行宪法、没有杜马同意的情况下，宣言宣布，到召开立宪会议之前皇位是空着的。宣言确定立宪会议的选举体系，并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把全权转交给临时政府，而宣言的签署者自己并不拥有这一全权。结果，米哈伊尔大公在违背基本法的情况下签署的决定，实质上成了革命临时政府政权唯一的法律基础，并全面赋予它立法权。马克拉科夫得出结论：“宪法因此而被完全废除；新政权和旧制度之间的所有联系都断绝了。这是真正的革命，是政权向‘革命苏维埃’的移交，这直接导致了十月革命”。^①С·П·梅利古诺夫认为：“一切都被3月3日形同犯罪的决定败坏了，宣言是全俄起义的信号”。^②米留科夫的观点与此相似，他认为革命的错误源自“由3月3日决定形成的源头本身的缺陷”。^③

第五，让我们指出临时政府声明在法律上的矛盾性：一份声明来自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在2月27日革命进程中，政权转移到临时委员会手中），另一份来自临时政府（3月2日成立），并且还提到了执行委员会。纳博科夫指出，在临时政府的第一份声明中，“它说到自己，就像是在说内阁”，而且这个内阁的构成被视为“行政权更为稳固的构架”。在第二份宣言中，“责任政府”的这一动机不明显。^④

如果站在Г·凯尔森规范理论的角度，那应该把临时政府的确立看作是立法变革（政变*coup d'état*），因为新的法律规范，虽经各方协商，但制订时带有法律继承性上明显的断裂（并不是建立在现行法律基础上）。^⑤在准备临时政府的呼吁书时（像纳博科夫、拉扎列夫斯基、科科什金、维纳维尔这样的著名律师都参与起草），所有的历史部分都被有意识地删除了（沙皇退位、传位给皇弟以及后者拒绝接受政权）。新政权的继承性与合法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自由主义分析家指出，“‘革命政权’丧失了其产生的正式合法性。它是由政变这一事实、在政变的当口建立的”，但却

① Маклаков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Лидер московских кадетов о рус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 1980-1917.М., Центрполиграф, 2006. С. 324.

② Мельгунов С.П. Мартовские дни 1917 года. Париж, «Les Editeurs Réunis», 1961. С. 357.

③ Милуков П.Н. История Второй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М., 2001.С. 51.См. также: Вишняк М. Политика и история в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П.Н.Милукова//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 1927. Т. XXXII.С. 434-452.

④ Сравните два документа: «Декларация Временн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и Совета рабочих и солдатских депутатов// Речь № 55(3797) от 5(18) марта 1917 г. С.2 и «От Временн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Обращение к гражданам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от 6 марта 1917 г.)// Речь № 56 (3798) (Вторник, 7 (20) марта 1917 г.). С. 2.

⑤ Kelsen H, *Reine Rechtslehre. Zweite neubearb. und erweiterte Auflage*, Wien, Franz Deuticke, 1960.

自以为具有“合法政权”的所有特征。^①甚至在正式宣布改变执政方式——建立共和国之后（1917年3月1日），重新审视基本立法（结束第三届、开始新的第四届立法全体会议）的问题依然被搁置。立法会议的这一决定被用两个原因加以解释：期待立宪会议的召开和前面一部即第三部（1914年至1917年初）法律全书尚未完成。^②随后的合法性问题也没有解决，因为政权的新机构没有通过选举或制宪会议的决定——召开立宪会议——来确认自己的权力。

四、制宪权和宪法权：俄国过渡时期立宪会议思想的破坏性作用

在筹备俄国立宪会议时期，制宪权和宪法权相互关系的问题得到了最充分的审视。社会和国家体制新原则的合法性问题，它们的形式和法律表达问题，包括政权从临时政府向立宪会议、再从立宪会议向新的、常态化的政权立宪制度过渡的问题，成了确保稳定的中心问题。^③

事件未能按这一方式发展，其原因可以被划分为理论、制度和实用政治几类。当时（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自由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民主理论属于第一类型，这种理论的基础是卢梭主义对人民能够独立解决复杂的国家问题的信心。根据这一理论（按西耶斯神父的论述和法国革命宪法），人民主权表现在人民代表制度——制宪会议（立宪会议）中，也表现在制宪会议创建的立法权制度（议会制）中，而不是在行政权（政府）制度中，行政权只起辅助作用，而它的权力应该最大限度地被限制，以避免人民意志被篡夺——避免暴政的威胁。

这一观点在法国国内外都被认为无效。在现代文献中可以看到，全能的制宪会议作为人民意志表达的思想（从第一共和国到第四共和国对其有各种阐述）扮演了极具破坏性的角色，一如对民主体制与议会之间联系的一般认识。这些观点成了法国立宪过程不稳定的原因，这一过程导致了议会制共和国（被称为大会制度）与总统制（波拿巴主义型）循环交替。专家认为，只是在当代法国戴高乐模式的混合型（总统一国会）共和国出现以后，这一现象才告结束（与先前所有的宪法不同，1958

① Ган М. 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власти// Речь. № 163(Пятница, 14 (27) июня 1917 г.). С. 2.

② ГАРФ. Ф. 1792 (Юридическое совещание). Оп.1. Д. 4. Л. 41 (Заседание от 22 августа 1917 г. – «Обсуждение вопроса о новом Св. Законах»).

③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Пг., 1918; Теория вопроса: Еллинек Г. Конституции, их история и значение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праве. Спб., Право, 1906; Орландо В. Принципы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го права. М., Саблин, 1907; Боржо Ш. Учреждение и пересмотр конституций. М., Сабашниковы, 1918.

年的第五共和国宪法制定时，已不是召开制宪会议，而只是通过精英内部对话的不公开机制，在成文后经全民公决通过）。^①

但是，实际上，正是卢梭主义的民主理念（它在 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经典议会制时代的欧洲占统治地位）团结了俄罗斯所有与专制政体对立的政治力量，并体现在全能的立宪会议的理想模式中，立宪会议被当作民族命运的主宰和政权与人民之间历史性冲突的仲裁者。这一信念因历次法国革命的经验而得到巩固，每次革命都对所创立的政权给出自己的阐述：从将它作为人民意志的专制制度（18 世纪末大革命时期的议会）到作为第三共和国基础的自由主义观点（1875 年的立宪会议）。^②

俄国二月革命政治体系不稳固的第二类原因，即制度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立宪会议模式的选择，以及相应的过渡时期立法当局与行政当局关系结构的选择。在俄罗斯设计的模式，能够既总结世界历史的经验，也总结民族政治状态的特点。按照为就此问题召开的法律会议撰写分析报告的作者们的观点，立宪会议能够用三种不同的方式组织国家的管理。^③ 分类的基础是权力划分原则，还有在俄罗斯的条件下寻找确保权力划分的现实可能性。第一种模式是立宪会议把立法权与行政权功能结合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立宪会议是按法国革命议会的样式组成，并且把最高行政权力的功能和各管理领域的领导权转交给自己的委员会。一开始布尔什维克宣传这一体系（他们希望在立宪会议中获得大多数），但后来（当这种情况明显不可能时）他们为了自己可操控的苏维埃模式而抛弃了这一体系。^④ 的确，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以后）中意的制宪会议的类型是，这个大会能够为了苏维埃而放弃自己的主权，接受先前的、现在的以及之后的法令并使之合法化。在苏维埃优先于其他所有

① Morabito M., Bourmaud D, *Histoire constitutionnelle et politique de la France*, Paris., Montchrestien, 1998; Sartori G.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 An Inquiry Into Structures, Incentives and Outcomes*, L., Macmillan, 1994.

② История XIX века. Под ред Проф. Лависса и Рамбо. М., 1938; «Объяснительная записка к проекту правил о неприкосновенности личности и свободе слова членов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го собрания»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 французско-бельгийскую систему депутатского иммунитета как более предпочтительную в сравнении с английской, ссылаясь на ст. 13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го закона 16 июля 1875 г.// ГАРФ. Ф. 1792 (Юридическое совещание) Оп.1. Д.21. Л.141-148.

③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Россия. 1918.М.,1991; См. также: Заключение Юридического совещания о предполагаемом открытии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го собрания и передаче ему власти Временным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м. 21 сентября 1917 г.//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ые проекты в России XVIII-XX в. М., ИРИ РАН, 2000. С.763-768.

④ Петроградский совет рабочих и солдатских депутатов в 1917 году. Протоколы,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и отчеты, резолюции,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общих собраний, собраний секций, заседаний Исполкома и фракций. 25 февраля – 25 октября 1917 г. В 5 т. Л., 1991; Фабрично-заводские комитеты Петрограда в 1917 г. Протоколы. М., 1979. См. также: Рейснер М. 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ее учреждения. Пг., 1917; Рожков Н.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М., Студенч.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17; Милютин В.П. О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е. Пб., РСДРП, 1917.

形式的人民代表制度的语境中，布尔什维克破坏立宪会议的行为变得可以理解了。^① 革命议会的模式并不是法律会议分析报告撰写者们愿意看到的，因为它导致“权力的彻底混淆和完全不能保障管理中的合理性，因此，也导致不可遏制的独裁统治。历史已对这种体系进行了如此多的谴责，以至于没有必要再对它进行详尽的讨论”。第二种模式要求把行政权转交给唯一的机构，这种机构可以是委员会制的（如 1848 年法国的执行委员会），也可以是个人制的（1871 年梯也尔）。这种体系的缺点，被认为是“同立宪会议的无限权力难以一致”。只有通过政府在每次同立宪会议中的大多数产生分歧时进行周期性更替，立宪会议对政府的支配才能得到保障，这会导致在危机时刻不能容忍的政治上的极大不稳定。权力机构的第三种模式被认为是最能接受的，它是“议会体系方式的管理机构”。^② 但这里说的并不是西方经典的两院制议会，而是将权力从立宪会议（原则上是权力的源泉及其政治方向的担保人）转授予责任内阁（“拥有会议大多数的信任并在失去信任时被替换”），再由责任内阁转授予临时总统（“由立宪会议选举的一人机构”）。按照作者们的观点，这种结构一方面能够保障立宪会议的无限权力以及它对行政权的监控，另一方面也能保障政府职能的独立性。从这些立场出发，讨论了未来的议会制（一院制或是两院制）、政府的责任和总统地位等问题。^③

临时政府的理论家们以宪政政权组织的第三种模式作为基础，全面地再现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因 1875 年的立宪会议而出现的那种制度性错误。批评家指出，在两次战争之间的法国，这种体系总的缺点是其（在共和党人和君主主义者相互关系不稳定的条件下）产生时的妥协性质。妥协是通过采取非常独特的执政方式达到的，这一方式与英国的议会君主制模式有相似之处，但是却失去了后者最关键的要素——君主制（这与法国各种君主制团体不会协商一致、共同推举王位候选人有关）。约瑟夫—巴尔德列米指出，“不考虑下列这些无比重要的情形，就无法理解法国宪法的基本特征，它们是：执政党没有能力建立一个他们希望政府，他们决定建立一个尽可能接近君主制国家机构的共和制度。按他们的构想，总统的宝座能够不费吹灰之力地变成皇帝的宝座。共和政体的宪法是按照七月君主制度的样式建立的。

① РГАСПИ. Ф.274 Оп.1 Д.47-48;另可参见 Вишняк М.В.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е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Париж,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 1932.

②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ой власти при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м собрании: справка, составленная делопроизводством Юридического совещания// ГАРФ. Ф.1792. Оп. 1. Д.5. Л. 112-121. См. также: Заключение Юридического совещания о предполагаемом открытии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го собрания и передаче ему власти Временным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м. 21 сентября 1917 г.//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ые проекты в России XVIII-XX в. М., ИРИ РАН, 2000. С.763-768.

③ Кокошкин Ф.Ф. Об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м собрании. Доклад на Седьмом съезде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25-28 марта 1917 года// Съезды и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Том 3. Книга 1 (1915-1917 гг.). М., РОССПЭН, 2000. С. 407.

这是期待君主制复辟时期的宪法”。^①最终，这种体系正是在权力划分这条线上开始出现间断：全能的议会有机会在任何情况下推翻政府（只要议会中党派力量分配出现最低限度的改变），而政府不能实行稳定的政治方针（因为与英国模式不同，它没有获得以国王的名义解散议会的权力）。于是产生了议会大会制度，它导致政治上的极度不稳定（政党的独裁和在短时期内内阁数十次更替）和总统权力的软弱（极具代表性特征），而最终使第三共和国无法有效抵抗纳粹主义。这一体系在法国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原因正是在于立宪会议的参与者是将它作为“临时”（在采纳君主制管理形式之前）体系考虑的，而后来，它却有利于在议会中起主导作用的政党。

这种体系的批评者通过揭示现存议会制的无组织和无效率，指出了在新的环境里第三共和国议会形式的不完善，提出了改革途径的建议。他们认为，改革的主要方向是：实行合乎比例的代表制，保障主要的经济和智力力量的代表进入议会，压缩和调整那些常常影响快速有效通过法律草案的议会辩论，扩大行政权的社会基础（在大幅度扩大复选人委员会的基础上选举总统），加强行政权（向总统提供在不经参议院同意的情况下就可解散议会的权利）。这些改革的目的在于克服体系的那些在革命的俄国能够明显感觉到的特点——政治制度同社会脱节，克服权力的无效性和不稳定性（议会中力量对比的基本变化，表现为内阁的经常性更替），加强国家的社会职能。这里还没有谈到从议会制共和向总统制过渡的话题，更多谈的是克服大会制度的极端性和逐步过渡到在战后被称为“合理的议会制”的问题。^②

议会体系在法国的破坏性作用因公民社会和政党的相对稳定性而降低，而在法国之外的地方——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却表现得更大，在那里，这一模式被当作样板。由于执政党的分裂以及议会大会制度下行政权的无效，在群众性的社会条件下，经典议会制的瓦解和向独裁主义过渡能够轻松实现。在这种解释中，议会民主显得无力对抗两种极端——一方面是大众冲击引起的社会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是独裁的恐吓。这样，临时政府的错误被解释为，在自由民主的欧洲国家普遍承认这些思想，即使有全部的破坏性，这种权力结构在 19-20 世纪之交的欧洲还是被看成是保障政府的政策同立宪会议意志一致的最佳机制。在这种机制下，对政府进行必要的改变但又“不发生灾难性剧变”成为可能。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代某些政治学家（如 X·林茨）眼里，对于民主过渡时期而言，这种政权结构是合理的，区别于有人格化领袖地位的总统强权。但是，在剧烈的社会改革和法律继承性中断的条件下，这一

^① Жозеф Бартеле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строй Франции. М.-Л., Соцэкгиз, 1936. С.45-46.

^② Joseph-Barthélemy, *La Crise de la démocratie contemporaine*, Paris, Sirey, 1931, pp.11-12.

结构的优势（在解决各党派间矛盾时极大的灵活性，吸引反对派进入政治过程的可能性，以及能保障政权不被篡夺）会变成缺点。这些消极方面出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体现在这样一些事件上：魏玛共和国的危机、法国议会制度在政治上的无行为能力以及独裁统治在意大利、西班牙、波兰和其它国家的建立。^① 在俄罗斯，布尔什维克主义第一次如此明确地反对议会制，将它与君主制度一起称作是“吃人和史前野蛮的”遗产、“人民意志的法律拜物教”、“形式上的、有代表性的民主”的制度、“信仰机构神秘主义”，而把自己的任务定位为引起“以民主方式无法解决的革命议会制的强烈危机”。^②因错误的民主制度概念而得到加强的议会制危机的这些方面，在俄罗斯得到了充分的自我体现。

五、行政权的结构：过渡时期政府软弱的原因

众所周知，大革命的制宪会议力求避免的首先是在革命进程中被推翻的先前体制的负面特征。^③对于俄罗斯自由主义运动而言，同专政体制的斗争是传统目标，因此，其他危险或是被忽视，或是在创立政府时只给予其很少的关注。这些总原则在“关于组织俄罗斯共和国临时行政当局的（特别）法律草案”里得到体现，还曾打算把这份草案提交到立宪会议上讨论。^④在立宪会议召开前夕制定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关系时，避免专政成为最重要的主题（专政被视为君主制复辟的危险性）。主要的危险被认为是在临时政府管理时期出现混淆立法权和行政权的趋势，而全然不是临时政府合法性的不足和软弱（这两者事实上成了布尔什维克专政的真正来源）。因此，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确保政府和总统不篡权上，他们的责任性质传统上一直是俄罗斯自由主义者的口号。^⑤这一原则表现为保证部长会议和总统对立宪会议负责，这一责任既有集体性质，又有个人特征（政府和总统的所有决定都要加上承担个人责任的相应部长的签字）。被建议的制度“区别于各种宪法的一般文本”，其

① Линц Х. Крушение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х режимов: кризис, разрушение и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равновесия// Проблемы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Вашингтон, 1993, № 39-40.

② Троцкий Л.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М.,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7. Т.1. С. 155-156.

③ Шайо А. Самоограничение власти. Краткий курс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ализма. М., Юрист, 1999. С.11-16.

④ Открытие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го собрания: справка, составленная делопроизводством Юридического совещания// ГАРФ. Ф. 1792. Оп. 1. Д. 5. Л. 159-166; Проект закона об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временной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ой власти при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м собрании//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ые проекты в России XVIII-XX в. М., ИРИ РАН, 2000. С.769-771.

⑤ Гессен В.М. Русское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и выборы в него. Пг., Слово, 1917.

优势被认为在于“议会管理原则的直接表达”。^① 同时，作者们意识到，在保留立宪会议的无上权力和随时可以重选总统的可能性的情况下，议会制原则不可能完全实现。但是，他们希望修正了的方针将按部长们的、而不是行政首脑的责任路线实行。

政权划分的这种结构（就像已经指出的那样，其样板是 1873-1875 年的法国模式）预见到临时总统制所具有的一定的政治作用。所有的行政权——观察法律的执行、官员的任命、法令的颁布和实施对外政策——形式上都集中在临时总统手中。但是，由于取消了他通过重要涉外法令的权力（签订条约、宣布战争和缔结和平）——这些法令应该直接源自立宪会议，他签署的法令必须有相应部长的副署，而且他任期极短（选举任职一年），其全权范围因此严重受限。显然，这一制度在俄罗斯是很难实现的（社会矛盾的尖锐性要求有强有力的执政权）。理论上，这一制度可以在立宪革命过渡时期达成社会一致方面起到正面的作用，保障民主、合法地通过新的基本法。但是，这一时代的现实选择，更多的是对各种可能的专政形式中某一种的偏重——苏维埃式或波拿巴式。

一个主要的战略性错误成为被考察的过渡时期权力结构的总的结果。这一错误是立宪会议制宪权（конституирующая власть）和临时政府行政权（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ая власть）的戏剧性脱离，后者不可避免地具有临时的、不稳定的和不合法的特点。同时代人把俄国采纳立宪会议理念评价为是过渡时期最主要的错误。这种评价是公正的。^② 在彼得堡的法国大使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指出，“假如立宪会议没被拖延的话，俄罗斯就能避免十月革命”。^③ 考察法国使节 1917 年发自俄国的报告资料，可以看到，人们渴望保障民主力量的统一，积极准备召开民主会议和预备国会，将其作为召开制宪会议的预备阶段。^④ 比较研究表明，除了外部原因，制宪议会的工作成果还由其自身结构确定。在历史上和现代社会中，在制定有效宪法中取得成功的是这样一些制宪会议：它们在最佳时刻运作，组织得更好，共同的激情使其结合在一起，同时又能非常专业地运作。相反，那些不具备这些特质的则遭到了失败，错过了通过宪法的时间，也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行政权。

① Проект закона об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временной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ой власти при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м собрании//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ые проекты в России XVIII-XX в. М., ИРИ РАН, 2000. С.769-771.

② Родзянко М.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 и февральская 1917 года революция// Архив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издаваемый Г.В.Гессеном. Берлин, 1922. Т. VI. С. 19.

③ Noulans J, *Mon Ambassade en Russie Soviétique, 1917-1919*, Paris, 1933.

④ Эти документы (П.Буайе, Ж.Пагуйе, А.Мазона) представлены в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архивах Франции: Медушевский А.Н. Роспуск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го собрания и оппозиционны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артии России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французских донесений) // 1917 год и российский парламентаризм. Спб., 1998. С.97-102. См. также: Anatole de Mounzie, *Petit Manuel de la Russie Nouvelle*, Ed. Revue et corrigée. Paris, Librairie de Firmin-Didot, 1931, pp.103-104.

俄罗斯形势的主要特点是：存在一个幻想，认为所有政党有可能统一方法，在立宪会议思想的基础上解决过渡制度的问题。在二月革命时期的俄罗斯，立宪会议的思想充分汇集了完全相反的内容：右翼和左翼政党以各种不同的制宪权的法国模式及其民族诠释（从恢复君主制到成立社会共和国）为指针，更不要说它们纲领上的分歧。因此，在制造政党有可能统一的外部表象的同时，作为人民自主意志表现的立宪会议的思想，实际上并不包含解决宪法冲突的结构机制（只有通过艰难对话和相互妥协的途径才能解决），在时间上拖延了冲突的解决，还不允许人们依靠政权的现有制度。天真地相信制宪会议是一个巩固民主共和的因素——这是拒绝召开国家杜马和赋予其宪法会议功能的最主要的原因。而在俄罗斯产生的后果是：错失了团结温和的政治力量、通过临时宪法（克服双重政权）和在它的基础上实现新政权的及时合法性的机会。

六、达成各政党一致、通过民主宪法和 解决新政权合法性问题的机会是怎样错失的

克服过渡时期合法性危机的可能性由三种因素决定：各种政治力量达成协议、新宪法的制定和随后民主革命事实的合法化。二月革命后，在俄罗斯，这些可能性没有一个得到实现。史料使我们能够复原这条道路上错失的可能性。

拒绝召开国家杜马（可能，扩大成员范围），以及在此之后把它变成制宪会议——国民大会（就像罗坚科建议的那样）被认为是在这种情势下错失的第一种可能性。国家杜马新的结构，比如说，可以通过向它增补所有政党的代表、包括革命政党的代表的途径来建立。另一种方式是：为此召集先前四届国家杜马的成员，并宣布由他们组成国民大会，能够制定国家的过渡宪法，随后将其提交全民公决（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做的）。这一制度（国家杜马基础上的国民大会）具有无法比拟的更多的合法性，它从政治舞台上挤走像苏维埃那样的替代制度（在其形成之初就终结了双重执政局面），保证主要政党之间的谈判进程，通过相互协调的方式把它们团结联系在一起（例如，就像西班牙和 20 世纪末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在过渡进程条件下的政党联合）。民主、共和制的普遍价值，将战争持续到底，还有对破坏性行为的相互拒绝都能成为条件。它允许建立一个依靠重要政党的联合政府，保障它们之间重新分配权力，将左翼政党整合到政治进程中并迈向制定新宪法。这种合法化因政权继承性的固定性质——把它从君主那里直接转交给杜马——而能得到保障。形式上，这一程序要求，皇帝尼古拉二世退位并把最高权力转交给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大公、后者又拒绝皇位等，都应该在国家杜马的公开大会上发生。国家杜

马于是成为最高权力的承载者和临时政府要对其负责的机构。这就是国家杜马主席（М·В·罗坚科）的方案。^①

主要政党以相互妥协和商定共同目标（排除极端主义者并建立一个工作效率高的联合政府）的途径达成协议，这一做法的失败导致另一个错失成为可能。事件的参与者承认这一事实：为就关乎国家统一完整的原则问题——战争与和平、农业改革以及未来宪法制度的内容参数达成共识，应与各种政治力量进行广泛的协商。尽管这些尝试并未得以实现，但这没有降低其在未来的意义。这显示，能够通过协商向民主过渡的认识，作为最起码的理想，曾经存在过。这一可能性被世界上其它民主过渡的经验所证实，例如在南欧、去共产主义化阶段的东欧（政府与反对派的圆桌会议）、非洲（实行南非共和国宪法）和拉丁美洲。^②

在二月革命后的俄罗斯，这一趋势在一系列制度中得到考察研究：国家会议、民主会议、预备议会（共和国苏维埃）和执政内阁。它们存在的事实表明，进行过对这一方向的探索。文献中记载的通常是这些制度的负面结果，它们的无效性和拖延的特性。民主会议是革命前夕创造社会和谐的最后尝试。民主会议建立的预备议会，主要因为布尔什维克妨碍议事而变成了一个没有活力的制度。两者也同时被温和党派所拒绝。^③对于全俄民主委员会或俄罗斯共和国临时苏维埃可能做出的建设性贡献研究甚少。至少有过三种预备议会的机构方案：М·С·阿杰莫夫方案、^④Н·И·拉扎列夫斯基方案^⑤和第三种妥协性方案，^⑥而在法律会议中就此进行的激烈讨论廓清了不同的方式。^⑦假如这一可能性没有错失，它可以，比如，在所谓的“协和式民主”（консоциативн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 consociational democracy）框架内稳定形势（精英们背着群众达成协议以预防各方面转向用议会外的方式、“街头”的方式解决冲突）。^⑧要知道，走出尖锐民族冲突（加拿大）、种族隔离制度（南非）、军事独裁（南欧

① Родзянко М.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 и февральская 1917 года революция// Архив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издаваемый Г.В.Гессеном, Берлин, 1922. Т. VI. С. 70.

② *Constitutionalism and Democracy: Transitions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1993; *The Revolutions of 1989*, Ed. Tismaneanu V.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③ Архив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Т.8: Журналы заседаний Временн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март-октябрь 1917 г. Вып. 1-4. М., 2001-2005; См. также: Руднева С.Е. Предпарламент: октябрь 1917 г.: опыт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и. М., Наука, 2006.

④ ГАРФ. Ф.1792 (Юридическое совещание). Оп.1 Д. 4. Л.186-194.

⑤ ГАРФ. Ф. 1792. Оп.1. Д.4. Л. 196-199.

⑥ Проект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Временн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об учреждении ВСРП и Положение о нем// ГАРФ. Д.4. Л. 211-217.

⑦ Различие взглядов на этот институт отражено в прессе в связи с его открытием: Речь № 237 (3979) от Воскресенья 8 (21) октября 1917 г. С.2. 另可参见 Керенский А.Ф. Прелюдия к большевизму. М., Центрполиграф, 2006.

⑧ Лейпхарт А. Демократия в многосоставных обществах. М., Аспект-пресс, 1997; Либеральны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М., РОССПЭН, 2001.

和拉丁美洲)或一党专政(东欧)——这些现代经验表明,在存在政治意志的同时也能成功避免国会制的瓦解。

第三个被错失的可能性,是在双重政权开始形成时,临时政府有意识地拒绝通过宪法克服这一现象。罗坚科的回忆录记录着这些可能性,甚至包含“临时政府的错误”这一章。他认为:“作为部长会议主席的利沃夫公爵及其所有同事最根本和最致命性的错误是,他们没有立刻从根本上制止动摇重新建立的政权的尝试;错误还在于,他们完全不想召开作为工兵代表苏维埃对立面的国家杜马。政府原本可以把国家杜马当作最高权力的载体始终依靠,与所宣称的‘深化革命’原则作斗争,该原则实际上标志着民族政治革命向社会国际革命发展”。临时政府只得在所有的行为中依靠必择其一的左翼制度,“因此,它显然失去了平衡,被卷入首都日益高涨的革命情绪的漩涡中,自然,无力坚持自己采取的原则——缓和国家状况并把它引向立宪会议。这就是利沃夫公爵,还有那些在当时进入国家内部生活领导人圈子的温和分子们因自己的优柔寡断而犯下的严重错误”。^①

第四种错失的可能性是拒绝利用“立法因素”。在民族情绪高涨的形势下,原本是可以过渡时期的临时民主宪法的。在接受了立宪会议的思想之后,立宪民主党人千方百计把会议的召开拖延至某一不确定的日期。著名立宪民主党人——米柳科夫、纳博科夫、科科什金等人,并不认为确定开会日期是必要的。他们认为,在战争、自发集会和地方上缺乏行政基本设施的条件下,这样做并不适宜。^②梅利古诺夫总结道:“这样或者那样,犯下了一个无比严重、致命并且是无法弥补的革命的战略性错误。这一错误犯得既是善意的(*bona fide*),又是恶意的(*mala fide*)。说善意,是就其国家法专家的教条而言,说恶意,是就其短视考虑而言。这种考虑是:拖延决定性的时刻,寄希望于条件的改变:在这样一些条件下能组织起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立法机构。^③延长不确定的形势(长时间地拖延立宪会议的召开),导致了民主政权合法性的破坏,把它变成了极端主义势力能轻易获取的猎物。不确定形势的延长加深了冲突。在没有为临时政府增添合法性的同时,这种延长却向立宪会议的激进批评者们提供了优势。批评者们呼吁把这一制度当作与临时政府对立的选择,因为“临时政府”这一名称本身就是自己对自己的否定。

这些策略性错误的原因是什么?总体上,它们源于我们在前面考察的立法权和行政权相互关系的那种不正确(在革命条件下没有实现的)结构。拒绝在尼古拉二

① Родзянко М.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 и февральская 1917 года революция// Архив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издаваемый Г.В.Гессеном, Берлин, 1922. Т. VI..С.70.

② Основания этого перечислены Ф.Ф. Кокошкиным// Речь. № 73 (3815). Вторник, 28 марта 1917 г. С.3.

③ Мельгунов С.П. Мартовские дни 1917 года. Париж, 1961. С. 442.

世退位后立刻召开国家杜马并把它变成国民大会，拒绝在革命期待的高峰时刻通过临时宪法的机会，以及拒绝在沙皇退位和米哈伊尔大公拒绝权力后召开杜马。这些都同这样一种认识有关：即其中任何一种举措都能成为顺利、迅速地召开立宪会议的障碍。然而，对于最后的条件，“所有的政党都看法一致，答应在这种情况下集合在已成立的临时政府的周围，支持它并且把全权转交给它。所以只得选择这一中间的道路”。^①

但是，从被引用的论据出发，这些策略错误的原因能够得到具体的说明。论据分成三类：法学上的、学理上的和策略上的。第一类论据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临时政府大部分活动家是法学家或者把建立法制国家看成是二月革命的主要目的。不管国家杜马主席如何坚决主张召开杜马的必要性，立宪民主党的法学家们（和他们站在一起的还有杜马中所有的左翼人士）则在下列论据的基础上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如果现行宪法依然有效，那么，在召开国家杜马时必须召开国务委员会会议。^②但是，若从他们的观点出发，就无法为这种解释找到有根据的法律基础。

另一类——学理上的论据与关于革命阶段的社会学理论有关，这些理论以西方革命的经验为支撑。根据这些理论，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排除了其迅速“发展”成为社会革命（这是极左派所希望的）的可能性。^③立宪民主党派活动家们认为，召开国家杜马本身是无益的，因为，毫无疑问，杜马就其组成是“资产阶级”的，会成为“革命民主”极端分子攻击的目标，目的旨在推翻杜马，建立国家大会或者另一个更符合大众革命期待的大会。立宪民主党人认为，在政权两种类型已开始对立的条件下，杜马的召开将给予苏维埃的拥护者们以批判它的机会并削弱政府。但是他们没有发现另一种可能性——杜马转变成国民会议能够促进苏维埃的中立性。

第三类论据，即具有策略特点的论据，是由立宪民主党对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一个过渡（或临时）政府手中的可理解的追求决定的。下面一点被多次指出：在国家现有状况下应该有一个具有绝对完整权力——直到确立法律——的政府，因为伴随着革命的过火行为的事件会要求采取非常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对获得杜马合法性的需要会妨碍政府在进行战争和建设国内生活时的活动。立宪民主党活动家在

① Родзянко М.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 и февральская 1917 года революция// Архив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издаваемый Г.В.Гессеном, Берлин, 1922. Т. VI. С.72; Лозунг созыва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го собрани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разделяли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все оппозиционные самодержавию партии. См.: Программы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России. Конец XIX- начало XX века. М., 1995.

② Соотношение Думы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совета было предметом дебатов на всех стадиях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ых изменений. См.: Таганцев Н.С. Пережитое. Пг.,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типография, 1919. Т.1-2.

③ Об этих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х: Суханов Н. Записки о революции. М., 1991. Т.1.

铭记先前经验的同时，对召开享有充分权利的现行杜马态度冷淡，将其视为对自己全权的一种限制。^①

立宪民主党被那些关于议会制的老观念所左右，这些观念来自与专制制度斗争时代，难以反映新的政治现实。总的来说，立宪民主党的立场可以被认为是临时政府消极的原因。

七、所谓的双重政权和克服双重政权的可供选择的方法

关于双重政权不可避免地导致有利于独裁的结果的论题，长期被独裁的拥护者们所推广，在现代科学中能获得重新审视。为了弄清这一问题，必须重新审视一系列历史编纂学概念，而其再现时的稳定性使它们不能更多地令人信服。

第一种概念——双重政权的“阶级”理论——把双重政权看作是发生在革命危机条件下的两个势均力敌阶级的力量碰撞。按照这一看法，双重政权在实质上是社会危机的制度：它标志着社会极化的最高程度，包含潜在的或是公开的国内战争。拒绝双重政权的“阶级”理论并以制度理论取代它，可以把双重政权看作是一个更加普遍的社会现象——在尚未确定社会选择的情况下，两种（或是更多）政治制度的最大平衡。广义上的双重政权是法律秩序（捍卫法律体系的稳定）和无秩序（无政府主义，包括“庶民无意义的过火行为”和犯罪分子大行其道）间的力量对比。在这样的前景展望中，俄国革命双重政权的出现，是宪法冲突的部分现象。民主宪法的拥护者和反对者——而不是阶级——应该被认为是冲突对立的双方。遵循合理选择理论的逻辑，重要的是不仅要弄清解决冲突的最终转折点是什么，还要弄清是哪些制度和心理因素（社会期望）决定着冲突各阶段政治体系转型的矢量。双重政权，如同相对立宪制所展示的那样，并不意味着政权的平均分配或者政权形式上的划分安排。这是统一政权按照（冲突过程中）变化着的各种力量的对比进行的裂变。这些细微差异体现在当时人们的评定中：双重政权是政权的两种制度的冲突（米留科夫），是阶级的冲突（列宁），或是它们不稳定的相互关系——“双重无政府状态”（托洛茨基），是一种接近无政府状态的状态（梅利古诺夫）。^② 这使人们在描述过渡时期政治史时，对“双重政权”概念本身的同一性提出质疑，并且推测，由君主制崩溃引起的制度的不稳定，首先是与临时政府有意识地拒绝依靠行政权的现行体系、又不提出任何替代物有关。结果，潜在的“双重政权”变成了现实，而社会的

^① Милуков П.Н. История Второй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М., 2001.

^② Эти определения двоевластия представлены в кн.: Мельгунов С.П. Мартовские дни 1917 года. Париж, 1961. С.74.

选择最后却是如此的不合理——有利于破坏性的、反立宪的力量，它们在制度上由所谓的“苏维埃民主”的代替性体系来代表。^①

另一种概念——即苏维埃是俄罗斯的特色（为了论证这种观点甚至运用了“反向”理论）——运用比较资料是很容易被驳倒的。双重政权绝对不是俄罗斯的特征。在有关各种委员会、团体和其他一系列类似的自行宣布成立的机构的文献中，苏维埃体系（作为一个古老的结构，不擅管理，但却是动员所有反立法的破坏力量、包括犯罪分子的一种手段）的样式得到展现。我们指出，俄罗斯的苏维埃、伊朗的委员会以及西班牙和墨西哥的团体，实质是直接民主制度的变体。正如O·安瓦依列尔所指出的那样，它们的原型不仅是巴黎公社的革命制度或者是法国革命时期的巴黎区段，还是更早之前的制度——克伦威尔的士兵委员会、英国革命的鼓动者们。^② 在所有大革命的过程中，直接民主这一形式履行着动员大众的功能，并且能够被各种政治力量成功利用以掌握政权。之后，对这些政党的需求就会跌落（囿于自己的天性它们不可能成为现实的政权制度），最多在名义上的立宪制的条件下，作为装饰而被保留（就像1921年喀琅施塔得起义后俄罗斯的情形）。^③ 对伊朗立宪革命的考察显示，这种形式甚至完全能同伊斯兰教界那些墨守成规的宗教概念相容并存。^④ 就像所有广泛的联合一样，委员会（苏维埃）反映着“大众的基础性”，只是在有着政治先锋队的转折时期具有意义。正因为如此，托洛茨基后来认为，在中国、西班牙和拉丁美洲采用苏维埃方式是合理的。在这些地方，这种形式同农村公社的传统有很多共同点。^⑤ 苏维埃在各个地方都成了一种政治形式，临时政府自由议会制的反对者们利用这种形式来破坏立法体制。在所有情况下，苏维埃都是操纵大众的制度。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列宁和托洛茨基）都非常理解这一点，将苏维埃视为夺取政权的工具，可以从战术角度出发来操纵这一工具（根据他们是否拥有多数而改变关于委员会的口号）。^⑥ 因此，苏维埃只是获取政权的一种过渡方式。就像是列宁所说的，苏维埃只是政权决定体系的一种辅助性因素，万不得已时，就会被抛弃或以其他大众性机构取而代之。

①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о советах как «суррогатной» системе власти дается в юрид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эмиграции: Timashev N, *Grundzüge des Sovetrussischen Staatsrechts*, Breslau, Osteurope-Institut, 1925; Mirkine-Guetzevitch B, *La théorie générale de l'Etat soviétique*, Paris, 1928.

② Anweiler O., *Die Rätebewegung in Russland, 1905-1921*, Leiden, Brill, 1958. S. 234-235.

③ Вишняк М. Кронштадт//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 1921. № IV. С. 359.

④ Afary J, *The Iranian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1906-1911*, New-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⑤ Коминтерн и гражданская война в Испании. М., 2001.

⑥ Об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и большевиками анархистских лозунгов для мобилизации люмпенизированных слоев: Алексинский Г. Война и революция. Пг., М. Ясный, 1917. С.38-39.

第三个概念——接受苏维埃在革命中公开的功能，有损其主要的、但是隐蔽（隐匿）的功能。如果苏维埃公开的功能被看作是直接民主的实现，那么，真实（隐匿）的功能则体现在动员社会支持和使集体主义者专政的建立合法化当中。以立宪会议形式出现的自由主义确定权理念，是与“苏维埃民主”（苏维埃代表大会）理念相对立的。而后者，由于其明显的无效性而向一党专政原则让了步。在革命危机的情形下，苏维埃的合法性是必须的，如果不是为了军事变革，也是为了以后保持政权。因此，十月革命前夕众所周知的党内冲突的实质便可明了，革命事实上是苏维埃公开与潜在功能的拥护者们的分裂。前者（如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沉湎于玩苏维埃民主的“宪法游戏”，真的以为立宪会议和苏维埃的联合已经实现。他们把这种联合看作是现实的政治妥协，这种妥协能让布尔什维克在将来的制宪会议中以反对党的身份为权利而战。后者只将苏维埃看作是夺取政权的技术工具，坚决反对类似的妥协。列宁本人最坚定地反对“初步寻找取得政权合法形式”这一问题的提出。他的“天才的机会主义”与“政治上的毫不留情”相结合，表现在对战术性口号的快速更换上。这些口号虽然曾使一党制的拥护者们“震惊”，甚至使他们感到“野蛮”，但是后来却“带来了无比丰厚的成果”。^①

转向把苏维埃作为政权的替代机构来利用这种思想——这是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作某种无政府主义的修正。但这一异端邪说，后来却在“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被官方历史编纂学所接纳。它的思想家们真实地总结道：“如果列宁为马克思主义的字句所束缚，不敢用苏维埃共和国这一适合新的历史形势的新原理来代替恩格斯所表述的马克思主义的旧原理，那末党、我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会是什么情况呢？党就会在黑暗中徘徊，苏维埃就会瓦解，我们就不会有苏维埃政权，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会遭到严重的损害。无产阶级就会遭到失败，无产阶级的敌人就会获得胜利”。^②

在政权真空的形势下，苏维埃体制清楚地表现出了它的潜藏功能：它为阴谋的伪装效力，为逐步建立起对政权的宪法制度进行控制效力。这一目的达到后（10月24日晚之前），当不再需要“用传统双重政权的遗迹来进行掩饰”时，完全“剪断合法性的脐带”就没有什么困难了。^③ 由此，苏维埃体制不是作为一种管理体系，而是更多地作为革命的上层人物用以进行社会动员、获取和保持政权的工具而表现出它的重要性。

① «Гениальный оппортунизм Ленина» признавался соратниками: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А.В. Великий переворот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Пб., Изд. З.И.Гржебина, 1919. С. 70, 80-81.

② История всесоюзн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 Краткий курс.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комиссии ЦК ВКП (б). Одобрен ЦК ВКП (б). 1938 год. М.,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1950. С. 341.

③ Троцкий Л.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М.,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7. Т. 2.2. С.117.

第四种概念——关于无法对走出双重政权的可供选择的情势进行比较和模式化的论题。在比较的前景中，存在着两种相反的解决双重政权问题的方式，一种有利于由极端主义者来获取政权，另一种有利于保持立法秩序和民主自由。我们通过比较资料来考察一下这两种情况的例子。第一种模式在俄罗斯和后来的伊朗（1979年革命）实现。伊斯兰共和国开始于两个平行的权力中心的形成。一个是由临时政府和国家形式上的制度来代表、包括以巴扎尔甘和他周围的自由主义者为首的官僚和武装力量；另一个则是由革命委员会和宗教影子政府来代表，特别是由以霍梅尼及其平民主义追随者们为首的委员会为代表。伊朗事件的发展同1917年俄国革命的进程十分相像，因此，往往将两者进行比较。在这两种情况下，事件的逻辑从消灭了君主制的自发性革命爆发导向自由派临时政府的形成，临时政府筹备立宪会议，但停止了对形势的控制。在这两场革命的进程中，当政权的自发的和伪民主的结构——苏维埃或委员会（伊朗革命）与临时政府相对立时，就出现了著名的“双重政权”现象。因讨论宪法，他们之间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最终，在这两场革命中，权力没有被人民掌握，而是落入了革命先锋队手中——在俄罗斯是党，在伊朗是僧侣。这些进程的结果，是民主立宪会议的思想被古老的政治制度所替代，这一制度通过了剥夺人民主权并有利于被挑选出来的政治上的少数人的宪法。这些进程表现了俄国革命和伊朗革命的相似之处。就像布尔什维克用以与立宪会议对立的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一样，霍梅尼通过建立专家大会解决了问题。在这两种情形之下，“公正的道路”并不是由民主的确定权确定的，而是由确定权在社会因素的针对性选择结果中得到的代替品来确定的，这些社会因素能够支持已经建立起来的制度。^①相应地，立法过程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循环：从废除君主制和宣布成立民主共和国开始，结束于独裁的确立。这种独裁同君主制相似，但在对社会监控的强度上要优于它。

解决双重政权问题的另一个方法是葡萄牙提供的（1974年康乃馨革命）。在M·卡埃塔诺的独裁政府被推翻后，1974年4月25日的军事政变使军政府掌握了政权，右派力量的瓦解导致了政党平衡的天平倒向了左派的一方，就像在俄国二月革命的进程中出现的情况那样。在权力真空的条件下，只有这两种力量——军人和共产党人——展现出有效的能力。葡萄牙过渡过程的特点是，军政府同各政党之间关系紧张，各政党间变化着的权力平衡被定位为“双重政权”。在这样的条件下，社会党政府的作用取决于保持“国家”发展向量、使建立左翼或者右翼独裁的企图丧失生命力

^① Amjad M., *Iran. From Royal Dictatorship to Theocracy*, N.Y., Greenwood Press, 1989; Arjomand S.A., *The Turban for the Crown. The Islamic Revolution in Iran*, New-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的能力。^①这个目标随着 1976 年宪法的通过而得以实现，该宪法巩固了过渡时期政权的妥协结构。力量的平衡（或者是双重政权）逐渐转移到温和党派的领域（以及平行发生的宪法转型的过程）。摆脱冲突在向民主制度前进中得到了实现。

第五个也是主要的历史编纂学的偏见是——事件运动的不可避免性。双重政权（甚至如果不对它作阶级诠释）的确潜在地包含着国内战争的危险，但是这种潜在的可能性有可能不会成为现实。所有描述俄国革命的理论都不自觉地从阶段更替的不可避免性出发对阶段进行模式化。在所有激进的革命中，都有一个著名的政权转移公式在发生作用：从右派（保守主义者）向中心（温和人士）和左派（激进分子）转移。在这个转移过程中，权力变得更加集中，其社会基础日益收窄，因为在每一次重要的经济危机过程中，失败的集团都会被抛出政治。K·布林顿的这一公式是在所有大革命素材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既适用于俄国和法国革命，也适用于伊朗革命。^②但是，只要去掉一个因素——革命周期的自发的阶段替换，这种模式就会及时中止。

临时政府的错误在于：在允许苏维埃作为必择其一的权力的合法源泉存在之后，没有在八月和七月的危机中抑制住它。^③在革命危机展开的情况下，著名的自由主义者П·А·米留科夫和П·И·诺夫哥罗采夫拥护独裁，认为独裁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相排斥，并且采取了一系列组织可能的政变的实际步骤。诺夫哥罗采夫认为，既然与外部敌人的战争已经开始，就不应该保留内部的敌人。在 1917 年 8 月 11-12 日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他把工人代表苏维埃认定为内部的敌人，认为必须消灭。他思考后总的结论是：“应该结束布尔什维克革命”。^④

因此，没有摆脱双重政权的必然性：很长时间存在着通过利用谈判、联合、最终还有武装力量来扭转形势的可能性。第一、潜在的双重政权不一定要变成现实的。第二、隐匿（隐藏）的双重政权不一定要成为公开的。第三、即使在公开的双重政权的情况下，也可能存在着与权力确定制度的各种法律关系有关的政治机动（比起苏维埃的隐匿功能，更倾向于它的公开—宣言式功能）。民主政权垮台的原因在于其缺乏政治意志、杠杆和技术。

① Oliveira Martines G. Portugal, *Instituições e Factos*, Lisboa, Casa da Moeda, 1991; Mavrias K.G., *Transition démocratique et Changement Constitutionnel en Europe du Sud. Espagne-Grèce-Portugal*. Athènes, N.Sakkoulas, 1997.

② Brinton C., *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 New-York, Vintage Books, 1952, p.130.

③ Разреш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ого кризиса. Ликвидация мятежа. Дело Ленина// Речь № 156 – 170 (за июль – начало августа 1917 г.).

④ Протоколы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М., РОССПЭН, 1998. Т.3 (1915-1920 гг.). С.384.

八、判定政治体系向量的决定因素——政变的方法

在立宪和反立宪力量“最大平衡”的情势下，执掌和夺取政权的战术问题就成了决定性问题。要解决问题就需要重新审视对所谓自发的革命和有组织的革命的认识、革命和政变的相互关系，需要对比政变的各种方式、新政权合法化问题的解决、方法与思想的相互关系以及保护民主、反对反立宪政变的前景。^①

首先，我们要指出，将革命分成自发的和有组织的这一做法具有争议性。这种分类（正是作为对1917年俄国革命研究的结果出现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中的）具有相对的性质。如果法律的连续性被打破的事实存在，那么从法律角度来看，革命和政变之间没有差别。从政治学角度来看，革命要求的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有别于政变——精英群体的作为。按照这一逻辑，根据定义，所有的革命都具有自发性质，而政变则具有组织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俄国的二月革命有着自发性质，而十月革命则具有组织性，也就是政变。二月革命取得成功，“与其归因于爆发的力量，不如说是由于抵抗的软弱”，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则是在“预先确定的时间”里秘密计划实现的结果。^②上层及时发动的政变与“国家自发性爆炸”是相互排斥的。这在米留科夫基于青年土耳其党（土耳其“团结进步党”）革命经验的理念框架内是可能的，但是由于缺乏政治意志而未能实现。托洛茨基指出：“很显然，古奇科夫和克雷莫夫斯基的事业没有超出为了葡萄酒和雪茄而发出一些爱国叹息的范围。轻率的贵族闹事者，如同笨重的财阀政治反对派一样，还是没有在自身找到勇气，在不招待见的活计的路径上修正行为”。^③

对于区分新老形式的变革，方法问题具有关键意义。对在等级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经典政治理论的认识、对在群众性社会新条件下的资格选举制度和经典议会制的认识，都显得无效。对于寡头政治变革的传统理念，布尔什维克能用新观点与之相对立。托洛茨基研究的关于政变新方式的内容包含下列参数：议会外力量的群众性动员，实施目的在于获得战略性沟通以代替对政权的直接制度形成冲击的“看不见的手腕”，对区分自发性革命（如二月革命）和有组织革命（按科学的计划和明确的时间实施）的认识。新方式的本质，就像K·马拉帕尔杰雅尔指出的那样，在于通过“看不见的手腕”筹备政变。这些手腕的目的，是在小型军事团体的帮助下逐步建立起对技术性沟通的监督。这一战术可以在没有公开的政治表达和不与现存法律

① Медушевский А.Н. Технологии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ых переворотов//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е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2006. № 3 (56). С.3-23.

② Троцкий Л.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М.,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7. Т. 2.2. С.322.

③ Троцкий Л. Указ. Соч. Т. 1. С.96.

体系作形式上决裂的情况下达到希望的结果——将权力集中到政变拥护者总部的手中。克伦斯基政府，就像当时其他任何一个民主政府一样，都可以只用警察行动来对抗这一战术。警察行动是传统的、因而也是效果甚微的，目的只是在于对付政治抗议的公开而具有破坏性的表现。民主的拥护者把保护国家的问题看作是纯粹通过警察部队就能解决的问题（对抗公开武装起义），他们因此无力阻止政变的蔓延。^①与源自无产阶级革命抽象概念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正统立场观点相反，1917年10月25日的政变因其新的方式而如此高效地得以实现了。^②

必须解决政权合法化的问题，是新型政变方式的核心特征。对于原则上否定立宪会议思想的快速政变的支持者们（在任何情况下，他们在立宪会议里都只占少数）来说，主要的问题则在于对待苏维埃合法性的态度上。强加给中央选举委员会旧领导者的关于紧急召开非常代表大会的决定，源于对确保苏维埃合法性的追求。这一决定对布尔什维克而言所具有的优势是：“预先消除了关于代表大会全权性的争论，并且允许在妥协主义分子自己的协助下击垮他们”。政变获得了“苏维埃合法性”的光环。^③

这一合法性与政变的相互关系应该是怎样的——政变应该发生在代表大会前夕（将它置于事实之前）、代表大会举行期间或是之后——对此的争论仍在继续着。结果，在中央委员会出现了三派：反对夺权者、将起义与代表大会联系在一起的支持者和列宁，他号召毫不迟疑地组织武装起义而不依赖苏维埃。如果列宁更倾向于在召开代表大会之前实现政权的实际获取，那么托洛茨基则强调其（起义和苏维埃代表大会）同时进行的优越性。在这两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都使代表大会面对既成事实。然而，两种途径重要的原则性区别在于新政权合法性的性质。在第一种情况下，进行的是所谓的“随后合法化”；在第二种情况下，是对于新制度更为有利的“直接合法化”。在关于列宁的回忆录中（“政变”这一章），托洛茨基评论了自己同列宁关于起事日期问题的争论。托洛茨基证实，一直到10月25日晚上之前，列宁始终认为秘密夺权是可能的。他在得知军事政变进展成功的消息后的反应很能说明问题：“列宁很兴奋，表现为欢呼、大笑，并高兴得搓手。随后，他开始沉默，

① Malaparte C., *Technique du Coup d'Etat*, Paris, Bernard Grasset, 1966 (1992); Malaparte C., *Le Bonhomme Lénine*, Paris, 1931.

② *Archives de Préfecture de Police* (Cabinet du Préfet). М 6 (Curzio Malaparte). Досье на Малапарте 1931г. Подробнее: Медушевский А.Н. Как научить демократию защищаться: Курцио Малапарте как теоретик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переворотов// Вестник Европы. 2002. № 4.

③ Троцкий Л.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М.,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7. Т. 2.2. С. 75.

想了想说：“那，这样也可以。只要能获得政权。”我明白了，他只是在这一刻才最终接受我们拒绝密谋夺权的做法”。^①

政变新方式（就像所有其他方式）的重要特点是，它能够不取决于运动的社会（阶级）内容而被采用：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所制订的方式后来被各种流派的反议会运动成功运用。托洛茨基指出了布尔什维克专政建立的独创模式与后来发生的法西斯主义政变之间本质上的共同特征（从夺取和掌握政权方式的角度看，依照他的观点，法西斯主义政变并没有搞出多少新的东西）。他写道：“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他们的一切都是借鉴和模仿来的。墨索里尼抄袭了布尔什维克。而希特勒则模仿了布尔什维克和墨索里尼。”^② Н·乌斯特利亚罗夫也指出了这种获得政权的方式的相似之处。^③ 议会民主制在俄罗斯的破产，所以，是个局部事件，也是欧洲议会制危机和在欧洲建立专制制度的第一次体现。专制制度的外在形式（从国家权力机构角度）表现出了丰富的多样性：无个性特点的苏维埃式一党专政，在国家元首或多或少象征性领导下的总理专政（君主领导下的墨索里尼和普里莫·德·里维拉，总统领导下的瓦尔德马尔），国家元首的直接专政（凯末尔和塞尔维亚的亚历山大），不出现在前台的个人专政（毕苏茨基）。^④ 但是，这些制度的共同点是，有意识地拒绝法律国家和个性自由的原则，反对议会民主和政治多元化，依靠武装力量和针对反对者的恐怖政策。它们的出现是政变的结果，但它们竭力通过各种冒牌的代表机构（如人民大会、苏维埃、工会或者其它社会支持的杂交形式）使自身的存在合法化。

关于针对意识形态纲领方法的中立性问题的提出，为解决保护民主、反对各种流派的反立宪政变问题提供了新的前景。在当代“颜色”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中，这一点也受到了注意。“颜色”革命运用大众动员和非议会活动的方式。^⑤ 如同所有的科学发现一样，政变的技术——自身是一个在伦理上中性的概念。同所有的技术一样，它积蓄一定的经验和知识，并以著名的行动纲领的形式来体现它们。这一对待政治的“技术”方法，要求放弃对历史客观规律不可避免的作用的幼稚认识，而强调这样一些因素：如意志、目的以及达到目的的艺术。

① Силуэты: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ортреты.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91. С.70

② Троцкий Л. Сталин. М., Терра, 1990. Т.1. С. 9.

③ Устрялов Н. Итальянский фашизм. Харбин, 1928.

④ Carlton E, *The State Against the Stat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Coup d'Etat*, Oxford, 1997.

⑤ Шарп Дж. От диктатуры к демократии. Стратегия и тактика освобождения. М., Нов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2005.

九、从现代历史经验的角度看民主在俄罗斯破灭的教训

二十世纪的历史记载着不少宪政革命的案例，这些革命面对着在一个没有准备好的国度里快速实现自由民主改革的进退两难的境地。议会制度在俄罗斯的破灭是一个个别事件，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出现大众社会后欧洲议会制度经典模式危机的首次体现。在不同的国家，它有不同的体现和结果，但是，到处都会表现为拒绝习惯形式和专横运动与这些形式的冲突。

对两种革命进行道德对比是完全有理由的。М·维什尼亚克强调，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政治思想和管理方式，从捍卫权力的方法的角度看，有质的不同。“与十月革命完全相反，二月革命情愿自己被斩首，只要不去斩他人。这可以被认为是不可原谅的错误，但这就是这样。在这方面，二月革命仿佛遵循了丹东的遗训。”^①这种观点是基于对俄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比较，它们的共同结果是民主的破灭和恐怖王国的建立。^②评论家们承认，在对比语境中，二月革命看起来最多像“历史的早产儿”和“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前奏”（П·Б·斯特鲁维），而俄国民制的主要错误，在А·克伦斯基看来，是它在心理上没有估计到，反革命可能不是以右的、而是以左的极端主义的形式发生。^③但是，对现代分析家而言，对过去只给予道德和心理上的评价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弄清楚，民主在俄罗斯为什么会失败，今后如何避免发生类似的错误。

与“历史是不可以假设的”这一著名智慧相反，现代科学通过对场景的模式化，弄清其重复的原因和功能的变化，力求以此来理解过去。系统理论将革命诠释为社会组织形式的更换，结构（阶级）理论将革命（与近代西方革命的模式类似）看作是阶级力量对比变化的阶段的更替，行为主义理论认为革命是群众对于基本制度的压制作出的自发的心理反应。合并后的理论结合了三者的内容，同时强调第三种理论的作用。这些理论对解释革命无疑是作出了贡献的。但是，如同已经分析过的那样，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根本缺陷：它们否定可以管理革命的进程和调节其破坏性内容。我们建议在新制度理论框架内将临时政府的错误系统化并对其进行分析，新制度理论能使我们弄清这些错误产生的一定逻辑。

首先，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冲突不可避免地出现在每一个激进革命的过程中，临时政府未能成功地克服这一冲突。新政权不能解决其对旧政权的法律继承性问题，

① Вишняк М. Два пути (Февраль и Октябрь). Париж,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 1931. С. 195.

② Алданов М. А., *Deux revolutions*, Paris, 1921.

③ Струве П.Б. Дневник политика (1925-1935). М., Русский путь, 2004. С. 242; Керенский А. Февраль и Октябрь//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1922. Т.IX. С. 269-293.

尽管它曾有机会这样做。对于形式上的合理性，它更偏爱革命的合法性，拒绝（结果是拒绝权力的链式反应）所有可能的确保继承性的方法。结果，从形式—法律的角度来看，临时政府的成立是一场宪法政变，因为建立新的法律规则时并没有顾及现行法律的规定。新的革命政权后来要通过最快地建立制宪权（立宪会议）或者它的类似物（以召开国民大会的形式）的方式来获得合法性的做法也没有实现。

接着，制宪权（立宪会议）和宪法权（临时政府）的戏剧性脱离没有迅速地得到克服，权力因此不可避免地就具有了临时的、不稳定的和不合法的性质。在确定制宪权和宪法权相互关系时，选择了错误的宪法机制模式（赋予未来的立法者以全权，给当下的行政权带来损失）。错过了“立宪时刻”（新宪法需要在二月革命进行时或是之后立刻通过）；没有可以立刻提供给国家的现成的立宪方案（这样的方案：如能获得批准，它能立刻给政府以优势），取而代之的是制订方案的方法以集体公开讨论的形式通过，这导致了不合理的民粹主义；把未来立宪结构的问题提供给大众讨论是错误的，而在没有制订选举法、并且由于战争而难以实现选举法的情况下，又没有可能在实际上实现这一讨论的权力（在制订最成功的宪法时，机密性讨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获得采纳的立宪会议的理念成为整个民主过渡时期主要的破坏性因素：它阻碍了作为政权唯一合法载体的国家杜马的召开，没有为下列行为提供机会：及时通过民主宪法（哪怕是暂时的、工具性的，但能给政府以合法性）、达到温和政治力量的团结、克服双重政权、确保新政府在临时宪法基础上的合法性、组建一个有效和长久的（而不是暂时的）在战争和革命危机条件下必须的行政权。此外，没有为克服过渡时期的行政权真空做过任何事情。相反，在新政权建立之前，有意识地使执政权旧机构陷于瘫痪。

下面这些错失的机会成了民主过渡时期所选择的错误战略的后果：一、在立宪会议思想的基础上所有政党有可能统一方法，解决过渡时期问题——由于这一幻想认识占统治地位，失去了政治主动性；二、拒绝在沙皇退位后立刻召开国家杜马并将它变成国民大会，拒绝在革命期待高涨时通过临时宪法的可能性；三、没有有效利用协议机制的制度和程序，这些制度和程序能够确保各主要政党通过相互的战术妥协，为去除极端分子并创建一个有工作能力的过渡政府而结成联盟。就像上面已经分析展示的那样，理论上，这种可能性在这样一些制度机构中得到标示：国家协商会议、民主协商会议、预备议会（共和国苏维埃）或者甚至是执政内阁，并通过世界上其他民主过渡更为成功的经验得到证实；四、无法在双重政权形成的当口通过立宪方式来克服它；五、把不确定的形势延长到一个很长的期限，导致民主政权合法性的瓦解，使之成为极端主义力量能轻易获得的猎物。

在这种情况下，双重政权问题的解决远不是注定会发生的。我们考察了一系列史学偏见：一种与到目前为止曾经占主导地位的双重政权（作为力量的平衡）的“阶级”理论有关；另一种与关于双重政权现象的历史独特性认识有关，仿佛这只是俄国社会所固有的；第三种与对革命中苏维埃功能的一维诠释有关；第四种，与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否定事件发展的选择模式、否定对发展的另一种向量进行模式化（运用比较材料）的可能性有关；第五种与俄国革命事件发展的不可避免性有关。拒绝对这一现象作机械的阶级性诠释，使我们可以将它置于现代立法和反立法运动不稳定平衡的众多局势中来考察，而走出这些局势取决于政治精英的能力：清除破坏性民粹主义分子的力量和影响，必要时——实施国家垄断合法暴力的原则，即以武力平定“革命”。

这一政策在与苏维埃（替代机构）的关系中是能够得到完全的实行的，苏维埃不善管理，但（正是由于其古老和不定形）是极端势力操纵无知群众的理想形式。在俄国革命中，苏维埃的功能却是非常消极的，它表现在：一、动摇临时政府（从它成立之日起）；二、以苏维埃代表大会与立宪会议对立（拟议中的后者的召开，加速了布尔什维克政变的实施）；三、过渡简化到一党专政（建立党对苏维埃的专政）的合法性。但是，法律与反法律力量潜在的双重政权，并不一定会变成实际的（和法律上形成的）双重政权，而后者不会导致极端主义自动取得胜利。就像已经显示的那样，历史上有这样的例子，类似冲突以有利于宪法民主的方式解决，或者，在无法达到这一点的条件下，则以有利于建立能稳定过渡时期局势的临时专权体制的方式解决。临时政府（依靠法律和革命合法性、军事爱国主义、社会文明阶层的支持、对军队的控制、行政机构和领导人的威望盛名）曾有机会消除双重政权并且至少有三次能够阻止布尔什维克政变（在二月革命开始的时候、1917年的7月和8月）。正如布鲁斯·洛克哈特指出的那样，在临时政府的所有错误中，对于列宁而言，最宝贵是科尔尼洛夫的发言和他的失败：“科尔尼洛夫9月12日的失败为11月7日革命的成功开启了广阔的道路”。^①

在立宪不确定的条件下，确定政治体系向量的决定性因素是政变的方式。由布尔什维克发明的政变新方法的内容，归结为把所谓的“自发性”革命变成“科学地”组织的革命，也就是说，归结为实现破坏性反民主力量的群众动员、掌握战略沟通以取代对政权直接制度的冲击、利用“人民民主”（苏维埃）的冒牌代表制度实现政变的合法性。这一方法的重要特点，是其运用不受运动的意识形态内容所制约，这使得它大受20世纪各种反议会的政变组织者们的欢迎。

^① Bruce Lockhart R.H, *The Two Revolutions. An Eye-Witness Study of Russia, 1917*, London, 1957.

结 论

从这些立场来看，二月革命是当代第一次夭折的民主革命（因为它以政变告终）。第一个共和体制垮台的主要原因是，在革命领导人的意识中，在等级社会、资格选举体系和群众政党缺失的条件下建立经典议会制的思想占统治地位。自由派立宪主义者把议会辩论视为政治的聚集地，没有看到在群众社会条件下形成的新的危险。在他们自己的纲领中，二月革命的领导人从必须长期与专制对立出发（逐步过渡到英国式的君主议会制），没有在自己的策略中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君主在俄罗斯不仅是一个象征，而且还是实际的掌权者（就像 1991 年时的党一样）。推翻这个政权同时意味着制度合法性的危机和政府管理体系的危机。

二月革命没有完成，但它的历史意义并未降低：由它宣告的自由主义改革纲领在后苏联时期开始得到实施。二月民主体系破产的经验，无疑对二十世纪末宪法危机的解决产生了影响。作为宪法变革的结果，1993 年通过的自由宪法，也显示了可以怎样克服双重政权以有利于民主力量。

在廓清那些会导致民主改革间断的社会因素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及时地用详细制订的解决冲突的方法与这些因素相抗衡。这样就能够及时医治社会弊病，而不是放任自流，以详细制订的创造性的社会民主改革的战略和战术与反民主的政治图谋相抗衡，令后者丧失活力。

（贝文力 译）

【Abstract】 February Revolution signified the dividing line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ssian democracy. But half a year later, October Revolution took place, the democratic system collapsed, and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s of Russia and the world in the 20 th century has fundamentally changed at this point. The thought of establishing classic parliamentary system dominated in the revolutionary leaders, while in the hierarchy society in lack of an electoral system with requirements on eligibility and of mass political parties, which constitutes the primary reason for the collapse of the first republican system in Russia. Though not completing, February Revolution is of great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the liberalism reform program declared by which began to be implemented in the Post-Soviet period. The experience from 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system of February Revolution has impacts on solution of constitution crisis at the end of 20 th century. When cleaning social factors resulting in discontinuousness of democratic reform, it is important

to apply method in time, which has been worked out in detail to resolve conflicts, to contend with the factors.

【Key Words】 Russia, February Revolution, October Revolution, democracy, historiography

【Аннотация】 Феврал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рубеж в развит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емократии. Однако через полгода после неё произошла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 потерпела крушение,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 изменилось направление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и мировой истории XX в. Основная причина развала первой в России республикан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в том, что в условиях отсутствия иерарх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избирательной системы, а также массов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идеи о создании 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парламент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занимали доминирующее положение в сознани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х лидеров. Незавершенность феврал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не уменьшает ее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значения: провозглашенная ею программа либеральных реформ начала реализовываться 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й период. Опыт крушения Февральской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оказал влияние на разрешение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го кризиса конца XX в. Выявляя те социальные параметры, по которым возможны сбои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х реформ, очень важно своевременно противопоставлять им разработанную технологию разрешения конфликтов.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оссия, Феврал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демократия,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责任编辑 常喆)

叙述创新与问题转换 ——俄国“十月革命”再思考

邵丽英*

【内容提要】目前关于十月革命的历史叙述有两类，无论是拥护十月革命的苏维埃历史叙述，还是反对十月革命的反苏维埃叙述均出自不同的立场，以至于对十月革命的实际过程及性质的认识仍陷于模糊混乱之中。为从纯粹客观的历史学立场出发，根据充分的史料，重新勾勒出十月革命的真实过程，需要新的问题域。二月革命不是反苏维埃叙述中的民主革命，而是一场由沙皇政府高层官员发动的政变；十月革命也不是苏维埃叙述中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是在国家已经陷入无政府状态下布尔什维克领导的重建政治秩序的强力活动。通过这种叙述，对造成政变和权力重建的原因进行了全新解读，并由此挖掘出十月革命与后来的苏联政治制度及其解体的内在关联。

【关键词】1917年革命 历史叙述转换 新问题域

【中图分类号】K512.5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1)03-0048-(30)

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过去 90 余年了，这期间，还经历了苏联解体的重大反复。如此丰富跌宕的发展变化为历史学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观察材料。但遗憾的是，尽管近一个世纪以来，关于十月革命的文献浩如烟海，但至今仍没有形成基于纯粹历史学立场上的历史叙述。我们面临的各种历史叙述均是囿于当事人立场的政治叙述，所议论的问题也非历史学性质的问题，而是政治学的问题。所以，有必要从纯粹历史学的立场出发，对十月革命的历史过程重新观察和描述，在观察的过程中发现新的问题。

本文就是这种研究尝试的初步结果。这是一个较大的研究课题，应当用数本专著才能表述清楚。这里所发表的只能是一个初步的提纲，以此向学界同道求教。由

* 邵丽英，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

于只是提纲性质的东西，所以更注重宏观问题的阐发，而不是具体论点的论证，但这并不意味着此项研究资料基础是薄弱的。关于十月革命的史料一向比较丰富，近年来苏联史档案的陆续发布，又不断提供着新的史料。

每一代人都试图重写历史，这并不是因为历史发生了变化，而是现实发生了变化。新的现实使人们需要新的历史，从这个角度来看，任何历史学研究均是现实的产物。所以，在纯粹的历史学观察之后，我也将提出基于现实立场的判断，我将其理解为是一种历史学的应用。就全部社会科学而言，学术与政治从来就密不可分，几乎所有有价值的学术问题都是现实政治提出来的，而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与解答，又终将以各种方式作用于现实政治。所以，不存在完全独立于现实政治之外的学术。所谓学术独立，真正能做到的只是在观察和分析问题时尽量独立和客观，在做可能会对现实政治产生影响的判断和结论时，尽量将客观观察到的有启迪价值的历史经验提供给某种政治派别而已。这就是历史学的科学性与党性的统一。能做到在表达出于自己现实政治立场的见解时，不否认客观观察到的经验事实，哪怕这些事实并不利于自己的立场，这已经是现实中社会科学研究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了。

一、关于十月革命的传统叙述与问题域

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关于十月革命的历史叙述其实只有两类，一类是拥护十月革命的，我称之为苏维埃叙述；一类是反对十月革命的，我称之为反苏维埃叙述。它们都起源于革命时期立场不同的政治派别。革命中的胜利者布尔什维克党人是苏维埃叙述的讲述者；而革命中的失败者，包括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等，均是反苏维埃叙述的讲述人。无论苏维埃叙述还是反苏维埃叙述，都有一定的事实根据，但也都有片面或失实之处。比如苏维埃叙述中的代表作品，无论是在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中，还是斯大林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都可轻易地找出史实上的不实之处；同样，在克伦斯基、策列铁里诸人的回忆录中，也能轻易找出不实之处；而在大多数西方人依据反苏维埃的原始回忆材料写就的俄国历史书中，其不实之处并不少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两种历史叙述碰撞后引发了很多争论，这些争论的议题汇聚到一起就形成了一个集中的问题域，这个问题域也是关于十月革命的所谓学术研究中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中经典的主要有如下一些：

- (1) 十月革命是重大的历史进步还是一场历史灾难？
- (2) 十月革命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
- (3) 十月革命是创造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新类型，还是中断了俄国的民主化进程，

重建了极权统治？

(4) 十月革命是俄国人民的选择，还是一小撮职业革命家的阴谋？

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不可能尽数列出，而且在具体表达方式上也有种种细微的差别。但其实质，也就是一种中国人所熟悉的传统二分法：十月革命是好事，还是坏事？其它一切表达或争论，无论其语言形式怎样，最终的落脚点都在这里。例如，十月革命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问题，说到底，如果承认十月革命是“必然的”，就是说十月革命是进步的，是好事儿；如果说十月革命是“偶然的”，则等于说十月革命是来路不正的坏事儿。再比如，如果说十月革命是人民的选择，那当然就得承认十月革命是进步的，是好事儿；而如果说十月革命只是一小撮职业革命家的阴谋，则意味着十月革命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强加给俄国人民的一个苦果。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十月革命的所有研究，其争论的实质就是这个“好与坏”的问题。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叙述成为俄国（苏联）国内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历史叙述，而反苏维埃的叙述则随着政治流亡者一起被带到了西方，在西方世界维持着连续生存。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政策的主导下，反苏维埃叙述在苏联国内先是死灰复燃，接着又反攻倒算成功，不仅促进了苏联的解体，而且一时间成为新独立的俄罗斯国家的主流史学观点。当然，苏维埃叙述并未灭绝，在俄罗斯国内，俄共等左翼力量仍坚持过去的叙述，而在国际上，像中国这类与苏联意识形态有深刻渊源的国家里，苏维埃叙述仍是主流的官方史学观点。

对这两种历史叙述及其带来的问题域，历史学家们一般持两种态度，一是加入其中一方的阵营，按那一方的立场说话；另一种是坚持所谓学术独立的立场，认为这些叙述与论题均远离了历史的真实状态，因而是没有价值的问题，浪费了不少学者的精力，于探索历史真相却无补。所以，真正的历史学研究应远离这些叙述与问题，坚持纯客观的研究。

如前所述，历史学研究也是现实政治的一部分，这是千百年来事实，从来就没有过脱离于政治之外的纯粹的学术研究，所以，大多数历史学家站在不同的政治阵营中，发表符合这个阵营政治立场的所谓学术观点，无可厚非。至于努力想形成独立学术立场的历史学家的观点，我只有限度地同意他们的一部分观点：即可以努力客观地观察和叙述史实；而对于他们对传统的历史叙述与问题域的批评却不敢苟同。在我看来，传统的关于十月革命的历史叙述，无论是苏维埃派的还是反苏维埃派的，无论其在史实上有何种漏洞甚至歪曲，但作为一种作用于现实政治的历史学资源，都发挥了其不可忽视的作用。苏维埃历史叙述不仅曾作为革命的理论基础，

推动了十月革命的出现与成功，而且作为一种维护政权的手段，在长达 70 年的统治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反苏维埃的历史叙述，固然也是那些人在十月革命中失败的一个原因，但在后来苏联解体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既然，历史研究服务于政治是人类社会中不可避免的事实，那么，评价一种史学观点的价值当然要考察其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了。至于这两种叙述引出的问题域，也不能说是徒糜学者精力的无意义的话题，毕竟一代代学者都是在这些问题的争论中成长起来的，正是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才使他们有了更深入的思考。但是，这种囿于立场的叙述和对共同问题的回答方式并不能完全满足人类发展的需要。尽管各执一词的斗争也是人类进步的一种方式，但人类也需要在更宽阔的视野上寻求共同的发展机会。历史进步的方式除了人与人的斗争外，有时也依赖于人与人的合作。所以，我们希望能适当的时机，能有一种基于人类合作基础上的历史观。俄罗斯（苏联）这 90 年的历史反复给中国史学工作者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改革开放后的大好形势，特别是中共中央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的政治目标，为这种历史观的诞生提供了客观条件。值得强调的是，当我们提出这种新的历史叙述时，并不是对传统历史叙述的全面否定和超越，只是在努力满足这个时代的新要求。

二、新的历史叙述方式及问题域的形成

新的历史叙述的出发点是纯粹历史学的立场，它仍然主要依靠两种传统历史叙述所提供的原始材料作为基础史料，但是以客观的态度分析哪些论述是可靠的，哪些是不可靠的。所谓纯粹历史学的立场，就是只求其有无真伪而不论其是非对错的原则，按这种原则我们去努力弄清楚当时事件的真相、原因以及相互间的联系。当然，我们会密切关注各种新发现的史料，及时将其运用于研究当中。但不抱那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是靠新史料完成的新叙述。和一切新的历史著述一样，观察角度的作用远远大于新史料的作用，也就是说，基本史实一直是比较清楚的，只是观察者立场的差异造成了历史叙述飘移于历史实态之外的现状，我们所要做的无非是寻找一种回归历史实态的历史叙述。

限于篇幅的约束，本文在这里无法表达系统完整的关于十月革命的新的历史叙述，只能重点介绍一下按这种叙述原则发现的与十月革命相关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和实际原因，其结论与任何一种传统叙述，无论是苏维埃叙述还是反苏维埃叙述，都有所不同。于是，必然会带来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对史料真伪的考证、对事实真相的探究、对事件的原因后果的分析等诸多方面。有些问题是只有按这种叙述方式才能提出的，例如我们应该关注斯大林从沙皇政权崩溃的过程中吸取了哪

些如何处理战时经济的经验，这在传统的历史叙述中，无论哪一方都不曾提出来过。另外有些问题是传统叙述中也曾提出过的，如十月革命与民主的关系、从十月革命到苏联解体看社会主义的命运等，对这些问题，我们将在新的叙述角度上给出不同于传统的回答。这些新的问题汇集在一起，形成新的问题域。新的问题域不是在立场对抗中产生的，但并不意味着观点的完全一致，对同一问题仍然会有不同的回答。但这种分歧已不具有对抗的意义，因而更富有历史智慧而不是政治智慧，更适于一个广泛和解时代的需要。

新的问题域实际上涵盖了全部的旧问题域，只是关注的角度不同。我们了解一切传统经典论题的争论内容，但是，绝不会再以任何一种传统的立场介入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我们所关注的只是何以会对这些问题有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又起了什么样的实际作用。比如苏维埃叙述在其当政时，用如此高压强力的正面灌输已经形成了“一边倒”的局面，可为什么这种历史观并没有支持苏联人抵御住反苏维埃叙述的卷土重来？那些完全受这种历史叙述教育、熏陶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新人”，何以在一夜之间信念土崩瓦解，坐视苏联的解体？当然，反苏维埃派的历史叙述会将其归结为“真理的力量是无可抵御的”这类似是而非的原因，但是这种结论不仅是基于立场的偏见，而且也过于简单肤浅。我们能很轻易地发现反苏维埃历史叙述中存在的不实之处。就连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这样曾经真诚地相信自己掌握了真理，并按这种真理进行了剧烈的制度变革的人物，也承认事实的结果与自己原先所想像的大为不同，这说明苏联的解体不是什么“真理的力量”推动的结果。这个结论也同样可以推及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也不是它的发起人和后来的支持者所声称的“真理的力量”推动的结果。十月革命和苏联解体是另外一些不带如此强烈的是非感和感情色彩的技术性原因发挥作用的结果。这个问题连带下去就该追问苏联的解体是否是反苏维埃历史叙述坚持下来的结果，答案当然也是否定的。那些极具洞察力的思想家，如恩格斯、列宁等早已指出，不能把革命归结为少数人的坏心恶意。在反苏维埃的历史叙述看来，苏联的解体是一场革命，是他们坚持的观念导致的革命。恩格斯和列宁的看法可以说明，革命另有原因。反苏维埃叙述者的坚持只是原因之一，不是全部。恩格斯与列宁不仅是思想家还是革命家，他们的观点不只是对自己从事的革命活动所具有的人民性和历史必然性的反应，也是对一切可称之为“革命”的历史事件原因的真实说明，无论是从哪个立场来看待的“革命”。

如此说来，我们关注的不是那些提出问题的当事人及其追随者的看法，而是这些看法的出发点是什么，对同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最终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我们不是要给这类传统的经典问题作出新的解答，而是把它们当作一种客观的研究对象一并收入我们的视野。

在进行完新的历史叙述并进入新的问题域之后，我也不得不像传统叙述一样，对十月革命进行评价。但我要说明的是，我们作出的是两种评价，一种是纯粹历史学的评价，它只论有无真伪，不论是非对错，但这种评价只有历史认识意义，并不具有实践意义。我们应该放弃用自以为是的真理来指导人类社会实践的野心，即便你所认识到的一切均与历史的真实面目相吻合，但其带来的结论未必能将未来引导到一条未来的人们也会认为是正确的道路上去。历史不能决定未来，今天的人永远不能替未来的人做主。所以，我们还需要另一种评价，一种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的评价。这种评价的目的性很强，就是为了满足现实政治的需要，它固然也要吸取一些历史研究带来的智慧，但从来不拘泥于真伪有无的事实判断，它所依据的只是对现实形势的判断，即现实的人们的是非观能否接受。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这两种评价我们都要做。那种试图将两种评价统一于一个真理体系内的想法是虚妄的，而坚持一种评价，并以此否定另一种评价也是虚妄的。我们无法超越人类自身局限带来的限制，明智的办法是老老实实地承认两种评价都存在，都有必要，但是，绝不能混淆两者间应有的区别。

三、1917年俄国发生了什么

（一）二月革命的原因和性质

事情要从二月革命讲起。在传统的历史叙述中，无论是苏维埃派还是反苏维埃派都一致认为，二月革命是因为人民忍受不了战争带来的经济困难和沙皇政府的专制压迫，走上街头开始抗议活动，并得到军队的响应，最后推翻了沙皇政府。从这种叙述中人们得出的结论是，沙皇政府的反动统治和人民的革命愿望是造成革命的原因。

这种叙述固然有史实的依据，从表面现象看，或者说从革命者的角度看，确实如此，但他们所叙述的史实是不完整的，因而，依据这种不完整的史实得出的关于事件性质和原因的判断也是不完整的。他们出于各种原因忽略了罗将柯（М.В.Родзянко）、古契柯夫（А.И.Гучков）以及沙皇家族、米哈依尔（Великий Князь Михай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以及军队的高级将领，如阿列克谢耶夫（М. В. Алексеев）、鲁茨斯基（Н. В. Рузский）、布鲁希洛夫（А.А. Брусилов）的作用。因为反苏维埃叙述的主要资料来源于克伦斯基及孟什维克这些当时处于社会下层的革命活动家的记述，对上层人士中真正发生了什么了解得不太清楚。布尔什维克与这些人更没有接触，而且一直把这些人当作是革命对象，对这些人的活动就更不清楚了，甚至也不想弄得太清楚。

从罗将柯、古契柯夫那些人来说，他们是有预谋地发动了一场逼沙皇让位的政变。^①在政变的过程中，他们纵容甚至通过多种渠道煽动下层工人示威、士兵造反，以下层造反为口实，逼沙皇让位。但他们当时不能承认是自己煽动了下层造反，反而推说下层造反无法控制，自己去控制了，但是控制不住。而事后，当他们控制不住局势导致了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后，他们就更不能承认这场毁灭了他们整个阶级的“灾难”正是由他们自己一手造成的。所以，真正干了事儿的人不承认，而没干事的人争着“抢功”，这就导致了关于二月革命的叙述严重地偏离了历史实态。

事实的真相是，俄国固然也遭遇了战争带来的困难：供给不足、战争旷日持久、伤亡空前严重等，但其困难程度并没有严重到人民已经完全忍受不了的程度。法国和德国遇到的困难未必比俄国轻多少，法国军队有十多人哗变，德国有数十万人饿死，但都没有激发出革命。俄国之所以发生革命实在是另有原因，主要是沙皇与贵族、高级军官以及大工业家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冲突的原因可以说是由于这些人普遍的无能，他们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来形成步调一致的意见，用有效的技术手段来解决战争带来的实际困难，而是在反复的争吵和互相抱怨中将矛盾升级。贵族工业家与高级军官集团达成了默契：换个沙皇。为此，1916年12月他们先暗杀了沙皇的宠臣拉斯普京（Г. Е. Распутин），当时就准备政变，但缺少下层起义的配合。到了1917年2月，他们利用首都彼得格勒的食品供应紧张，纵容工人上街示威，进而煽动士兵哗变，与杜马中的左翼力量劳动团、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议员共同“唱双簧”，最终又策动前线的全体高级军官通电逼迫尼古拉二世（Николай II）沙皇让位。其实，当时国家的粮食供应并没有紧张到那种程度，二月革命之后，曾有大量的粮食调入彼得格勒，临时政府能维持那么长的时间，也说明食物并不是绝对匮乏。当然，下层人民的生活因战争而受到影响是事实，工人的生活水平比战前和战争初期下降了约三分之一，农民因战场伤亡较大，有大量的人补充入军队，而返乡养伤的伤员又把前线的残酷消息带回了家乡，引起人心浮动。军队的情绪是最糟糕的，因为战争的伤亡远远超过以往的历次战争，武器装备的低劣和不足与指挥的笨拙是伤亡过大的主要原因。军人们从上到下都将此归罪于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无能，这些构成了革命得以发生的群众基础。

从社会上层来看，这个国家最有教养的阶层（包括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这些自诩为工人阶级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集团）中，普遍弥漫着一种“萨满崇拜”式的心理情结，即认为只有通过一场根本性的变革，采用一种全新的制度或主义，才能摆脱眼前的一切痛苦。这个“萨满”对罗将柯、古契柯夫来讲就是自由民主，就是

^① Родзянко М.В. Крушение империи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 и февральская 1917 года революция. Москва., 2002. С.300-302.

君主立宪；而对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来讲，就是他们之间定义并不一致的“社会主义”。正是这种“萨满”崇拜式的幻想，使得整个社会的智力阶层丧失了承受现实苦难的耐心和能力，他们不是去积极地寻找有效的技术手段去解决实际的技术问题，而是试图用意识形态手段来解决技术问题。于是，革命成为全社会的愿望。列宁所说的革命发生的条件是“不仅社会下层无法继续生存下去了，社会上层也无法继续统治下去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简单地总结一下：二月革命实际上是贵族、高级军官、大工业家发动的一场政变，他们煽动下层造反以为口实，成功地实现了将沙皇赶下台的目的。他们本以为用民主制度（君主立宪）可以控制住他们煽起下层造反，但没想到事件一经发动，很快就突破了他们的控制范围，形势迅速走向无政府状态。

（二）从二月到十月：无政府状态的升级和恢复秩序的努力

那些二月革命的始作俑者原本以为将沙皇逼退位，由杜马掌权，建立一个责任内阁就可以解决现实危机。没想到事情并未按其预想而发展。首先是沙皇并不配合。尼古拉二世虽然退位，但并未按罗将柯等人的要求将皇位传给阿列克谢皇子。罗将柯等人的出发点是想用那个可怜的病孩子当幌子来实现君主立宪，没想到尼古拉二世却把皇位传给了他的弟弟米哈依尔大公。这一招出乎罗将柯等人的意料，他们又聚集起来并煽动皇族一起向米哈尔施加压力，不让他继位，因为米哈依尔尽管也没本事，但毕竟是个大人，要比小孩难摆布多了。努力的结果虽然是逼得比尼古拉二世还要软弱无能的米哈依尔大公放弃了继承皇位，但是实现君主立宪制的梦想也彻底破灭了。虽说当时他们试图通过以后立宪会议的方式给保留君主制提供新的法律基础，但后来事态的发展表明，这个国家和人民甚至连立宪会议的法律基础都不承认。

另一方的压力来自社会下层。在君主专制和农奴制下生活了几百年的俄国人民，从来没有过英、美民族那样的思维方式，他们不知道议会民主能带来什么，只是渴望解决眼前的实际经济困难。他们要的是没人再来管束自己，但还有人源源不断地提供食品，自己再也不用上前线打仗送死。所以，当罗将柯、古契柯夫、李沃夫（Г.Е.ЛЫБОВ）甚至孟什维克将杜马或苏维埃这种民主政体交给人民，以换取下层群众自觉而稳定的支持时，他们很快失望了。因为，民主在工人和士兵那里变成了抵制一切命令的理由，而由于从最基层起开始抵制一切来自上面的命令，所以，完全无法再组织起有效的生产和流通秩序，物质供给困难进一步加重。人民这时不再将困难的原因归罪于沙皇，当然也不会意识到是自己的全面不服从导致了无序的后果，只能逐渐将怒气撒到临时政府头上。而无论是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这时都不能、也没想到要收回自己先前的许诺，因为旁边还有一个退位

的沙皇在看着呢！

从二月到十月，无政府状态持续升级，那时已没有一个有效的权力中心，各种政治组织均可自行其是，庞大的军队在各派政党的争吵中无所适从，各政党都向军队派遣政委，任由各级军官和士兵选择自己的归属。街头任何一个士兵掏出枪来就可以强制征用任何人的汽车，根本不用考虑归还的问题，甚至连外国使馆的车辆也不放过。^①军官间发生内讧，唆使自己的追随者发起一场场军中的小规模叛乱。局势并不是如后来苏维埃叙述所说的两个政权并存的状态，而是一个无能的临时政府之下多种政治势力互相争斗的状态，这是典型的无政府状态：形式上的政府不管用，有枪便是草头王，谁想干什么都可以。

为了挽救危机，那些政治家们也作了努力，罗将柯策划的科尔尼洛夫“军管”方案，克伦斯基策划的前线进攻，也包括布尔什维克半推半就的七月示威都遭到了失败。总之，没有一种政治力量改变了局势，无政府状态愈演愈烈，至此，社会各阶层都生活不下去了。

（三）十月革命的发生及初期政策的效果

十月革命是在无政府状态已经达到了顶峰、社会各界都对临时政府丧失了信心的情况下发生的。虽然自《四月提纲》起，列宁（В. И. Ленин）就开始主张革命，但无论在党内还是党外，应者寥寥。普列汉诺夫（Г. В. Плеханов）甚至讥之为“梦话”。但到了十月革命的前夕，布尔什维克不仅党内达成了一致，而且将“区联派”的托洛茨基等人团结在一起，同时还获得了社会革命党的支持。

从具体过程看，当时支持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只有 2 万多人，大部分是工人赤卫队，少量的波罗的海舰队水兵。起义事先并没有多么周密的计划，直到起义的前一天，列宁还在与一些负责具体行动的军事指挥人员研究行动方案。但他们的行动也没有遭遇严重的抵抗。当时，临时政府成员还聚集在冬宫开会，当天晚上克伦斯基看到冬宫已被越来越多的工人赤卫队包围，就离开冬宫去军队寻求支持，他非常轻易地通过了布尔什维克部队的岗哨，走了出去。但是，他奔波数日，找不到一支忠于他的部队，军队持中立态度，或者说希望看一看布尔什维克能不能挽救乱局。^②当天晚上，“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向冬宫发射的炮弹是未装弹头的空弹，负责警卫冬宫的上千名士官生和一营妇女敢死队几乎没有作任何抵抗就被缴械，留在冬宫的临时政府成员被逮捕或被强制离开。

列宁之所以坚持要在十月二十五日夜发动起义，就是为了在预定于当晚举行的

^① [苏]帕·马利科夫：《克里姆林宫卫队长回忆录》，原木、新春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27-28页。

^② Алексеев С.А. Феврал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в описаниях белогвардейцев. Москва., 1925. С.314.

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之前造成已经夺权的既成事实。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虽然如期召开，布尔什维克的起义获得了社会革命党的支持，但遭到孟什维克及其支持者的反对。孟什维克宣布退出大会，继续以他们原来掌握的全俄工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名义活动，反对布尔什维克。一些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政力量，在彼得格勒市长的召集下组成“救国救革命委员会”进行对抗。全俄铁路工会也抵制布尔什维克的夺权，^①即使是布尔什维克内部对于起义也还是争论不已，持悲观态度的人如加米涅夫（Л. Б. Каменев）等抱怨起义把事情搞坏了，革命很可能失败。

所有的历史记载都表明，十月革命是在急促之中发动的，且布尔什维克内部意见并不统一，革命几乎遭到了当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大多数政治力量的反对。反苏维埃的叙述一直抓住这一点，作为十月革命不具有人民性、没有得到人民支持的证据，试图以此说明十月革命只是布尔什维克，或者说只是列宁和托洛茨基（Л. Д. Троцкий）等少数布尔什维克搞的密谋活动。但反苏维埃叙述忽视了另一个事实，就是整个军队，将近千万人的军队，对布尔什维克的夺权持默认态度。甚至当布尔什维克派克雷连科（Н. В. Крыленко）到军事大本营命令总参谋长杜鹤宁（М. Б. Духнин）下令与德军停战，杜鹤宁因拒绝这个命令被打死，克雷连科被任命为最高司令之时，军队也没有反对布尔什维克。这说明布尔什维克的行动得到了军队的支持，而政治活动家们的立场与军队不一致，说明那些活跃在前台的政治活动家们已经脱离了军队的实际要求，也脱离了人民群众，独自进行着没有观众的表演。但在苏维埃派的历史叙述中，也忽略了军队整体态度对十月革命的关键性作用。布尔什维克的各个政治派别如托洛茨基派、斯大林派、斯维尔德洛夫派等，都把革命归结为自己领导的少数先进分子的行动，与军队的大多数无关。和对二月革命的叙述一样，在关于十月革命的叙述中，苏维埃派和反苏维埃派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共同地使历史叙述飘移于历史事实之外。

按照苏维埃历史叙述的说法，十月革命后通过的《和平方令》和《土地法令》获得了广大士兵和农民的支持，这是革命获得成功的重要措施。但事实上，这两个法令的颁布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多么大的重视。《和平方令》受到盟国和敌国的共同反对，这篇充满国际主义精神的政治文献被英、法盟国看作是背叛，被交战国德国视为是讹诈的机会。德国人根本不理睬当时还是理想主义者的布尔什维克的高尚的和平诚意，反而趁火打劫，逼迫布尔什维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条约》。该条约的签订使俄国军队发生了分裂，大规模的内战由此开始。也就是说，《和平方令》的实际后果不仅不是不割地、不赔款的停战，反而是德国人趁火打劫的军事进攻和

^① 徐天新选译：《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92页。

因军队发生分裂而导致的国内战争的开始。

至于《土地法令》，所起的实际作用恐怕只是得到了同样热衷于理想主义词句的社会革命党的政治支持，对农民的实际生活并没有多少影响，相反，随着经济的困难和余粮征集制的实施，农民开始大规模地反对布尔什维克。

布尔什维克固然最后赢得了胜利，但赢得胜利的原因并不是他们自己所宣称的《和平方令》和《土地法令》获得的军队和农民的支持，而靠的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余粮征集制、重建军队纪律等强力手段所起的作用。

四、十月革命的历史内涵分析

（一）什么是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并非简单地指 1917 年 10 月 25 日（俄历）发生的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推翻临时政府的起义。因为如果仅从 10 月 25 日以及到 11 月 20 日打死军队总参谋长，从名义上控制了全国军队而言，革命仍然未能说取得了成功，还有待立宪会议的结果，国际上也没有承认。所以，一般都认为，十月革命是从 1917 年 10 月 25 日的武装起义到 1924 年苏联成立这一整个过程。如果将这两个时间点作为十月革命的起始点和结束点的话，十月革命就是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武装夺取政权并巩固政权的过程。在这一时间尺度上观察，只能反映出布尔什维克实现了终止无政府状态、恢复公共秩序的职能，还看不出他们给俄国社会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新的东西，也就是说，还未能充分地展示出这场夺权斗争所蕴涵的革命性的意义。以较长远的观点来看，苏联的成立也并不意味着革命的结束，而是革命的继续深入。因为，这场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革命，到 1924 年时，连社会主义的基础还不具备。按照苏联官方的说法，1936 年才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之前，很多事件只具有社会主义过渡的意义，如对个体经济的消灭等，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题中应有之意。如果以社会制度的性质来定义的话，十月革命是一场消灭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革命，它的下限应定在 1936 年。

然而，若以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虽然苏联在 1936 年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但并未能保证苏联社会由此沿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预言，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反而在 1991 年发生了苏联解体的事件。如果把十月革命当作是一群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所发起的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尝试，那么，苏联的解体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它意味着这场社会实验的结束。而在实验中产生的积极成果将在未来的历史发展中稳定地发挥作用，实验中所出现的种种挫折与失误也足以后来者们提供丰富的经验借鉴。所以，本文倾向于将十月革命理解

为起自 1917 年终于 1991 年的一个伟大的社会历史事件，我们就是要在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尺度上来重新认识十月革命的性质。

（二）俄国社会提出的历史要求：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

十月革命的出现绝不是偶然事件，是当时俄国社会提出了各种客观要求，这些要求汇集在一起，必然导致能满足这些要求的历史事件的出现，即使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出现，也会有别的政党发起的类似事件出现。临时政府第一届内阁的核心人物、历史学家米留可夫（П. Н. Милюков）当时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现在的问题不是专政不专政的问题，而是选择科尔尼洛夫（Л. Г. Корнилов）的专政还是选择列宁的专政的问题。^①

那么，当时的俄国社会究竟提出了哪些客观要求呢？

首先，如前所述，二月革命后的俄国已经逐渐陷入了无政府的状态，没有了统一的国家和政府，没有任何正常的安全秩序，没有任何正常的经济生活，再这么下去全体人民都得饿死，或者是整个国家被敌对国占领。也就是说，当时最迫切的要求是结束无政府状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政府。

国家是什么？按现在流行的西方主流政治学的说法，国家是主权、领土和人民的统一体。而按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解释，国家是一种暴力机器，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机器。西方政治学的定义貌似全面，但却回避了国家权力的实质问题，因而在真正的重建政权的实际运动中缺少可操作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定义直击主题，切中实质，适合在乱世重建政权中作为务实的指导原则，但不够全面。如果把两种定义结合起来看，问题就清楚了。国家是一种暴力机器，是形成有秩序有组织的人类社会生活所必须的一种暴力机器。一定的人群按一定的信念组织起来，要求其他人也听从自己这群人的意志，对不听从的人就施之以暴力手段，强迫他们顺从。这些不同的人群或是阶级或是民族，也就是西方政治学所说的人民，他们活动、居住的地域就是领土。所谓主权，无非是暴力手段的一种文雅的说法而已，但这种文雅却麻痹了很多人，如立宪民主党人和孟什维克，他们居然幻想一种不具暴力性质的主权，幻想着不经强制的暴力手段就可以达成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共同意志，这种想法当然是错误且幼稚的。事实上，无论政体有何不同，任何国家政权都是暴力机器这一性质是没有改变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群人，而且一定是占全国总人口大多数的人形成并强制推行自己这群人意志的结果。

所以，如果我们承认二月革命后已陷入无政府状态的俄国最迫切的客观需要是

^① 德·阿宁编，丁祖永等译：《克伦斯基等目睹的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62页。

重建国家政权、重新恢复社会经济秩序的话，那么就必须承认，它迫切的要求是由一群人迅速形成有组织的暴力工具——军队，并用军队来强迫其他所有人服从某种秩序。为了造就这样的军队，各个阶级、民族、政治集团都以各种旗号招募自己的支持者并展开斗争，在斗争中出现胜者，由胜者统一全国，即确立领土和人民的范围。因而，国家政权的建立是一群人强迫另一群人服从自己的意志，对不服从者就施以镇压甚至杀戮的过程，这是一个血腥和残酷的暴力过程。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政权重建过程都是如此，包括标榜自由、民主的美国政权也是独立战争的产物。现在看来，十月革命所完成的实际上也就是这一历史使命。它用暴力手段建立起了新政权，这种暴力性质在1917年10月尚不明显，而到了1918年的内战和其后的“肃反”、“余粮征集制”乃至斯大林的“大清洗”，才完全表现出来，并完成了其应完成的客观功能。当然，每一次暴力手段的实施都造成了很多无辜的受难者，英、美、法诸国的革命也概莫能免。但有些政权稳定久了，其宣传工具已将创建政权的暴力实施过程中的血腥色彩掩盖住了。有些则掩盖得不彻底，或者是因为后来的挑战者企图改变政权的需求，反而被夸大了。国家政权创建过程中被镇压杀戮的人，无论是无罪还是无罪，都改变不了国家政权创建过程的暴力性质，在科学上也不能成为反对或赞成一个政权的理由。以一个政权建立过程中曾经杀过人、或者杀过“好人”来否定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是不能成立的，充其量只是这个政权反对者的一面之辞；作为一面之辞，它与支持这个政权的言论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片面的。要知道，在阶级或民族的对立中，任何为自己群体利益而战的人，在自己群体看来就是好人，而在敌对面看来就是坏人。好坏善恶均没有共同的标准。哪些人该杀，哪些人该不该杀，本来就是各说各的理的事儿。如果以一个客观的、科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人类本身的无奈。他们只能在血腥的冲突中建立秩序。如果秩序是人类生存所必须的话，那么，血腥的暴力手段也是必须的、不可逾越的，而且这种不可逾越的血腥过程亦不具有事件当事人所陈述的道德性质，无论任何一方所说的正义或不正义只是其凝聚自己追随者的动员手段，不具有客观的科学意义。形成社会秩序的功能性要求是高于对立双方信念的“天伦”。

在俄罗斯，国家政权的重建初步完成于1924年，以内战结束、布尔什维克统治确立和苏联的成立为标志。而领土范围的最后界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雅尔塔体系中苏联基本上又夺回了帝俄鼎盛时期的领土。从更长远的角度回溯，二月革命的出现即帝俄政府的崩溃是由于旧的国家政权无法克服现代战争带来的困难造成的。最主要的技术性的原因是俄国的工业和交通业基础难以支持它打赢那场战争，^①

① Сазонов О.Н. Русская армия в 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е. СПб., 1997. С. 3-10.

无法再给这个以征战起家的国家民族（一国之内各民族的总和，他们形成了对国家的认同，即Nation，孙中山先生译作国族。）带来胜利的好处。所以，新的国家政权在经济上的首要任务是实现工业化，以此作为立国的基础。这项工作大约是在 1936 年完成的。也正是有赖于工业化提供的物质基础，苏联才打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重建新的国家政权、恢复以暴力为后盾的公共秩序、回复原有的主权疆域、实现工业化、获得在现代世界争雄的实力等等，这些都是俄罗斯国家（只要还成其为一个国家）所必须具备的客观要求。十月革命只不过是满足了这些要求的一系列伟大事件的组合而已。如果这些要求是客观的不可更改的事实，那么实现这些要求的十月革命就是历史的必然。

（三）为什么是布尔什维克？

一个社会提出客观要求是一回事，而谁能成功地满足这些要求又是另一回事。当时，俄国有多股政治力量都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但为什么那些人都失败了，而唯独布尔什维克胜利了呢？苏维埃派的历史叙述将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归结为人民的革命要求和党的战略策略的正确，而反苏维埃派的历史叙述将其描述为阴谋者不顾后果的强横行动。这两种互相对立的叙述，虽然各有根据，但也不乏片面之处。要想理解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原因，还得从革命得以发生的基础原因开始探讨。

一种习以为常的观念告诉我们说，革命起自阶级压迫，换句话说就是阶级压迫是革命之所以发生的原因。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来自一种粗浅的经验观察，每次革命都是被统治阶级推翻统治阶级的过程。然而，细究起来会发现这个结论至少不够全面。不错，表面看来，任何革命都是被统治阶级推翻统治阶级的过程，但是，在比革命的时间要长得多的和平日子里，阶级差别和阶级压迫不都一直存在着吗？任何正常的社会秩序中都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存在，在漫长的时间里他们之间是和平共处的。而且，就算是旧的被统治阶级推翻了旧的统治阶级，在新建立的国家和社会里，不依然有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吗？所以，阶级压迫只是革命发生的条件，并非革命发生的原因。革命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构成统治阶级的那些人发生了变化。当一个新政权建立起来的时候，高居于统治阶级地位的那群人的智力和意志品质都是全社会里最优秀的，他们是通过优胜劣汰的严酷竞争才走上那个位置的。但是，他们的优秀秉赋不可能通过自然遗传留给他们的后代。然而，历史上多数情况下的制度设计，往往把优秀人物通过竞争获得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遗留给那些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优秀的后代。同时，为了保证这种利益分配格局，就限制真正优秀的人物进入统治阶级的队伍，以免对这些并不优秀的后代形成竞争。如此下来，统治阶级中的人员素质，不论智力水平还是心理素质、道德水准都会逐渐下

降，而被统治阶级中优秀的人物却不断增加。当统治阶级中的无能之辈越来越多，而被统治阶级中的优秀人物也越来越多的时候，加上阶级压迫日趋严重这样的条件，革命的爆发也就难以避免了。这种现象我们暂且称之为优秀人力资源下移现象。

纵观俄国历史，其优秀人力资源下移的过程早在十二月党人革命时期就已经开始了，越来越多的在智力和品德上都极为优秀的人物与社会下层结合在一起，这就是自民粹派以来的各种革命政党，也包括布尔什维克的母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与此同时，统治阶级的智力水平和道德水准迅速下降，到尼古拉二世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尼古拉二世及其皇后亚历山德拉，智力平庸，政治水平很差，竟让菲力浦和拉斯普京这类江湖骗子把宫廷政治搞得一塌糊涂，这是激起贵族上层政变的直接原因。^①这个时期整个皇族的智力水平都下降到了令人绝望的地步。他们参与了政变，但政变发生后，竟然推不出一个比尼古拉二世强一点的人来继承皇位。整个上层社会也是惊人的无能，他们虽然串通一气发动了政变，但都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实际办法，反而乞灵于自由、民主之类的意识形态“萨满”。

与上流社会的无能相比，那些同被统治阶级站在一起的政治活动家们就显得生机勃勃，这些人中最优秀的集团就是布尔什维克。不仅与沙皇、贵族以及高级军官相比，布尔什维克具有无与伦比的智力优势和道德优势；就是与同为下层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相比，布尔什维克的优势也十分明显。这种优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布尔什维克始终认识到国家政权的本质是暴力，而其他政治派别在这个问题上则始终浑浑噩噩。第二，布尔什维克能用技术手段解决技术问题，并用意识形态来支持自己的技术手段。而其他政治派别则始终是错误的，他们要么用意识形态手段解决技术问题，要么用意识形态来否定自己的技术手段，最后丧失了人民的支持。

先讲第一个问题，关于国家政权的性质，列宁一直坚持马克思的经典理论，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所以，他所制定的战略和策略都是围绕着以暴力夺取政权、以暴力巩固政权的原则进行的。而其他政治派别都缺乏这种把握国家政权本质的尖锐与深刻。作为二月革命始作俑者的罗将柯、古契柯夫之流，他们所熟悉的政治规则是在一个专制沙皇统治下，背地里拉帮结伙，互相拆台。^②一旦这个强势的沙皇没有了，他们那些在宫廷政治斗争中学会的主要以告密和争宠为手段的政治技巧就完全失效了。所以，完全没有能力承担起重建国家的重任。至于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则受到种种

① Александр Блок. Последние дни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власти. СПб., 1921. С.19.

② Гучков А.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 и военного министра Временн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Москва., 1993. С.38-43.

脱离实际的政治理论的束缚，基本上把重建政权的希望寄托于民主选举的立宪会议，认为俄国可以一步到位地过渡到议会民主制。他们在一个根本就没有任何民主传统、没有选举意识和自治观念、没有司法独立，甚至宗教力量也不能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发挥平衡作用的国家里，完全凭想象去运作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民主制度。这些人抵触暴力，无论他们抵触暴力的理由是自由主义者坚持的“政权应该来自人民同意”，还是社会主义者所说的“现阶段社会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其实质都是想在一个没有选民的国家里推行选举，想用革命歌声就能平息街垒上的枪弹。无论他们的政治理论具有怎样高贵的抽象性质，但在当时的实际政治运动中简直就是弱智。尽管这些人物本身都具有令人敬佩的理想主义品德，但政治竞争的原则就是优胜劣败，所以，他们因智力上的低下而失败了。至此，我们把布尔什维克胜利的原因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他们集中了比其他一切政治派别更有智慧的政治领袖人物，如列宁、托洛茨基等。

但布尔什维克并非一个擅长争权夺利的政治集团。长期以来，他们处于被追杀的地下工作环境，从未亲近过真正的权力，所以丝毫不具有罗将柯、古契柯夫之流的政治技术手段。因此，将阴谋家的称号加到布尔什维克的头上是严重不符合事实的。恰恰相反，布尔什维克是当时所有政治派别中最富理想主义也最富浪漫精神的团体。他们自己一无所有，从生活状态到思想感情，完全融入了下层工人和士兵之中。他们坚信自己信奉的理论原则，甚至达到了教条主义的程度，在制订每项实际政策之前，都要就其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进行滔滔不绝的辩论，制订出来的技术政策也都是用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语言形式来表达的。就个人品德的单纯和书呆子气方面，他们完全可以与孟什维克相媲美。所以，就出发点来看，布尔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等一样，也没有分清楚意识形态问题和技术问题，也是试图用意识形态解决一切问题。但为什么他们没有像其他党派那样失败呢？原因就在于布尔什维克信奉的意识形态与解决当时俄国实际技术问题的技术手段之间发生了耦合，从而达到了解决实际问题的效果。

人类社会实际上存在着两种问题：一种是技术性的客观问题，如现代工业系统间的原材料、燃料与加工生产环节的配套问题，没有煤和铁矿石就炼不出钢等。另一类是纯粹出于人主观想法的意识形态问题，如人的价值观、人们对某种制度或主义的偏好，甚至包括人们对自己利益所持的一种不切实际的心理欲期。解决这两种问题要分别采用不同的手段，解决技术问题要用技术手段，解决意识形态问题要用意识形态手段。如果用技术手段去解决意识形态问题，或者用意识形态手段去解决技术问题，都会遭遇失败。例如，俄军在战场上打不过德军，主要原因是火力配置不足这类技术性原因，在某些战役中，德军的重炮配置竟高达俄军的 39 倍，这样的

问题只能靠增加俄军的重炮配置来解决。而无论选举士兵委员会这类民主革命措施，或给农民士兵分土地这类社会革命措施，都是解决不了火力配置问题的，这两种革命措施都是意识形态手段。克伦斯基发起的六月进攻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幻想用给士兵民主这种意识形态手段来解决战争中火力不足的实际问题。再比如当情绪激动的群众围聚在政府周围，要求马上实施一项重分土地的革命政策时，政府如果从纯技术实施的角度考虑（如具体分配方式、分配后的管理等问题）来拒绝群众要求的话，立马就会遭到群众的反对。因为这时群众所要求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效果，只需要满足情绪和心理的要求，他们还考虑不到实际技术问题的存在，谁跟他们理性地谈实际的技术实施困难，便会被理解为不想给他们土地，就会被斥为“反动”而被打倒。其他政党的失败就是因为这种手段应用上的错位，而布尔什维克的成功只不过是正确的手段正确地解决了问题，即用技术手段解决技术问题，用意识形态手段解决意识形态问题，而不是相反。这个问题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因为任何一个实际问题出现时，总是带有技术的和意识形态的双重性质，所以在解决问题时，你的手段也必然要带有双重性质，你可以用技术手段去解决技术问题，但不能忽略这个问题本身携带的意识形态色彩，也要有相应的应对措施。临时政府无疑也看到了实际的技术问题，比如部队的军纪已荡然无存，所以，他试图恢复死刑以重建军队纪律。^①他是直接用技术手段解决技术问题，但失败了。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技术问题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外壳，士兵们将它理解为是支持旧军官镇压士兵，维持旧制度。^②布尔什维克也是靠在军队中恢复死刑而且执行得比较彻底的方式重建军队纪律的。他们为什么就能成功呢？因为他们为这种技术手段加上了意识形态的包装，他们把军队改称为红军，声称是工农自己的队伍，军官改称为指挥员，并声称已经摧毁了旧军队的一切坏的制度，他们重建的是革命的纪律，而有觉悟的工人和士兵应服从革命的纪律，等等。总之，以强大的意识形态攻势掩护住同样强有力的技术手段，因而遭受的抵制较小，能推行下去。列宁与克伦斯基不同，克伦斯基几乎没有什么理论教条，是个简单的实用主义者。而列宁在某种程度上与孟什维克、李沃夫等人更接近，在坚持理论教条上有过之无不及，只不过列宁所坚持的理论教条与当时的现实形势耦合起来了，这种耦合给他提供了一个较充分的意识形态话语空间来运用实用的技术手段。

在实施新经济政策之前，列宁几乎是个“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者（新经济政策之后的列宁才真正成为列宁主义者），他坚持了马克思的两条原则：国际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两方面，孟什维克都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孟什维克革命护国派的

① 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页。

② Минц И.И. История Великого Октября. том 1. Москва., С.466-469.

主张其实是对国际主义的背叛，而他们对民主政治的留恋则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背叛。彻底的国际主义立场使得列宁敢于放弃当时大家奉为神圣价值的爱国主义（其实就是民族主义），断然与德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条约》。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使得列宁敢于面对一切反对力量，无论他们是什么身份的人，采取铁血镇压手段，毫不留情。当然不能说完全是由于国际主义使列宁敢于放弃民族国家利益，无产阶级专政理念使他重建了极权统治，而是说，在采取停止战争和重建权威的技术手段时，列宁所信奉的意识形态教条给了他正面的支持作用，为他提供了理由、胆量和信心，也为他赢得了一部分支持者，这样他才能做得如此自由，如此无所顾忌。而其他政党的领袖人物所信奉的意识形态教条在面临这样的实际技术问题时，所起的却只是相反的作用。例如自由主义的教条在二月革命中能大行其道，因为它确实具有解构功能，具有瓦解专制秩序的破坏力。但在恢复秩序时，尤其是恢复一切国家权力中心应有的权威时（这其实也是一个技术问题），自由主义就不具有建设性的力量了。

最后，布尔什维克还具有其他任何政治派别所不具有的组织优势，这种组织优势起源于列宁提出的建党原则，同样也是这个党的领袖的智力优势的产物。布尔什维克的组织优势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组织纪律性强，尽管还没有达到后来那么严格的铁的纪律的水平，但是与二月革命后那些自由散漫的其他政党相比，布尔什维克的纪律是最好的，组织性也最强，这得益于建党初期列宁的坚持。二是党内的智力结构分配较合适。布尔什维克党内知识分子的比例较低，工人群众较多，因而有理论争论能力的人较少，听从指挥的人较多。与之相比，孟什维克的知识水平较高，争执能力强，团结行动能力弱。一个政党，要有决策机构，要有讨论的过程，也要有行动的机构、执行的过程。布尔什维克在这方面的配置比较合理，孟什维克就是决策机构和讨论过程大于执行机构与执行过程，用现在的术语讲，缺乏执行力。这种队伍是不能打胜仗的。

（四）超越与回归：革命的边界

和一切革命者一样，十月革命的发起者们心中怀有美好的理想，他们依此理想行事，推翻了旧政府和旧制度，并且创造了新的政府和制度。他们以为靠自己的努力可以创造出完全不同以往的最美好的人类社会制度，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努力、人人幸福的社会制度。他们也的确创造了许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东西，比如生产资料公有制、劳动神圣、妇女解放等，这些创新无愧于他们的豪迈。但是，也有很多地方经过尝试以后被迫向后退缩，又退回到他们本以为能够超越的旧的传统上，比如传统的民族国家。以至于让人们以为，这传统更具永恒的价值。我们要研究的是：十月革命究竟创造了哪些前所未有的东西，又是

哪些原因使他们向传统回归。这种研究实际上是寻找革命的边界，即去探究，不论革命者们多么富有理想主义精神，最终他们不能超越的那些客观限制是什么，革命将停止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1、由世界革命回归到民族国家

列宁、托洛茨基的革命理论是否定民族国家的，他们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暴力工具，统治阶级为了掩饰自己的阶级利益，把自己的阶级意志美化成全民共同意志。列宁坚持马克思所说的“工人没有祖国”的原则，反对一切用民族国家利益取代阶级斗争的企图。他主张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实现全人类的解放，民族和国家将被当作过时的东西扔进历史的垃圾堆。正是基于这一点，列宁和托洛茨基提出了世界革命的理论。他们认为俄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全世界工人阶级的革命反过来也将支持俄国的革命。世界革命是他们发动革命的一个理由，也是输出革命的原因。他们试图突破主权国家的限制，建立一个全世界的工人阶级的政权，所以不仅不承认一切旧时代的国际法原则，而且大张旗鼓地向外输出革命。他们的突破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不仅激起了德国革命作为回应，而且还建立了共产国际。从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各个工人流亡政党的理论宣传变成了各国工人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出现了一批在价值符号上完全效仿布尔什维克的新型国家。世界革命、共产国际、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确实是十月革命创造出来的新生事物，是布尔什维克对人类历史作出的前所未有的贡献。但是很快，他们也遭到了传统的抵制，被迫向传统退却。首先是他们完全立足于国际主义立场的主动停战主张，并没有得到任何积极的响应。作为盟国的协约国将其视为背叛行为，敌对国的德国更是趁火打劫，逼他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条约》。布尔什维克不得不承认旧的国际体系，并且在这个旧的国际法框架内建立与各国的外交关系。外交政策也由大张旗鼓地向外输出革命变成了暗中支持各国的革命活动。

让布尔什维克从国际主义立场倒退的另一个原因来自那些工人阶级的民族国家意识。1920年的苏波战争中，波兰工人参加到了反对苏军的军事行动中，使布尔什维克初次认识到民族国家意识的顽固。此后，他们所支持建立的新型国家，如中国、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等，均因民族利益与他们发生过冲突，到这时，不仅他们与资本主义国家要按传统的国际法原则打交道，就是与那些由他们支持而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也要按传统的国际法原则打交道。这个回归过程是不断进行的，在斯大林时代已经基本回归到位了。他在处理二战时期的外交问题时，所遵循的思维原则完全是恢复帝俄时期的地缘政治空间。为此先与德国合谋瓜分波兰，后与美、欧讨

价还价瓜分世界。自三十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外交政策的主轴是捍卫本国的民族利益，又走回了帝俄扩张主义的老路。他们虽然没有放弃世界革命的口号，仍在支持各国的工人政党，但这些举动究竟是出于国家利益还是出于国际主义理想，已经很难说清了。而在另一方面，当年的理想主义也给他们留下了一些隐患，比如基于世界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基础之上的苏联宪法，就留下了各加盟共和国可以独立的空间，苏联国内的民族融合也一直没有贯彻到底，这一切为苏联的解体埋下了伏笔。

2、由自由人联合体回归到传统政府

按照布尔什维克理想，是要结束一切专政，建立“自由人联合体”这种全新的人类政治组织形式（从中能看到康德“世界政府”的影子）。他们也确实努力付诸实施了，比如，他们建立的政府不叫政府，而叫人民委员会，政府官员不叫部长，而叫人民委员，而且规定政府干部的工资不能超过工人的最高工资（十月革命时是每月 500 卢布），政府干部可以随时撤换等。在这方面，他们的确创造了许多新东西，他们将对普通劳动者的尊重推进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在俄国这个有着漫长专制传统的国家中，第一次普及了政权属于人民、政府要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理念，而且建立起了一个水平的社会阶级结构，在经济上消灭了私人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在政治上也彻底改变了沙皇政府对人民的压迫状况。俄国革命创造的劳工神圣、人人平等和人民当家作主等价值观念，与法国大革命时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一样将永远载入人类的史册。

然而，他们也遇到了现实的阻力，不断向传统回归。先是刚成立两年的“人民委员会”出现了官僚主义现象，病中的列宁对此忧心忡忡，却拿不出有效的解决办法。以后的斯大林为了发展工业化，动员管理专家和技术专家的积极性，建立起了一个享有特权的官僚与专家统治体系。1946 年，政府的名称也由“人民委员会”改为“部长会议”，“人民委员”完成了向“部长”蜕变的过程。因此，如果说十月革命之初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是一种追求普世理想的类似“教会式”的组织的话，那么，苏联成立之后，这个组织已经渐变成一种世俗性的人间政府了。这说明基于共同理想基础上的“宗教社团”式组织无法取代世俗政府。国家，或许不是永恒的东西，但至少在这一个世纪里，理想主义者的革命并未使其消亡。马克思和列宁均将国家看作是历史过程的产物，均将其视为将被革命所消灭的对象。但事实上，尽管理想主义的革命者们砸碎了一个旧的国家，并试图建立起一种全新的政治组织形式——自由人联合体，但最终他们都仍走回到了传统政府的老路上。后期的苏联政府已经完全和传统的政府一样，官僚主义严重，专断集权，而且和沙皇政府一样推行特务统治。这也说明革命未能超越传统政府。

3、由单一公有制向多种所有制并存回归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只有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社会最根本的矛盾——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才能进入共产主义。列宁是忠实地坚持这个原则并且将其细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政策。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逐步建立起统一的全民所有制体系，在废除和弱化商品货币关系、取消市场机制的前提下（这些举措都是废除私有制、建立单一公有制的配套措施），用统一的经济计划来管理全国经济。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是十月革命的创新，它们也确实发挥了前所未有的效用：支持了战争的胜利，在一定时期内提高了生产效率，推进了工业化的快速完成，避免了在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经济危机，而且建立起了全国人民大致平等的社会生活体系。

但是，公有制自始至终都受到了人的自私天性的抵制。按照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理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私有制的存在决定了人有私有观念，如果消灭了私有制，就能消灭私有观念。刚消灭私有制时，人的私有观念还会存在，但那只是一种旧观念的残余，随着公有制的建立，这种残余的旧观念也会逐渐消失。马克思说得不错，当你废除了私有制，确实也消灭了人对某项具体财产的私有观念，比如一个工厂变成了全民的财产，这个工厂的厂长和工人确实不会把这个工厂再当成自己的财产，不能随意支配它了。这是观念形态层面的情况。而在实际操作层面，人们同时也就没有了对这项财产的责任心，结果往往导致生产效率的下降。在革命初期，也许还有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人的自豪感作为工作的动力，时间稍长，激情消失，怠工、不负责任就蔓延开来了。人的自私观念不只来源于外在的私有制，也来自内在的生理天性。人有自私的天然欲望，这是构成私有制的主体性基础，如果这种欲望得不到实现，就会用各种方式反抗现行的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就是要消灭私有制，甚至人的自私天性，而且十月革命确实部分地实现了这一目标，建立了公有制，但遭到了来自人的自私天性的顽强抵制。这些抵制是以两种看似对立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一是弱者的声音，他们呼吁更全面、更彻底的平等，由于智力水平和劳动技能较弱，所以希望按人头平均分配物质福利，他们认为当时苏联的制度还不够公平，还有干部和工人收入上的差距，他们以反对特权主义、反对技术官僚等更为激进的口号来反对社会主义。另一种是强者的声音，他们反对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强调应多劳多得、优劳优酬，他们从另一个角度批评社会主义是大锅饭，不利于调动优秀职工的积极性，要求打破平均主义。这两种批评意见实际上都是来自人类的同一种自私天性，就是希望过得比别人好，至少也不能比别人差。强者因为自己强，所以想通过恢复私有制来实现自己占有更多财富的愿望；而弱者也不希望过得比别人差，希望能有一种制度彻底地抑制住强者，让自己也享受到和强者一样的生活条件。

在这个问题上，布尔什维克也是逐步后退的。最初他们试图通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遭受挫折后，采取“新经济政策”作出让步，缓解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后来又通过集体化和工业化建立起全国的公有制，但这是以向强者作出让步为代价的，即用工资差别和国家特供等手段保证了强者获得比弱者更多一些的物质待遇，以此换得干部和技术人员、熟练工人的工作积极性。在苏联，干部、技术人员、熟练工人的工资要比普通工人高。高级干部还可以享受更好的住房条件、医疗条件以及特殊的物品优先供应条件。这些东西缓解了强者的不满，使得社会经济体系和管理体系能够有效地运转下去。但这遭到了享受不到这些好处的人和坚持社会主义理念纯粹性的人的不满，他们攻击这是旧制度的残余，应当加以摧毁。

工资水平的差异和特权制度的存在，是共产党人对私有欲望的让步，也是公有制向私有制回归的前兆。有人还用马克思的理论寻求解释，称马克思说的是生产资料要实现公有制，而生活资料还是要保持个人所有制，所以某些人的高收入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应该说在整个苏联时期，对私有制的回归也仅止于个人消费资料的差异性分配上了，他们还是维持住了全民的大致平等，以少量的代价建立起了一支维持体系运转的干部和技术人员队伍。尽管有人攻击那是不平等，当时其干部与工人的工资差异最高已达到 45 倍，引起了很强烈的不满，可是现在俄罗斯亿万富翁与普通工人的收入相差又何止千倍万倍！不知当时批评特权制度的人该作何感想。完全向私有制的回归是在戈尔巴乔夫（М. С. Горбачев）改革之后，到叶利钦（Б. Н. Ельцин）时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4、现实的人性限制是革命的边界

一场革命究竟能走多远，一方面取决于革命者的主观努力，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人类天性的限制。十月革命的发起者是一群信念纯粹、意志坚定的优秀人物，他们把革命推到人性能达到的峰巅，也推进到了人性所能承受的极限。他们输出革命，在国内废除剥削和压迫，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民平等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也在遭遇了人性的顽强抵抗后被迫向传统世界回归。他们放弃了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世界革命理想，回归到了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关系体系，说明人类对国家、民族的认同高于对阶级的认同，建立一种在阶级认同基础上的世界政治架构模式的理想是无法实现的；他们放弃了“自由人联合体”的尝试，被迫用一种类似传统政府的强制手段来管理国家，这是对传统政府的回归，说明人性无法在高度自觉的基础上形成自由人联合体的自治秩序，只能由一部分人的暴力强制作后盾，才能形成有秩序的公共生活，强制是秩序的前提；他们建立起公有制，废除了剥削，并试图在公有制基础上将人们的私有观念消灭，将人们改造成社会主义的新人，但

是他们遭遇到人的自私观念的顽强抵抗，被迫作出了让步，先是在收入分配上拉开档次，继而走向了废除一部分公有制，恢复一部分私有制的边缘。这一系列超越的努力和无奈的回归过程，让我们看到了革命的超越之处，也看到了它们不能超越的界限。这个界限就是人性本身，就是人的自私的、不能自律的天性和更倾向于以地域为基础的民族、国家认同的结群天性。这些天性是革命的边界，当革命走到它的边界时就该结束了。

（五）结局与开始：苏联解体与十月革命的逻辑关系

有观点认为，苏联解体标志着十月革命的失败。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不够准确。苏联的解体只是十月革命的结束而不是失败。这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咬文嚼字。作为一场政治革命，十月革命推翻了旧制度，建立了新制度，它面临的一切直接敌人都被战胜了，在这方面已经获得了完全的成功；从实际功能的角度看，十月革命完成了恢复秩序、重建国家的历史使命，也不能称之为失败。但是当革命成功之后，它的理想主义遭受到现实人性的压力，不断向传统回归，现实的人性又制造出一系列技术性的困难，比如生产效率低下、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等，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革命的意识形态即社会主义理论在提供实用的技术手段方面不具有当时重整秩序时的耦合优势，相反，自由主义理念又一次抬头，再次发挥了解构性的破坏作用。

苏联的解体是十月革命的结束，因为它在意识形态上终止了十月革命创造出的价值观念体系，以一种新的理念作为社会认同的共同价值，作为社会发展的方向，至此，以十月革命这面旗帜为导向的运动停止了。但终止不是失败，事实上，苏联的解体是在十月革命给定的基础上的一次向现实人性的彻底回归，它并没有完全摧毁十月革命的成果，只是回归到位了。苏联的解体基本上是和平进行的，只有小规模的内部分裂冲突，如地方分裂主义发起的战争，但没有发生十月革命时那么大规模的残酷内战，也没有此后的残酷清洗。这并不是因为人们从历史进程中获得了经验，变得更为理想所致，而是十月革命所打下的良好的社会基础使然。十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社会基本上是平等的，绝不像革命前那样存在着悬殊巨大的阶级差别，因而也产生不了以阶级分裂和阶级斗争为基础的大规模内战。不仅如此，十月革命的许多成果也被继承下来了，比如大企业的公有制、对劳动者的尊重等，就连革命者的组织——共产党也被保留下来了。如果目前这种权力嬗递的方式得以维持的话，焉知在十年二十年之后，共产党不会重新执政！苏联解体所终止的只是作为价值符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并没有改变十月革命已经创造出的这七十年的积极成果。

目前我们所常见的对于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如苏共的官僚主义使其脱离群众、没有搞好经济建设、与美国搞军事竞赛等，基本上囿于原苏联内部的反对派的话语

体系，从一个大的范围来看，仍不过是关于十月革命的两种传统叙述的继续发挥而已。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需要专门撰文分析，此处不多赘述，只是简要地谈一谈自“大历史”的角度能看到的苏联解体的实际原因。

第一、人的现实性需求构成了苏联解体的社会性原因。

十月革命是因为解决了实际的社会技术性问题而获得成功的。当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技术手段的耦合促成了革命的成功，革命成功之后遭遇人性的限制而向传统逐渐回归，面临人的现实性需求制造出的新的技术问题，使促成革命成功的意识形态开始变得与解决问题的技术手段不合拍。比如，人们入党当干部的实际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物质收入，但正统意识形态却要称之为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种意识形态当然是有根据的，列宁、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Анато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Луначарский)等人当时投身革命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过好日子，的确是为了被压迫者的解放。但在和平年代里，那些后来的继承人只是出于在一个既成的分配体系里尽可能地获得比较好的收入的动机。革命者是自愿的选择，不是强迫出来的，而强迫的结果只能是说一套做一套，意识形态与技术手段相脱节。如前所述，人的自私天性以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方式对现存的社会制度提出挑战，而统治阶层却没有有效的技术手段应对这种挑战，由此造成了根本改变制度的可能。

第二、统治阶层的人员素质下降。

人力资源智力优势下移的规律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仍在发挥作用。经过四代领导人更替之后，苏共掌权者们的智力素质和道德素质急剧下降，不仅比不上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甚至不如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从道德素质的角度看，他们已经失去了当年革命者的理想主义，多数是些只顾个人利益的小市民。从智力素质来看，尤其是其掌握决策权的最高层的头脑开始糊涂。最明显的标志是戈尔巴乔夫，他兼具二月革命时罗将柯和孟什维克的弱点，看不到政权的本质是暴力，对自由主义持有“萨满”式的崇拜心态，丝毫没有洞察人民反对现制度的实际动机，认为只要建立了公开的民主制度，人民就会自觉地选择自由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道路。这种在政治上的天真实际上是一种弱智，而整个统治阶层充满了类似的人和类似的观念。叶利钦进入苏共最高决策圈子苏共中央政治局后，发现这些最高领导中竟然没有一个有才华的人，叶利钦本人也陷入了对自由主义的“萨满”式的崇拜，以为只要推行私有制和议会民主，俄罗斯社会就能一步跳跃到美国那样的社会状态。他后来意识到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当时的确就是在这种幻想的支配下搞垮了苏联，一切情况与二月革命十分类似，苏联在各种政变的挤压下解体了。

自叶利钦炮轰白宫、驱散苏维埃之后，俄罗斯已经逐渐走上了理性的世俗性的发展道路。经过十月革命和苏联解体，社会主义理念和自由主义理念各自获得了一

次试验机会，它们都有所创造，其创造物中积极的成份也都保留下来了；也都有所冒进，试图超越现实人性给定的边界。经过这两次大的试验，这两种意识形态中的空想成份已被淘洗殆净，如今的俄罗斯是一个更关注技术手段和传统价值的理性的世俗国家，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带来的类似宗教的神圣化的意识形态已淡出官方的权力支持之外，仅是各个政党的政治口号。可以说，现在的俄罗斯政治是回归到位了。但是，这种彻底的回归带来了新的问题。比如在领土范围问题上，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都是否定沙皇俄国时期的帝国野心的（斯大林曾以社会主义为旗号重建过帝国的疆域），而现实的世俗政府意识到帝国体系对全民带来的实际好处，所以很难讲不会再有恢复其帝俄时期地缘政治存在的意愿。普京总统已经明确指出，“苏联的崩溃是 20 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①未来恢复地缘政治关系恐怕是俄罗斯以后各届政府的共同取向，而世界格局也将由此发生重大的变化。

五、关于十月革命的历史学总结与政治评价

在我们对十月革命进行总结性评价时，首先应区分两种评价，一种是学术性的评价，一种是政治性的评价。学术性的评价将置身于政治立场之外，只论事情的有无真伪，不论其是非对错；只揭示事件的逻辑关系，不考虑逻辑结论可能对现实政治造成什么后果。而政治性结论必须考虑到对历史事件的评价可能导致的现实后果，必须有立场、有倾向性、有目的性，其作出判断或结论的原则应该是有利于某种政策的实施或维持某种政治利益关系的。这两种评价都是需要的。前者可以帮助人们从全局的客观角度观察历史，获得智慧；而后者则是眼前社会实践所必须的。任何政治体制都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有其得以立足的道义基础，有其借以凝聚全民的动员口号，这些东西常被笼统地称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它们很大一部分来自对历史事件的评价，但是这种评价不会是客观的兼顾在竞争中失败的对立面的立场，只能是主观的维持现存统治阶级原则的立场。

（一）关于十月革命的历史学总结

1、十月革命以及苏联解体的经验表明，任何主义都有一定的空想色彩和局限性。

在二月革命、十月革命，乃至苏联解体中发挥了重大实际作用的意识形态体系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都获得了实现自己、展示自己的机会。但结果表明，这些“主义”都产生于社会因技术性问题而出现的危机中，都试图用意识形态手段

^① [俄]普京著：《普京文集》（2002-2008），张树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80页。

来解决技术性问题，都具有一定的空想性。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们是根据理论逻辑和对人性的美好假定作出对未来世界的承诺的。这种从未有过先例的承诺非常契合被压迫群众摆脱眼前苦难的愿望，也适合他们相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美好社会的心理期待。可是当梦想实现以后，人们才发现并不存在这样美好的世界。不错，剥削被消灭了，没有了被剥削的痛苦，但也没有了剥削别人的动力，社会因此而停滞，人民仍然缺乏幸福。

自由主义产生于对现存极权制度的绝望之中，而且还有欧、美民主国家的实例摆在那里，于是，俄国的自由主义者从米留可夫到叶利钦，都以为只要把英国、美国的制度横移过来，俄国就会变得和那些国家一样。但事实表明，自由主义理念在英国、美国起的作用与在俄国起的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英、美，自由主义不仅是革命的力量，也是建设性的力量，是构成现政权、维护现政权的建设性力量。而在俄国，自由主义除了在瓦解旧政权时发挥了有效的作用外，在重建政权、恢复秩序方面，基本上不起作用，反而加重了无政府状态的蔓延。于是我们看到，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在俄国都没有完全兑现其承诺，也都没有完全实现其梦想。

这个结论告诉人们，并不存在任何主义在其未实施前所作出的承诺被完美实现的可能，因此，应打消对一切主义或制度的“萨满”式崇拜，不要寄希望于任何一种主义或制度的实施能够一了百了地解决人类社会的苦难和问题。简言之，应放弃一切主义或制度崇拜，而将注意力集中于实际的技术性问题。

2、任何制度与体制都有巨大的意识形态空间可供利用，都足以支持附着于各种意识形态符号的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手段，不必动辄以改变制度这种剧烈的变革手段来解决实际上很小的技术性问题。

二月革命之前，俄国社会面临的困难其实是技术性的，而不是制度性的。如果沙皇尼古拉二世本人具有雄才大略的话，那么完全可以在继续维持沙皇统治的制度框架内解决问题。^①只是各种条件的耦合，使得因一个具体人物或一个具体家族的无能而产生的技术问题用改变制度的方式来加以解决。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成本巨大，且后遗症严重。苏联解体前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技术性的，也可以在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下解决问题，比如中国的改革就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但是，“萨满”式崇拜重新抬头，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们仍用改变制度的方式来解决实际的技术性问题，结果并不好。苏联解体，经济崩溃，人民经历了漫长的苦难。

现在的俄罗斯似乎已经回复了理性，他们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吸纳并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中的积极成果，比如恢复国家对能源产业的控制、恢复中央政府对地

^① Брусилов А.А. Мо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Минск, 2003. С.272.

方政府的集中管理等。可以说，现在的俄罗斯，是在资本主义的旗号下搞社会主义。其实，正如第一条结论中所说的那样，应取消对一切“主义”和制度的盲目崇拜。既然任何一种主义都有其空想之处和局限性，而任何制度都有如此充分的实际政策应用空间，那么给各种政策贴标签，并按标签判断取舍的方法是不可取的。作为解决实际技术性问题的政策，判断其价值的标准是其是否能有效地解决问题，而不是是否与某种意识形态标签相吻合。

3、革命的代价十分巨大，收益却不如其发起者所设想的那么理想，如果革命是一个单方面的决策，当然最好不要有。但是，革命是社会多方面博弈后的结果，没有人能从全局的投入产出分析来决定发动还是取消革命。革命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也是人类总体上非理性的结果，因而，永远不能杜绝革命的可能。

这条结论告诉我们，革命这种历史事件的发生既非少数革命家制造的结果，也非自以为是的“智者”们的劝诫所能消弥得了的。革命既不是革命者所盛赞的“历史发展的火车头”，也不是保守主义者所攻击的那样是造成一切灾难的洪水猛兽。革命只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种人类迄今为止尚不能从根本上完全控制的社会现象，总有发生的可能。而能否发生革命或者说能否控制住局势，不让革命发生，则完全取决于当时各种政治力量和领袖人物的智慧水平了。历史学家的立场是超越革命与保守之争，只观察历史运动的实际结果，根据这种观察，革命一旦到了发生的程度，就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而事后诸葛亮们的肯定或否定，对于这个事件的发生没有任何作用。

如果从减少社会变革成本出发想去避免革命的话，那么最有效的手段是解决具体的技术问题，而不是在赞成或反对革命的抽象论辩中较劲。

（二）关于十月革命的政治评价

1、必须对十月革命做出全面肯定的评价

这是出于现实需要作出的评价。因为十月革命是我国现行政治制度的逻辑起点和合法性基础，如果否定十月革命，就等于否定我们的现行政治制度。如前所述，我们的现行制度有足够的弹性空间实施各种有效的技术手段，以解决任何技术性问题。因此，坚持现行政治制度就是坚持成本最小的社会发展路线。所以，必须坚持一切有利于维护现行制度的历史评价。

中国和俄罗斯的情况不同，中国是在现行制度框架下完成改革的，而俄罗斯是在改变既有制度框架下改革失败的。现在他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只能是在坚持既有的制度框架下重新完成改革。所以，作为一种官方观点，俄罗斯官方已经不大可能再为十月革命“平反正名”了，只能像现在这样，以一种比较含糊的折中立场对待十月革命。即便将来共产党再当政，也不可能再恢复苏联时期那种一家独尊的

苏维埃历史叙述了。而中国则完全可以，而且也应该坚持以苏维埃叙述作为关于十月革命的官方主流观点，绝不能有所动摇。

2、要吸取苏联历史教育的失败经验，有效地处理反苏维埃历史叙述带来的挑战，使之转化为积极的因素。

坚持对十月革命的肯定性评价，肯定会受到反苏维埃历史叙述的挑战。在网络化时代，试图以信息封锁的方式反对对立面的观点已经不可能做到。各种反苏维埃叙述，特别是来自俄罗斯国内的反苏维埃的历史叙述已经渗透到中国，不仅专业的历史学者们了解他们的观点，就是普通百姓也通过多种渠道，如文学和影视作品受到了影响。因此，简单地回避反苏维埃历史叙述，单方面坚持苏维埃叙述，不能收到真正说服人的效果。

在这方面，也要汲取前苏联在历史教育方面的教训。曾几何时，苏维埃叙述是唯一的官方叙述，而且持续了将近七十年。但仅在几年间，反苏维埃叙述卷土重来后就全面颠覆了人们的观念，那几十年的正面教育除了留下“说谎”的恶名外，没起到任何有益的作用。这说明，一味使用高压单方面灌输未必能产生好的效果。前苏联的那种历史教育其实是一种愚民教育，他们以为通过愚民的方式可以巩固现存秩序，可是没想到，首先遭受愚弄的却是上层统治阶级。试想，如果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能够真正理性地理解二月革命中自由主义者的试验所带来的严重的破坏性后果，他们还能那么坚定、那么执迷不悟地推行自由主义的改革吗？片面的历史教育往往使其身居最高决策地位的政治家不能从历史中吸取全面的、有价值的智慧，因而再一次重犯前人犯过的错误，重蹈前人的覆辙。所以，我们在历史教育中应对反苏维埃的历史叙述进行科学的处理，既对其中夸大不实之处予以校正，又对其所提及的革命的负面作用给予适当的解读，使人们在全面了解历史的前提下学会理性地思考问题，从而将反苏维埃历史叙述中的不利因素转化为有益于维持现存制度的积极因素。

3、要做好意识形态的“软着陆”

不可否认，在意识形态与技术手段之间往往会存在一定的不合拍之处。比如，正面肯定十月革命，似乎就意味着在肯定一种革命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认为，任何问题都是制度不好造成的，要根本解决问题，就必须采取改变制度的方式。因而对现政权起源合法性的肯定，也很可能会变成对现政权现实合理性的否定。对一切从革命起家缔造政权的国家来说，在其稳定的执政期，其实都面临着如何消弭革命思维的破坏性后果的问题，即要将革命的意识形态转化为建设的意识形态。但这个过程应是一个渐进的和缓的过程，不宜大起大落。其实，任何判断都有两面性，比如肯定十月革命，其逻辑后果是坚持革命的思维模式，用新的革命否定旧的革命，

但其情感后果是认识到现政权的正义性和艰难之处，从而加强对现政权的热爱和忠诚；而否定十月革命，其逻辑后果是否定一切革命，因此反对用革命的手段来变革现政权，但其感情后果却是否定现政权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煽动起敌对情绪，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会产生颠覆现政权的效果，苏联解体前所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因此，如何既坚持对十月革命的肯定评价，又避免其强化革命性思维的逻辑后果，是我们对于十月革命作政治性评价和宣传的重要课题，值得深入研究。

【Abstract】 Currently there are two types of narratives describing the history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either for or against the Soviet from different positions, so that the recognition on actual process and nature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is caught in fuzzy disorder. New problems domain is needed if we will reconstruct the actual process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based on sufficient historical materials from a purely objective standpoint of history.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is not a democratic revolution as narrated by anti-Soviet narrative but a coup launched by senior tsarist government officials. The October Revolution is not a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s narrated by Soviet narrative but a powerful activity reconstructing political orders led by the Bolsheviks when the country was under anarchy. Through this narrative, the article attempts to give a completely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cause leading to the coup and power rebuilding and therefore brings light to the inherent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October Revolution and subsequent political system,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Key Words】 1917 Revolution, Transformation of Historical Narrative, New Problems Domain

【Аннотация】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существует два тип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описаний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будь-то советское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описание, поддерживающие Октябрьскую революцию, или же антисоветское, отрицающее Октябрьскую революцию, оба типа подходят к вопросу с разных позиций, вплоть до того, что наблюдается некий хаос в понимании реаль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и характера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Если мы хотим, исходя с чисто объективной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на основании имеющихся в достаточном количеств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данных восстановить реальный процесс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необходима новая предметная область. Феврал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не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как представлено в антисоветских очерках, а переворот, совершенный царскими высокопоставленным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ми чиновниками;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 также не пролетар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как отмечается в советских очерках, а мощн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большевиков по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ю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порядка в период, когда страна уже находилась в состоянии анархии. Посредством такого подхода произведено новое чтение причин совершен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ереворотов и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и власти, а также прослежена связь между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ей и последующе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ой СССР и распадом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описаний, новая предметная область

(责任编辑 肖辉忠)

十月革命的历史是不能改写的*

Е·普里马科夫**

【内容提要】在俄罗斯的政治文献中，常常把1917年的十月革命称为“政变”。正确区分“革命”和“政变”，对正确理解俄罗斯历史发展道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革命与政变的区别在于，革命是提出和解决根本性的问题，改变财产的形式，破坏旧的权力和统治体系。革命必须要有有利于革命发展的形势，就是社会下层不愿意再像以前那样生活，上层也不可以再像以前那样进行统治。在1917年的二月革命前，俄国正是形成了这样的局势。并且，在二月革命后仍然存在着有利于革命发展的形势。显然，把俄国十月革命称为上层的政变是不正确的。同时，在当时的形势下，改良的机会不大，力量的优势在革命者一面。

【关键词】十月革命 政变 改良 阐释

【中图分类号】K512.5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1)03-0078-(9)

在我们的政治文献中，经常将1917年十月事件称为“政变”。使用这一术语的不仅有反对派的政客们，而且还有一些政治理论学者^①。“革命”和“政变”这两个概念对于理解俄罗斯历史发展道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对待历史事件的问题上，总会看到统治力量意识形态的印记。而如果要重新修改评价，那么对历史事件的态度就会受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环境的影响。对1917年十月事件的阐释也不例外。将这一事件贬低为上层的政变，并且在此基础上对苏

* 本文为普里马科夫2011年5月出版的新著（Евгений Примаков. Мысли вслух.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011 г.）的第一章。原文标题为“历史是不能改写的”（Историю не перепишешь）。经作者授权由《俄罗斯研究》发表并改为现名。

**Е·普里马科夫（Евгений Примаков），俄罗斯政府前外长、前总理，俄联邦工商会会长。

① 典型的例子是对著名学者С·日温诺夫（Савва Живенов）著作的评论。一位评论人认为，对历史学家而言，二月革命是十月革命的一个部分。很显然，日温诺夫会同意这样的看法。但是在俄罗斯战略研究所的杂志《Проблемы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стратегии》(2010. №4(5). С.187)上所发表的评论指出，十月政变是对二月革命的误解和扭曲。

联时期七十年的进步进行全盘否定，这是一种企图，即企图表明似乎是 1917 年十月中止了俄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当今条件下，有为数不多的人在为苏联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辩解，而对争夺权力的内部斗争视而不见（这种斗争引起了对成千上万民众的犯罪行为）；对将社会最大阶层——农民阶级引向灾难的政策视而不见。但这一切是上层政变的后果呢，还是俄国革命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反常行为？

革命与政变的区别就在于，革命是提出和解决根本性的问题，改变财产的形式，破坏旧的权力和统治体系。革命必须要有有利于革命的形势，就是社会下层不愿意再像以前那样生活，而上层也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进行统治。1917 年的二月革命前，在俄国正是形成了这样的局势。尼古拉二世（Николай II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独裁统治时期社会状况的特点是：战争前线节节败退，沙皇政府高官们大肆贪污，政权上层荒淫无度，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进行民主革新……还有，枪杀进行抗议的工人。

我回想起，我曾经问过尊敬的阿列克谢二世大主教（Патриарх Московский и всея Руси Алексей II），是否可以将尼古拉二世这样的人物列为圣者？最圣明的主教理解了我的问题，回答说，尼古拉二世被俄罗斯东正教列为圣者，不是由于他的社会活动，而是作为死亡的受难者被列入的。

在临时政府接管了政权之后，有利于革命的形势是否还继续存在呢？许多历史学家对此持否定态度。毫无疑问，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临时政府得到了广泛的支持。的确，临时政府在政权上取代了专制，俄国第一次成为共和国。1917 年 10 月以前取消了宪兵统治，警察变成了民警；所有的政治犯被释放，成立了专门委员会来调查过去官员的犯罪情况；宣布言论、集会、罢工自由；赋予妇女政治权利；取消阶级、宗教、民族限制；废除外高加索和突厥斯坦的省长职位，将政权移交给由当地干部组成的委员会；宣布芬兰自治以及波兰独立。临时政府受推崇的原因，是立宪民主党在初期加入了临时政府。从 5 月 5 日开始，社会革命党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孟什维克也加入了政府。所有这些政党，或多或少都有自己为数众多、分布广泛的基础。例如，社会革命党在 1917 年秋天左派分裂出去之前，有超过 50 万名党员，俄国 78 个省中有 63 个省设有社会革命党组织，在前线和舰队中也都有^①。

但仅仅过了几个月，对临时政府的支持就日渐消退。临时政府丧失民意的最主要原因是，他们不愿意结束战争。新的统治者无力解决土地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和平问题，而这些问题对于超过俄国人口五分之四的农民来说，却具有重大的意义，这导致了局势急剧恶化。

① 参见 Игнатов В. Г. Истор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России. М.: Феникс, 2002. С. 608.

临时政府的四次危机标志着革命的形势越来越紧张。一些文章将这些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内讧、部长们的无能、克伦斯基（А. Ф. Керенский）的领袖至上主义，以及他追求先哲的救世主地位，同时却把临时政府经历各种动荡的主要原因——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革命性置于一旁。实际上，再也不愿意生活在沙皇专制统治下的社会底层，就是在二月革命后也仍然无法容忍当时的社会制度。甚至我敢说，这种程度还大大地加深了。至于说到二月建立的政权，它是无法阻挡当时正在发展的革命局势。

4月，彼得格勒士兵、工人的游行示威，引发了临时政府统治的第一次危机。这些士兵和工人，被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米留可夫（П. Н. Миллюков）致英法两国的照会所激怒，在照会中，临时政府打算继承沙皇时期通过的参战义务。游行是自发开始的。米留可夫以及陆海军部长古契科夫（А. И. Гучков）被迫辞职。4月危机使利沃夫（Г. Е. Львов）公爵领导的临时政府，在存在了两个月后就垮台了。

5月5日，利沃夫再次建立了临时联合政府，但也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参加联合政府的有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这一届临时政府勉强维持到6月的第二次政治危机。这次危机起源于彼得格勒29个工厂工人的罢工，工人们反对临时政府没收工人俱乐部和工会机构用地的做法。彼得格勒举行了50万人大游行，口号是：“要面包，要和平，要自由”，“打倒资本家部长们”，“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当时还没有反对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口号）。在这些口号的号召下，莫斯科、明斯克、哈尔科夫、特维尔、下诺夫哥罗德和其他城市，也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众游行。危机显示了人民大众积蓄的革命潜力，革命事件已经不仅仅局限在彼得格勒，而是远远超出了这个界限。

第三次危机，通常认为与7月2日立宪民主党人脱离临时政府有关。这次脱离是为了表示对临时政府不得人心的举措的抗议。即，以外交部长捷列先科（М. И. Терещенко）和邮电通讯部长采列捷利（И. Г. Церетели）为首的临时政府代表团，承认乌克兰中央机关宣布自治，加入自治的还有俄国西南一系列地区。而第三次危机的真正原因是7月3日至4日的事件，即在彼得格勒爆发了士兵、工人大规模的反政府运动。这次运动是由于前线进攻遭受失败而引起的。第二天再次爆发了50万人游行。在涅瓦大街和花园街街角处游行的人群，遭到被调集到彼得格勒的军队的机枪扫射。7月5日，彼得格勒宣布戒严，总理利沃夫辞职。

接着，克伦斯基成为政府首脑，他组建了第三个政府（15个部长里几乎有一半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军事独裁的倾向越来越加强。镇压工人和士兵的苏维埃组织是其目标。这样的苏维埃组织和农民代表的苏维埃组织网络遍布俄国。苏维埃和村会组织越来越多地起到自治的作用。在这个组织网络中，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力

不断增长。

典型的是在彼得格勒有传闻说，利沃夫在一次非正式场合如此解释自己的辞职和克伦斯基出任总理的原因，“我是被迫离职的。为了挽救局势必须解散苏维埃组织，并且向游行的人群射击。这个我是做不到的，而克伦斯基可以。”^①

7月18日，科尔尼洛夫(Л.К.Корнилов)将军被任命为俄国军队的最高统帅。此次任命与克伦斯基建立自己的独裁统治有关。但科尔尼洛夫将军的想法完全不同，他希望自己成为独裁者。8月25日，科尔尼洛夫将军在与克伦斯基进行了多次谈判后，把军队集结到彼得格勒，要求解散临时政府。克伦斯基担心失去自己的阵地，并且在面对科尔尼洛夫有利、而自己节节败退的形势下，他将科尔尼洛夫的这次行动称为军事叛乱。立宪民主党的部长们，为了表示对克伦斯基的反抗以及与科尔尼洛夫的团结，纷纷递交了辞呈。

向彼得格勒的进军严重受挫。哥萨克军团只到了普尔科沃高地，指挥官克雷莫夫(А.М.Крымов)将军被击毙。第四次危机爆发，一直持续到9月25日。当时又建立了联合政府，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仍继续坚持参加联合政府。他们相信，只要与资产阶级联合，他们就可以进行改革。

科尔尼洛夫叛乱的失败，可以称为革命进程的转折点和新的开始。列宁以布尔什维克党的名义，建议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保持民主革命力量在军队进攻彼得格勒时所表现出来的团结，以夺取政权。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害怕布尔什维克力量的加强，对这一号召没有回应。

著名历史学家沃洛布耶夫(П.В.Волобуев)在与西方同行争论改良主义者能在多大程度上进行选择(必须从两种方案中选择一项)时，对当时的形势给出了公正的评价：“在俄国1917年的现实条件下，这种可能性还不大。人们可以为十月未实现的资产阶级选择而叹息。但现实却是力量的优势在革命民众这一边，他们选择了对自己有利的社会主义道路。”^②

我认为，对客观的历史学家来说，二月革命后国内继续存在着有利于革命的形势，应该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布尔什维克是否利用了这一形势？毫无疑问是利用了。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完成的十月革命，标志着资本主义政权的终结，把银行、工厂、基础设施等转为国有，在原沙皇俄国的所有土地上广泛展开了激进的变革。数十万曾经在国内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人们，在革命的旗帜下继续战斗。可以把这一切都认

① Шикман А.П. Кто есть кто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справочник. М.: Вагриус, 2003. С.45.

② Октябрь 1917: Величайшее событие века или социальная катастрофа?// Под ред. П.В. Волобуева.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90. С. 240.

为是上层的政变吗？答案只有一个：不可以。

说一些稍微离题的内容。苏联时期曾对“革命”和“政变”作过不完全正确的区分。那时没有把“革命”降低为“政变”，恰恰相反，把“政变”提升到了“革命”的范畴。1979年苏军进入阿富汗的理由，是帮助阿富汗继续进行排除外力威胁的革命。出兵后，我作为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所长，被邀请参加由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А.А.Громыко)主持的外交部委员会会议，讨论了阿富汗的局势。在这次会议上我发言说，在阿富汗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有利于革命的形势。这一观点受到了一些外交官的批评，而外交部长则极力维护我的意见。可以证明这一观点的事实是，农民不接受农业改革，集体拒绝接受分配给他们的土地，还说土地是属于真主的。这样就保留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后续的事件证明，通过变革，而不是革命的道路，阿富汗政权的性质发生了改变。

一些客观上反对十月革命的人甚至还这样说，十月革命是一小撮从德国乘坐打上铅封的火车到俄国的人所组织的。考虑到十月革命的胜利，这种耸人听闻的解释，从实质上讲，是对俄国人民的侮辱，他们长期被强加于一种在外部设计好的、目的在于将其逐出反对德国军事联盟的制度。列宁(В.И.Ленин)和他周围的一些人，在二月革命时都在国外，他们利用一切机会想返回俄国。可能在德国的某些人考虑到，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们，会利用革命的过程来加强俄罗斯国内的反战运动。但是这难道可以胜过那毫无疑问的事实？事实就是有成千上万热情的民众，在彼得格勒的芬兰火车站，欢迎回到故乡的人们。我来援引列宁在1918年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大会上的发言，每个字都是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当然，有人认为革命可以通过预定、协议来诞生在其他国家。这些人要么是疯子，要么就是奸细。当几千万人一致认为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正在成长。”^①

1917年十月俄国爆发了真正的革命，这一事实与承认以非流血的方式（莫斯科除外）夺取政权是并不相悖的。这一事件，不应与稍后爆发的国内流血战争相提并论。我想强调的是，十月革命的爆发在俄国历史上并不偶然。

当然也不能否认与俄国社会生活中的革命性变革并存的消极方面。国内战争永远是俄罗斯全社会无法治愈的伤痛。好在我们已经摆脱了苏联时期确定的固有模式——把所有白军都认为是恶人、祖国和人民的敌人、完全丧失了爱国主义精神的人。但恢复公平不应当走向另一个极端——不仅赞美所有的白军将领，避而不谈红军的功绩，而且丝毫不谈白军的血腥暴行，而一味强调“红色恐怖”。这对客观评价十月革命中的悲剧事件毫无益处。

① Ленин В.И.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5-е изд. Т.36.С.457.

毋庸置疑，部分俄国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持消极态度。著名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1918年撰写的《俄罗斯革命精神》^①一文中引用了普希金的诗句：

我们迷路了。这可怎么办？
是魔鬼把我们引上了歧途，
看样子，叫我们在四面打转。^②

大部分俄国知识分子正是如此认定，他们不认同革命，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成了大规模流血事件的人质。

很多人把革命看作是由俄罗斯精神特殊性而引发的叛乱。别尔嘉耶夫（Н.А.Бердяев）在上面提到的文章中写道：“从表面上看，在俄国爆发了空前激进的变革。但更深刻、更透彻的认识，应该在俄罗斯展现下列三者的革命形象。1）旧俄国；2）我国伟大作家们早就在自己作品中揭示的精神；3）早已控制了俄国人的群魔。”在不赞成把俄国革命与有关俄罗斯人的特殊性相联系的同时，我认为更应当承认，正是俄罗斯所固有的特征，深深地影响了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中的一些重大事件。这样的论断在苏联时期被忽视了。那时人们特别强调革命的社会内容，但从实质上讲，人们将俄国的特色归结为在俄国形成的革命形势。

斯大林（И.В.Сталин）曾经强调过社会主义革命和资本主义革命的区别，因为前者是从夺取政权开始的，而后者是以夺取政权而告结束的。如果遵循这样的结论的话，那么应该承认，由十月革命而产生的革命过程，很快就被斯大林的领导实践扭曲了。在一系列惨剧之后，苏联变成了工业强国，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在二战后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之一。比较公平的是，今天人们更多谈论的是武力镇压这样的罪行，数百万人成为牺牲品，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也是无法让人谅解的。

我想强调的是，在列宁逝世之后不久，拒绝执行新经济政策使俄国遭受了巨大的历史损失。

1921年春，苏联宣布过渡到发展的改良阶段——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写道：“与过去革命的道路相比较，这是改良的方法（革命是从根本上彻底破坏旧的一切的改革，而不是小心翼翼的、缓慢的、逐渐的、尽可能少做破坏的重建）。"^③列宁说，过渡到改良阶段是长期的、严肃认真的过程。应当指出的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就可以理解社会主义需要与市场经济相联系。显然，这种过渡不是适应当时情况的权宜之举，而是为俄国社会改革指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发展道路。这条由革命到改

① Из глубины: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о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М.: Изд-во МГУ, 1990. С.55.

② 本段译文出自于冯春先生的最新译本，参见：《普希金抒情诗全集》（下卷），冯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345页。——译者注

③ Ленин В.И. Полн.собр. соч. Т.44.С.222.

革之路在俄国没有行得通，最终导致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

遗憾的是，列宁病重，加上他在 1924 年逝世，使我们无法完整地、高度准确地研究列宁观点的演进——从无条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具有暴力功能，十月革命后唯一可能的政权形式）^①，到得出这样一种结论：“我们把完全另外一种具有改良性质的行为方法、计划、体系置于这种（根据列宁的判断，指的是具有革命性质的一一普里马科夫）行为方法、计划、体系的位置上——不打破旧的社会经济制度、商业、小型企业、资本主义等。”列宁号召恢复这一切，只是对此加以适当的国家调控^②。列宁观点的这种演变，并不能证明他拒绝无产阶级专政，事实也不是这样的。但实际上能削弱了暴力功能，并允许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俄国共同存在。

当然，列宁是革命实践者，他深刻地感受到，余粮征集政策使得农民极力反对十月革命。喀琅施塔得兵变、一系列的农民起义，都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他不能预见的还有，希望欧洲国家快速进行革命只是一种空想，结果是，俄国仍处在资本主义的全面包围之中。

但转向改革并不限于满足现时的需求，这种过渡不可能有，也没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布哈林（Н.И.Бухарин）所强调的理论意义。布哈林抛弃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左倾思想，在列宁去世后，成为新经济政策的积极维护者。布哈林 1925 年 4 月 17 日在俄共莫斯科党团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作报告指出，列宁在《论粮食税》这本小册子中称为正确的经济政策（与战时共产主义相反，列宁也是在那本小册子里把战时共产主义，定义为国内战争展开的战场强加给我们的“令人悲哀的必要性”）的新经济政策的意义就在于，以前一系列经济因素不能相互促进，因为这些因素因战时共产主义而封闭，而现在则能够相互促进，并且对经济增长起到积极的作用^③。

布哈林坚决反对新经济政策具有短期性这一论断。他写道，我国将在数十年中逐渐扎根于社会主义^④。而且布哈林认为，如果放弃新经济政策，就不能增强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的联合，会引起苏联经济管理的过度集中，使大部分管理者变成新的没有私有财产的剥削阶级。

斯大林是从完全不同的立场来看待新经济政策的。他并没有公开批判新经济政策，而是把新经济政策的意义归结为一个短期行为，“当苏维埃政权竭尽全力发展社会主义，同时也允许资本主义复苏的时候……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这个竞争过程中

① «Научное понятие диктатуры означает не что иное, как ничем не ограниченную, никакими законами, никакими абсолютно правилами не стесненную,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на насилие опирающуюся власть». (Ленин В.И.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Т.12.С.320).

② См. там же. Т.44. С.222.

③ Бухарин Н.И. О нов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 и наших задачах.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8. С.125.

④ Правда. 1923. 30 июня.

增强社会主义的地位，争取消灭资本主义因素（引者注），建成作为国民经济基本体系的社会主义体系。”^①

这些观点被列入 1936 年《关于新宪法的报告》。也就是从那时起，运用市场关系来恢复国家经济的大门被关闭了。

1938 年 3 月 15 日布哈林被枪决。

我用《文学报》主编、作家波利亚科夫的话来结束这一章节，“我们正试图从阿布拉莫维奇的快艇上看‘阿芙乐尔号’。”^②我认为，这些话可以适用于那些把十月革命以及把十月革命所起到的巨大历史作用，贬低为一小撮布尔什维克党人发起的政变的人。

还有，我想起了毛泽东的话——“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③。我们已经过正了。或许，已经够了？

（班婕 译）

【Abstract】 October Revolution of 1917 is often referred to as “coup” in Russian political literature. To distinguish between “revolution” and “coup”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Russian history development. Revolution differs from coup in that revolution is to put forward and resolve fundamental questions, change the form of property, and break down old system of power and ruling. Revolution requires situation conducive to development of revolution, that is, in the society lower class is unwilling to live as before, while the upper class can not rule as before. Such situation was formed in Russia before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of 1917; meanwhile, situation benefici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revolution still existed after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It is apparent that regarding Russian October Revolution as coup of the upper class is not correct. In the meantime, the opportunity of improvement was slim in the situation of the day, and the advantage of power was in the revolutionaries.

【Key Words】 October Revolution, coup, improvement, elaboration

【Аннотация】 В русс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 часто называется «переворотом». Правильное разграничение между понятиями «революция» и «переворот» имеет очень важ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① Сталин И.В. Доклад о проекте Конституции Союза ССР. М.: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1951. С.15, 16.

② Интервью Юрия Полякова газете «Московский комсомолец» 6 декабря 2010 г.

③ 出自毛泽东：“湖南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 1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 年。原文为：“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俄文对应译文来自《汉俄译例汇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年。——译者注

правильного пониман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Разница между революцией и переворотом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том, что революция поднимает и разрешает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изменяет формы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разрушает старые системы власти и господства. Революция должна обладать благоприятными для развития революции условиями, то есть низы не хотят жить по-старому, а верхи не могут управлять по-старому. До Феврал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1917 г. в России сформировалась именно такая ситуация. И после Феврал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по-прежнему сохранялась способствующая развитию революции ситуация. Очевидно, что неправильным является называть Октябрьскую революцию в России переворотом сверху. К тому же, в тех условиях существовало мало шансов для улучшения ситуации, и преимущество в силе было на стороне 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переворот, улучшение,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я

(责任编辑 常喆)

观念、体制与领袖

——阿奇·布朗视野中的俄罗斯转型*

封 帅**

【内容提要】阿奇·布朗是当代英国俄罗斯东欧研究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坚持运用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在苏联、俄罗斯转型方面形成了一套系统而独特的观点。他认为苏联改革源于体制内部的专家辩论所带来的思想创新；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改革和转型以及结束冷战方面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苏联和东欧的转型应该被看作民主化的“第四波”；当代俄罗斯政治体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应该被看作一种混合体制。他的思想和理论是当代西方主流观点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英国的学术研究和外交实践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关键词】阿奇·布朗 苏联改革 戈尔巴乔夫 第四波

【中图分类号】D503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1)03-0087-(13)

阿奇·布朗（Archibald Haworth Brown）是当代英国著名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是英国在苏联和俄罗斯研究领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布朗生于1938年，年轻时从事记者工作，后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曾在格拉斯哥大学任教。1971年进入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St Antony's College），长期从事苏联、俄罗斯及东欧问题的研究，其研究成果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且对撒切尔和布莱尔时期的英国对苏（俄）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1991年，布朗当选为英国科学院院士，并在1999—2002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外俄苏研究”（项目编号：2009JJD81005）的阶段性成果。

** 封帅，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年期间担任英国科学院政治研究学部（Academy's Political Studies Section）主席。^①

布朗的研究兴趣非常广泛，涉及到苏联和俄罗斯的政治、文化、体制、领袖等多方面，尤其是对于苏联和俄罗斯领导层与转型相互关系的研究在学术界独树一帜。他最重要的代表作品是出版于1996年的《戈尔巴乔夫因素》^②，其中全面分析了戈尔巴乔夫（M. Gorbachev）在苏联转型中的决定性作用。此书赢得了英国政治研究协会年度最佳政治类书籍奖——W.J.M.Mackenzie奖和英国东欧斯拉夫研究协会的Alec Nove奖^③，被认为是当代戈尔巴乔夫和苏联改革研究中最重要作品之一。

布朗以其独特的视角、广泛翔实的资料以及冷静和理性的研究态度，对苏联和俄罗斯的转型过程给出了自己的卓越诠释。因此，我们可以围绕着苏联、俄罗斯转型这条主线，勾勒出布朗思想发展的基本轮廓。

一、思想变革：苏联改革的源起

对于大多数的西方理论家而言，80年代中期新思维和苏联转型的出现并不符合传统转型理论的观点。西方学者用“极权主义”的概念来描述斯大林之后的苏联政治体系。这一概念的影响非常深远，以至于研究者往往将极权主义的理想模式与苏联政治的实际混为一谈。在他们看来，苏联政权是铁板一块，不可能发生任何变革。

对此，布朗针锋相对地指出，这种概念的滥用导致了对现实状况的极度夸张，“这实际上对理解苏联的变革毫无帮助”^④，更有甚者，它使得人们对于苏联可能出现渐进变革的可能性视而不见，同时也影响了应有的政策调整。

在布朗看来，许多西方政治学的概念都无法适用于俄罗斯问题的研究，例如很难用“利益集团”这个概念来分析苏联体系。^⑤苏联只有机构的利益，以及由不同的专家组成的“意见集团”。而正是这些“意见集团”之间创造性的辩论活动带来了思维创新。^⑥

① 关于阿奇·布朗的生平事迹，可参考 Alex Pravda, “Archie Brown”, in Alex Pravda (ed.) *Leading Russia. Putin in Perspective: Essays in Honour of Archie Brown*,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1-8.

② Archie Brown, *The Gorbachev Factor*,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该书于2000年出版德文版。

③ W.J.M.Mackenzie奖是英国政治研究协会颁发的年度最佳政治类书籍奖，Alec Nove奖是英国斯拉夫东欧研究协会颁发的，旨在奖励俄罗斯、东欧研究领域的优秀书籍和论文的专业奖项。

④ Archie Brown, “Transnational Influence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m”, *Post-Soviet Affairs*, Vol.16, No.2, April-June 2000, pp.185-186.

⑤ Archie Brown, “Problems of Group Influence and Interest Articulate in the Soviet Union”,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7, No.2, Spring 1972, pp.229-243.

⑥ Archie Brown, “Policy-maker in Communist States”,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Vol.11, No.4, Winter 1978, pp.433-434.

在探寻苏联改革思想源头的过程中，布朗与大部分西方学者不同，他没有过多关注那些体制外的“持不同政见者”，而将更多的目光集中于苏联体系内部的专家之间的辩论。他认为，正是这些辩论活动在政治思维的创新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他认真查阅了70年代以来苏联出版的大量晦涩难懂的专家作品，通过大量的分析，他发现，由于出版的限制，很多观念都隐藏在苏联传统教义的伪装之下。^①这些可能掌握苏联中央权力的人们实际上有很多潜在的思想变化。这些专家的讨论涉及面很广，政治文化、三权分立甚至竞争性选举都在其列。对此布朗做了很多开创性的研究，因而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就已经断言苏联的政治学将突破传统窠臼的限制。^②他指出，“（苏联专家）已经看到了西欧的未来，而且认为这种前景很有可能成为现实”^③。布朗发现，随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启动与推进，这种辩论越来越深入，影响也越来越大。到了1987年以后，苏联智识界的观点越发激进，最终促成了一场“观念革命”：强调对内实行政治多元化和竞争性选举；对外则是“人道的普世主义”。布朗的结论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实际上就是对这种“观念革命”的总结和反映。^④

事实上，发生在苏联体系内部的专家辩论，在官方文件上产生的影响远不及在知识分子观念中产生的震动。这些党内知识分子很多本身就是高级官员，也有很多对于高层能够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他们的理念可以直接渗透到决策圈，这对于苏联内部政治气候的改变作用深远。布朗认为，恰恰由于苏联体系的高度封闭性，所谓“持不同政见者”的观念对于体系内部的影响微乎其微。^⑤

布朗的逻辑是，观念的变革推动着体系的转型，这也是唯一可能推动共产主义体系转型的道路。^⑥具体而言，政治气候的不断变化最终影响到了苏联最高决策者——戈尔巴乔夫本人，对于本来就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倾向的戈尔巴乔夫来说，这种政治氛围的变化使他本就希望启动的改革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也为苏联的全面转型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成为推动苏联改革的源动力。

二、戈尔巴乔夫：苏联转型的决定性因素

对苏联转型过程的分析，一直是学术界颇具争议的话题。大部分西方学者往往

① Archie Brown(ed.), *The Demise of Marxism-Leninism in Russia*, London: Palgrave, 2004, p.5.

② Archie Brown, “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Soviet Union: A New State of Development?”, *Soviet Studies*, vol.36, No.3, 1984, pp.317-344.

③ Archie Brown, *The Gorbachev Factor*, pp.41-43.

④ Archie Brown(ed.), *New Thinking in Soviet Politics*, London: Macmillan, 1992, pp.15-25.另外也可参考 *The Gorbachev Factor*, pp.121-129.

⑤ Archie Brown(ed.), *New Thinking in Soviet Politics*, pp.31-32.

⑥ Archie Brown, *The Gorbachev Factor*, p.317.

更愿意寻找改革的外部原因，如将苏联改革的发生归因于里根政府政策的影响；或者强调改革的必然性，将苏联的改革视为对于苏联体系危机的自然反应。在布朗看来，这些观点并没有认真分析 80 年代中期苏联的实际情况，错误理解了苏联改革和最终转型的过程。“1985 年时的苏联，确实经济增长缓慢，而且有相对衰落趋势，但并没有达到危机的程度，……更谈不上处于生死关头。”^①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苏联政治局内部，有的人没有意识到衰落的问题，有的人意识到了却不愿意面对这些问题，更不要说提发动全面改革了。^②因此，布朗决定从内因角度入手探寻苏联的变革，旗帜鲜明地指出苏联的改革并不是必然发生的，外部力量对于封闭的苏联体系的影响也是相当有限的，苏联改革的关键力量在体系内部。

在布朗看来，80 年代中期开始的苏联改革，实际上最核心的因素是作为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只有抓住戈尔巴乔夫因素，才能够有效地解释苏联改革中最关键的三个问题，即改革是怎样开始的？苏联改革的内容为何如此激进？苏联转型和冷战结束为何会以和平的方式实现？^③布朗进而提出，观察苏联改革必须把握的两个视角：一是戈尔巴乔夫思想的演变；二是苏联党内和国家政治体系内部权力对比的变化。

在《戈尔巴乔夫因素》一书中，布朗用大量篇幅描述了戈尔巴乔夫思想观念的发展和变化。在长期的政治活动中，戈尔巴乔夫展现出突出的能力，获得了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的赏识，在通向最高权力的过程中，他一直被认为是一个“能被保守派接受的务实的创新者”。^④因此，在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去世后，他没有受到任何挑战，苏联上下都希望他“作为一个现代领袖，给苏联体系带来新的活力，而不是激进的变革。”^⑤布朗认为，有充分证据表明，尽管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其思想中包含着一定的自由主义倾向。在最初当选总书记的时候，他对苏联社会主义中所存在的缺陷表现出相当的不满，试图改革体系中所存在的缺陷。此时，他对于改革的前景是相当乐观的，但对于改革的具体内容并不特别清楚。^⑥在接下来的三四年间，他逐渐接受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并开始强调自由，渐渐地从“共产主义的改革者转化为一个西欧式民主社会主义者”。^⑦1987 年，戈尔巴乔夫开始支持“社会主义多元化”，认为“为达到这一目标，政治体系必须进行

① Archie Brown, *The Gorbachev Factor*, pp.90-91.

② Ibid, p.81.

③ Ibid, pp.212-251.

④ Ibid, p.45.

⑤ Ibid, p.61.

⑥ Archie Brown and Lilia Shevtsova (eds.), *Gorbachev, Yeltsin, and Putin.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Russia's Transition*.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1, pp.35-36.

⑦ Archie Brown, *The Gorbachev Factor*, p.119.

全面改革，所有改革都以多元化为指导思想。”^①此时，戈尔巴乔夫已经基本上认同了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多元化的观点。所以，苏联改革和转型的过程，可以说就是戈尔巴乔夫思想逐渐转变的过程。实际上，即使在苏联分裂的关键时刻，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拒绝使用武力，力求避免牺牲更多的生命。布朗强调，正是戈氏的这种选择实现了苏联的和平转型，最终保证了冷战的和平结束。

如何能够将戈尔巴乔夫的思想演变落实到苏联的政策上，布朗倾向于认为苏联政治体系内部的权力对比结构发挥了关键作用。他指出，与西方制度不同，苏联领导体制中总书记的权威相当大，但并非不受限制。只有处理好与党内其他高级官员的关系，才能保证拥有最高权力。^②因此，苏共总书记必须根据政治体系内部权力对比的情况，不断调整改革的节奏。正如戈尔巴乔夫自己所说：“这个位子并不舒服，我得同时扮演教皇和马丁·路德的角色。”^③在最初几年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谨小慎微。直到1988-1989年，随着他权力的不断增加，他的改革步伐日益加快。正是在这一时期，苏联改革从自由化走向了民主化，从内部改革走向了体系转型。1989年之后，随着政治体系的根本性变化，这位苏联领导人越来越多地同时受到左右两派力量的攻击。党内的保守势力和党外的激进改革势力都对他的改革不满意。根据布朗的解释，在1990年冬天到1991年，戈尔巴乔夫也进行了一些策略性的妥协，与保守派和解。然而，他最终做出了战略性的选择与改革派一起推动了苏联体系转型。^④这一战略同盟在苏联政治体系中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使得改革不可逆转。

在布朗眼中，1985-1991年苏联改革的过程实际上是戈尔巴乔夫个人思想演变和政治权力地位变化交互作用的结果。戈尔巴乔夫自身思想的变化促成了改革的出现。在这一过程中，其权力日益巩固，这又反过来推动着戈氏本人思想继续朝向民主化、自由化、多元化的方向演变，使得改革进程不断深入，随后直接影响苏联政治体系内权力对比，改革的进程因而不断加快，内容也不断走向激进。苏联体系的和平转型，冷战的和平结束，都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在政治和外交领域的反映，是他主动选择了和平。戈尔巴乔夫是结束冷战的关键因素。

最终，戈尔巴乔夫失去了权力，苏联改革也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终结。但在布朗看来，这并不能够削弱戈尔巴乔夫的历史地位。的确，在改革的过程中，他低估了“民族情绪中所蕴含的潜在威胁”，而且在策略选择方面存在失误。^⑤但在苏联解

① Ibid.p.127.

② Archie Brown, “The Power of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PSU”, in Archie Brown, T. H. Rigby and Peter Reddaway(eds.), *Authority, power and policy in the USSR: Essays Dedicated to Leonard Schapiro*. London: Macmillan, 1980, pp135-157.

③ Archie Brown, *The Gorbachev Factor*, p.93.

④ Ibid, pp.160-211.

⑤ Archie Brown, *The Gorbachev Factor*, p.307.

体问题上，其他一些政治精英，尤其是叶利钦（Boris Yeltsin），扮演了更值得批评的角色。布朗强调，苏联本可以通过形成一个“规模更小的、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联盟”的方式得以继续存在，其解体并非不可避免，而且这也是戈尔巴乔夫 1990 年以后努力的目标。苏联解体并不是民主的必然结果，由于一些偶发事件的出现，才导致了悲剧性的结局。^①

布朗一再强调，尽管遭到来自各方的误解甚至中伤，但这都不能改变对戈尔巴乔夫的历史评价。这是一位“变革型领袖”。^②布朗告诫说，如果以更为宏观的历史视角来看待苏联转型，我们就会发现，戈尔巴乔夫所面对的是一个几乎无解的难题：他必须同时处理经济、政治、联盟和外交四个方面的转型，推动整个苏联体系的变革。布朗认为，戈尔巴乔夫至少在其中的政治和外交方面取得了成功，并将此总结为以下十个方面^③：

- 引入公开性（Glasnost'）政策，促进了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
- 释放反对派，平反冤假错案；
- 实现宗教信仰自由，停止对教会的迫害；
- 实现跨国旅行与国际交往自由；
- 引入竞争性选举；
- 促进了市民社会的发展；
- 依法治国，结束以党领政的局面；
- 承认政治多元主义，放开思想管制；
- 允许东欧国家自行选择发展道路，允许德国统一；
- 从阿富汗撤军，并且在结束冷战的问题上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布朗始终以积极和正面的观点评价戈尔巴乔夫，他最终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是“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者之一，是二十世纪后半叶对世界历史产生了最为深刻影响的伟人”^④。

① Archie Brown, “The Soviet Union: Reform of the System or Systemic Transformation?”, *Slavic Review*, Vol.63, No.3, Fall, 2004, p.500.

② Archie Brown and Lilia Shevtsova (eds.), *Gorbachev, Yeltsin, and Putin.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Russia's Transition*, pp.6-7.

③ Archie Brown, *Seven Year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Perestroika in Perspective*,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329. 布朗在 2010 年 7 月于斯德哥尔摩召开的国际中东欧研究会（ICCEES）第八次会议上重申了这一观点。

④ Archie Brown, *The Gorbachev Factor*, p.317.

三、“第四波”：苏联东欧转型的地位

长期以来，西方理论界一直将苏联东欧转型作为 70 年代开始的世界范围内“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一部分加以分析。这种分析思路主要强调西方世界对于东欧和苏联的影响，且往往忽视了东欧国家间以及苏联与东欧国家间转型过程的相互影响。

^①在布朗看来，这种观点没有把握苏联东欧转型的特点和原因，对于苏联东欧转型的历史地位的评价需要重新审视。他认为，苏联和东欧的转型（包括后来的南非）并不是“第三波”的延续，而是构成了民主化的“第四波”浪潮。^②

“第四波”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怀特黑德（Laurence Whitehead）提出的^③，布朗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阐述。布朗指出，“第三波”民主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是非社会主义制度的威权主义国家，两种体制的性质和特点存在巨大差异。威权主义国家只需集中精力进行政治改革，而社会主义国家则要同时推进经济和政治两项改革。“第三波”民主化过程中，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很明显的内在关联。因为语言和文化的联系，南欧（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的变化，对拉丁美洲的民主转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对于东欧来说，这种文化影响力并不明显。此外，“第三波”民主化运动的主要外部力量来自美国，特别是卡特政府时期对于民主运动的广泛支持。而这一点对于苏联及其势力范围几无影响。因此，布朗认为，东欧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运动是一个独立的过程，存在着相似的刺激因素，共享相同的外部条件。^④

在《改变世界的七年》中，布朗提出了第四波民主化的四个主要特征：第一，威权主义体制的转型并没有引发社会主义国家精英集团的更替；第二，转型国家需要同时面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转型的双重压力，需要在不同的基础上全面重建国家秩序，难度和复杂性远远超过第三波转型国家；第三，东欧国家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拥有同样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社会基础，而且大多数都是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因此他们的转型过程不可避免地受到邻国的影响，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学习的过程；第四，也是最重要的特征，在第四波转型过程中，苏联因素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作为这一地区的霸权国家，正是苏联内部的变化促使东欧国家转型。^⑤

在怀特黑德看来，是苏联权力的瓦解导致了东欧地区转型的发生。布朗对此表

^① Archie Brown, “Transnational Influence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m”, p.181.

^② Archie Brown, *Seven Year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Perestroika in Perspective*, p.218.

^③ Laurence Whitehead(ed.), *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Democratization: Europe and the Americas*,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④ Archie Brown, *Seven Year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Perestroika in Perspective*, p.217.

^⑤ Archie Brown, *Seven Year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Perestroika in Perspective*, pp.220-221.

示反对，他认为这一时期的苏联权力并没有明显衰落，苏联仍有足够的力量否定东欧可能发生的任何变动。但是苏联内部的两种变革直接导致了东欧转型的发生。首先，苏联政治体系内部的自由化和多元化改革产生了影响。其次，苏联对外政策的根本性变革成为决定性的力量。8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的对外政策出现了重大调整，到1989年时，苏联已公开宣布，不再会对东欧地区的政治变革进行军事干涉。怀特黑德所说的“苏联权力的瓦解”实际上是这一改革的结果而不是造成变革发生的原因。^①

也许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的原因复杂多样，但在1988-1990年之间，苏联改革成了推动东欧转型的最重要原因。从60、70年代开始，东欧国家中存在着探寻体制改革的思想和力量，在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曾产生过不同的影响，但由于苏联的制约，在国家和社会层面的传播受到很多限制。一旦苏联受到自由主义和民主思想的影响，反馈于东欧国家，就将呈现出无比巨大的反应。布朗认为，东欧曾经出现的自由主义思想运动对于苏联改革产生了潜在的影响，而苏联自身的改革又对于东欧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最终形成了第四波民主化浪潮。

长期以来，西方转型理论认为极权主义政权不可能发生内部的改革，但苏联改革的出现宣告了这种观点的失败。^②苏联和东欧转型的出现，使得研究者必须重新审视传统的转型理论，重新认识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复杂现象。苏联和东欧转型对于世界历史的发展和转型研究领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其独特性质和独立地位也成为布朗理论观点中最具特色的一种观点。

四、混合体制：当代俄罗斯转型过程的评价

转型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改革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宣告结束，但俄罗斯的转型过程并未终结。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俄罗斯社会经历了艰难、复杂的发展。如何评价当代俄罗斯转型的道路，成为布朗学术研究另一重要组成部分。

苏联解体后，布朗在俄罗斯转型发展问题上投入了很多精力。在他看来，“苏联体系转型与俄罗斯民主的建立仍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③，而西方学者对于冷战

① Ibid, p.221.

② Ibid, p.223.

③ Archie Brown and Lilia Shevtsova (eds.), *Gorbachev, Yeltsin, and Putin.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Russia's Transition*, p.35.

后俄罗斯转型过程的研究存在着两个严重缺陷：其一，是对于经济决定论的盲目信仰，这种错误主要集中于对叶利钦时代的研究。对于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徒来说，他们对于叶利钦的改革推崇备至，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将导致民主的自然实现”^①。因此，他们将目光集中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建立，不顾一切地推行市场化政策，而对于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视而不见。其二，是对于文化决定论的推崇，这种错误则出现在对普京时期的研究中。这种观点强调俄罗斯的威权主义传统根植于俄罗斯传统文化之中，与民主思想南辕北辙，从而否定俄罗斯民主发展的意义。^②

布朗认为，这两种观点显然都是错误的。有大量证据表明，历史上很多威权主义国家都奉行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转型并不必然带来民主，盲目追求市场化对于民主制度的建设甚至会有负面影响。^③另一方面，布朗坚决反对文化决定论。作为政治文化研究的元老，布朗指出，政治文化的内容是灵活多样，而非一成不变的。所有的认知、价值观、信念的形成都是非常复杂的，而且与政治制度相互作用。苏联改革过程中，新思维的出现就是政治文化与政治体制互动的结果。^④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赖于政治体系的发展变化。是政治体系创造了特定的政治文化，而不是政治文化决定政治体系。类似这种机械的决定论式研究方法只能得出误导性的结论。对于俄罗斯转型的研究仍然应该按照严格的标准，建立系统的分析框架，排除特定时期社会思潮的干扰，认真研究俄罗斯转型的现实过程，才能得出有说服力的观点。

通过借鉴达尔（Robert Dahl）对于民主的评价框架，加上自己的原则，布朗提出了分析和评价俄罗斯民主建设的6条标准^⑤：

- 1、结社自由；
- 2、表达和获取信息的自由；
- 3、自由和公正的投票权；
- 4、竞争获得公职的权利；
- 5、政治问责制；
- 6、依法治国。

布朗根据自己独特的分析框架，对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转型过程进行了深入分

① Archie Brown, “The Russian Crisis: Beginning of the End or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Post-Soviet Affair*, Vol.15, No.1, January-March, 1999, p.61.

② Archie Brown, “Conclusion”, in Stephen Whitefield(ed.),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st-communism*, London: Macmillan, 2005, p.198.

③ Archie Brown(ed.), *Contemporary Russian Politics: A Reader*,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565.

④ Archie Brown, “Conclusion”, pp.192-193.

⑤ Archie Brown(ed.), *Contemporary Russian Politics: A Reader*, p.546.

析。叶利钦同戈尔巴乔夫一样，也可以被认为是一位“变革型领袖”^①。但布朗从来没有像其他一些西方学者那样，对叶利钦寄予太多的期望。他认为叶利钦更多的兴趣集中于通过激进的经济政策，建立市场经济体系，而并没有将推进民主作为自己的行动目标。所以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1993年的10月危机是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事件。叶利钦处理危机的方式“对于俄罗斯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建设都是巨大的伤害。”^②在叶利钦治下，俄罗斯成了一个虚弱而又臃肿的国家，形成了所谓的“伪市场”经济——腐败盛行，权力寻租，小团体利益层出不穷。政客、金融家、工业资本家和媒体巨头勾结在一起，形成了所谓寡头经济模式，布朗将其称为“钻石四边形”（diamond quadrangles）。在叶利钦时期，政治领袖和商业寡头形成了共生关系，从而形成了混合政治体制。布朗将这一时期描述为“独裁政治、强盗政治和民主的混合体。”^③

叶利钦留给继任者的是一个“摇摇欲坠、有严重缺陷的多元体制，而非一个民主国家”^④，因此，布朗很高兴地看到，普京试图通过具有明显灵活性和包容性的政策来保持体系的稳定，并且结束国家的混乱状态，这为普京赢得了很高的支持率。随后普京采取了一系列方式加强中央权威。一方面，他采用“选择性执法”的方式，有目的地打击特定的寡头和潜在的政治对手，这与法治原则背道而驰。另一方面，他重新调整国家行政结构，在89个联邦主体之上建立七个大的行政区，进一步强调中央对地方的控制。^⑤布朗认为，增强国家的控制力、提高国家实力，是普京的首要目标，这一目标远远凌驾于建立民主国家这一目标之上。就其本质而言，普京仍属于民主领袖，他仍是通过民众的支持领导这个国家。普京时代的俄罗斯政治体制，可以说是一个“民主主义和威权主义的混合体”，可能略向威权主义倾斜。^⑥

即使这样，布朗也不得不承认，“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大国……民主并不是判断后苏联时期政治发展状况的唯一标准。维持政治稳定、重建经济秩序和稳定的法律秩序也都非常重要。……这些状况与民主并不冲突，相反，可能会成为民主发展的必要条件。”^⑦因此，俄罗斯转型的前景仍不确定，俄罗斯的稳定和民主进步仍有赖于俄国公民和俄罗斯领袖的共同努力，其中领袖的作用尤为关键。

① Archie Brown and Lilia Shevtsova (eds.), *Gorbachev, Yeltsin, and Putin.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Russia's Transition*, pp.6-7.

② Archie Brown,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Post-Communist Russia”, in Amin Saikal and William Maley(eds.), *Russia in Search of its Fu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39.

③ Archie Brown(ed.), *Contemporary Russian Politics: A Reader*, p.564.

④ Archie Brown, “Ten Years After the Soviet Breakup: From Democratization to Guided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2, No.4, October 2001, p.37.

⑤ Archie Brown(ed.), *Contemporary Russian Politics: A Reader*, p.566.

⑥ Ibid, p.568.

⑦ Archie Brown(ed.), *Contemporary Russian Politics: A Reader*, p.567.

五、结论与评价

作为当代英国俄罗斯研究的代表人物，在 40 多年的研究生涯中，阿奇·布朗对于苏联和俄罗斯的观察几乎涉及到俄罗斯历史和现实政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围绕着苏联和俄罗斯转型这一核心问题，勾勒出俄罗斯发展的清晰轨迹。丰硕的研究成果为他和圣安东尼学院赢得了崇高的声望。

受到早年学术兴趣的影响^①，布朗对于苏联和俄罗斯的研究始终坚持着领袖和政治体系内的权力分配这两条主线来进行。他坚持认为，领袖个人及其掌握权力的状况，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具有独裁传统的国家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因此，在苏联和俄罗斯转型研究中，他始终坚持对苏联和俄罗斯改革的内生性判断，推崇对于体制内领袖和权力分配的精细研究，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

多年来，布朗的研究一直坚守英国学者的基本方法，通过认真、细致、高水平的经验资料总结，以开放的心态运用多种分析模型和研究思路，结合自己冷静、理性的判断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他总是谨慎地搜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且小心翼翼地进行分析。因此，他的作品不仅仅能够提出卓有见地的观点，也能够被看作是严肃、重要的历史作品，成为后来者研究苏联改革和转型历史的重要依据。可能由于受到曾经的记者身份影响，布朗对于研究对象的细微变化有着如直觉一般的敏感。能够从冗长的官方文件和深奥难懂的专家观点中找到宏大变革的点滴证据，最终形成自己预言式的准确判断和评估。

在分析问题时代，他反对墨守成规的教条主义方法，通过一种开放的视角和公正的立场分析苏联和俄罗斯的问题。这样既使他避免了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因素的干扰，又使他不至于在冷战后摇摆不定的对俄舆论变化中随波逐流。他始终坚持中立的立场和开放的视野，不受争议和批评的干扰。他反对一切过于简单的理论观点，反对任何试图用一个因素解释俄罗斯变化的机械主义的理念。布朗并不是一味坚持传统研究路径，反对研究方法的创新。只是在他看来，应该用“有区别的折衷主义”^②的原则，小心选择分析工具，以便公正、准确地分析复杂的问题。他也广泛而严格地使用社会科学领域的概念，但这些概念不能够凌驾于经验分析之上。

① 早在学生时代，布朗的研究就集中于英国首相的权力以及英国政治体系两个方面，这种研究思路在布朗的整个学术生涯中一直有很重要的影响。在他的研究兴趣转向俄罗斯与东欧以后，他仍然倾向于通过领袖和体制的视角对苏联政治加以解释。

② Archie Brown, "Political Power and the Soviet State: Western and Soviet Perspectives", in Neil Harding(ed.), *The State in Socialist Society*, London: Macmillan, 1984, p.53.

当然，尽管布朗在研究过程中批驳并纠正了西方学术界在俄罗斯研究中的多种误区，但从根源来看，布朗的研究仍然打下了明显的“正统”烙印。他对于苏联和东欧转型过程的解释，主要将视角集中于戈尔巴乔夫及其核心圈子的行为上，基本遵循了理性选择理论的分析方法，得出了经典的“精英集团决定转型方向和内容”的结论。他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分析理解也不无偏颇之处。^①对于戈尔巴乔夫本人则给予了过多溢美之辞，“将重点过多地放在戈尔巴乔夫成功而不是失败的方面……将一切好的观念都说成是戈尔巴乔夫的，而将一切失误的决策都归咎于戈尔巴乔夫身边能力不足或心怀怨恨的干部们”^②。这种显失偏颇的做法也招来了广泛的批评。

尽管如此，作为英国学术界的杰出代表，布朗的研究无论在内容上还是方法上都是当代英国俄罗斯研究中主流观点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了解布朗对俄罗斯的观点和看法，对于理解英国俄罗斯研究的状况，把握英俄关系的发展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Abstract】 Archie Brown is a leading expert on the Russian and Eurasian studies in UK. He insists on the traditional history approach, and has formed unique and systemic views on the Soviet Union and Russia's transition. He thinks that the perestroika of Soviet Union originated on the debates of experts within the system. Gorbachev played the most important role in the perestroika, and the ending of the cold war. The changes in Russia and East Europe constitute the Fourth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And modern Russian political institution belongs to a hybrid political system for a long time. His thoughts and theories are important parts of modern western mainstream views, and have a great impact on the academic research and diplomatic practices in UK.

【Key Words】 Archie Brown, perestroika, Mikhail Gorbachev, the Fourth Wave

【Аннотация】 Арчи Браун — важная фигура в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х России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в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Он, используя традиционный метод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создал полный и уникальный подход к пониманию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й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и России. Он полагает, что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произошла из-за инновационных идей, возникших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① 参见 Archie Brown, *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sm*, London: The Bodley Head Ltd, 2009.

^② Kathryn Stoner-Weiss, “Book reviews of *The Gorbachev Facto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13, No.1, Spring 1998, pp.150-151.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батов экспертов; самую важную роль сыграли М.Горбачёв в период перестройки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и окончание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следует рассматривать как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е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я «четвертой волны»;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 России в течение ещё длительного периода будет являться смешанной системой. Его теория и идеи являются важной составной частью основных западных точек зрения и оказывают больш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науч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ую практику.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Арчи Браун,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Михаил Горбачёв, «четвёртая волна»

(责任编辑 阎德学)

经济

从“转型性贫困者”的形成看俄罗斯转型期的制度及个体适应性问题*

庄晓惠**

【内容提要】俄罗斯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群体——“转型性贫困者”，相对于转型前的贫困者可简称其“新贫”。这一群体不但成份特殊而且人数众多。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原苏联时期属于中产阶级核心群体的知识分子、国家公职人员和骨干技术工人。“新贫”的出现，使俄罗斯贫困人口的数量在改革初期一度达到了总人口的一半以上。从“新贫”的社会职业以及生活特征来看，他们属于相对贫困或者说是边缘贫困。这一群体的产生反映了俄罗斯转型期制度体系中的深层问题，其中分配制度不公平、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保障措施缺失等一系列结构性因素是导致这一群体出现的主要原因。同时这一群体本身也存在着没有很好地适应新形势等一些属于个体方面的致贫因素。

【关键词】“转型性贫困者” 俄罗斯转型 制度 公平 收入差距 个体适应性

【中图分类号】C912.2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1)03-0100-(19)

俄罗斯的急剧转型使俄罗斯社会出现了诸多问题，“转型性贫困者”（相对于转型前的贫困者，以下简称“新贫”）群体的出现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问题。“新贫”是俄罗斯社会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新的特殊群体，这一群体一方面具有贫困阶层的特征，另一方面又不能把它完全归为传统的贫困者阶层（即“旧贫”）。“新贫”

* 本文系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资助项目“从政策选择看我国阶级阶层的演进趋势”（项目编号：TJSR10-237）的阶段性成果。

** 庄晓惠，天津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南开大学社会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中外公共管理比较研究所所长。

群体主要是指那些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改革的影响而变得贫困的人。所以，更确切地说，俄罗斯的“新贫”应当被称为“社会转型性”的贫困者。在社会改革进程中的俄罗斯，新贫困者群体涉及的人数之多、范围之广，令人瞩目。

一、俄罗斯“新贫”群体的构成

“新贫”是俄罗斯改革后新出现的具有贫困特征的群体，是指除去延续性或传统型的贫困之外的、主要受改革影响而变得贫困的群体。这些贫困者主要是由不适当的改革政策造成的。俄罗斯改革期间出现的新贫困者中的绝大部分人，属于前苏联时期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国家公职人员、退休人员以及军工产业的工作人员和骨干技术工人占了“新贫”群体的一半以上。此外“新贫”还包括经济改革导致就业岗位减少而造成的结构性的失业人员，以及由于国家对青少年补贴大幅减少后生活水平下降了的16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失去国家保障的村镇居民和苏联解体后由其他独联体国家涌入俄罗斯的难民。“新贫”群体的特别之处在于，其中不仅包括失业人员，更多的是“贫困的就业者”，他们有住所，有工作，并且是国家正式在编的工作人员。从这些人的受教育程度、技能、社会地位、人口状况来看，他们无论如何都不应当属于社会底层人物。以前，俄罗斯的贫困人口与其他国家贫困人口的构成基本一致，大多都是传统型贫困群体和社会底层人物。改革后的贫困阶层却有很多人是国家正式的工作人员，而且曾经属于苏联时期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中的59%都沦为了“新贫”。^①1996年俄罗斯学者在埃里斯塔市进行的调查验证了这一事实。调查中，研究人员把“教育程度”指标纳入到了界定“新贫”的综合指标中。这样，在“新贫”群体中就出现了一个主要由具有高学历的专业人员组成的特殊群体。这个群体的成员在社会威望方面属于社会中间阶层，在收入方面却属于社会下层，属于穷人。结果显示，沦为贫困的知识分子占有所有被调查对象的34%左右。大量知识分子的贫困化，导致俄罗斯贫困阶层人口总体数量的增长。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工薪阶层，其中包括教师、医生、学者等，他们本应当是社会中间阶层的核心，是社会发展的“稳定器”。

一些骨干工人由于结构性的失业而致贫，他们与那些贫困的知识分子一样，经济状况都出现了恶化的情形。他们的微薄收入不仅满足不了生活中新出现的需求，而且就连满足那些最基本的、维持生存的、大众性需求的水平也明显降低。所有这些因为改革而变得贫困的人，在饮食、服装、对父母的资助、用于休息的资金等各

^① Галкин А.А., Ионин Л. Г. Социальное расслоение и социальная мобильность. Наука, 1999. С.29, 44.

方面都表现出了明显恶化的趋势。这些“新贫”阶层的同质性很高——拥有高学历，是活跃的守法的公民。从一些研究资料来看，俄罗斯“新贫”问题直到2000年还没有明显的改观。（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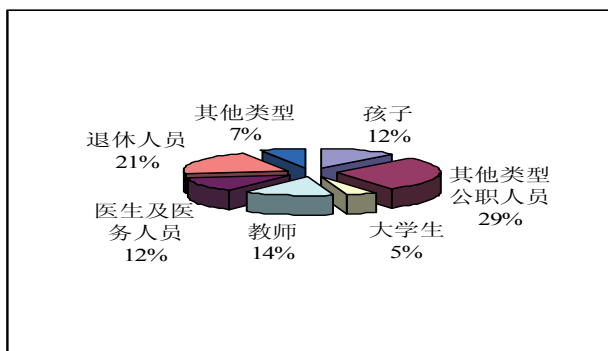


图1：2000年俄罗斯贫困阶层构成图

资料来源：Джудит Л., Кэйт Ш. Социальный капитал и социальное расслоение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Альпина Паблишер, 2003. С.365.

“新贫”群体由于涉及的人数众多、成员构成特殊而对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直都是俄罗斯及西方学者关注的对象。2004年西方研究者针对这一问题在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进行了一次追踪调查。2004年12月，圣彼得堡市政府对国家预算领域内的公职人员进行了补贴，平均每人提高41%（600卢布）。副市长马特维延科·瓦莲金娜与西方学者一道，对圣彼得堡第一年实施的补贴结果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很多圣彼得堡人（16-20%）说，居民工资明显增长了，居民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圣彼得堡市的社会状况因此变得比原来稳定了。但是，不久后的跟踪调查却让他们意外地发现，尽管公职人员都得到了补贴，但其中的许多人还是处于贫困之中，而且还占了贫困人口的大部分。^①这样的事实不得不使研究人员承认，最贫困的圣彼得堡人仍然是联邦预算组织中的公职人员。

事实证明，俄罗斯转型使很多国家公职人员、知识分子以及骨干工人这些原本生活富裕的群体也不可避免地沦为贫困群体。这一群体的出现透视出俄罗斯改革进程中的诸多弊病，这些弊病严重影响了俄罗斯整个社会结构的良性运行。直到普京执政后的2005年，这一问题才开始得到了有效的解决，“新贫”群体的工资也提高到了改革以来的最高水平。由于措施得当，虽然“新贫”群体的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但贫困人口数量明显减少。从2006年开始，俄罗斯的总体贫困状况大大改观。俄罗斯联邦经济发展部部长格列夫在2006年3月2日召开的政府会议上说，2005年俄罗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2004年减少了300万，共2200万人。社会健康

^① Савик Браурман. Бедный всадник//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004.18 октября.

发展部的工作人员塔吉亚娜·戈里科娃说：“最近两年（2006-2008年）……低于最低生活标准的居民几乎减少了600万，或者说减少了23%。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再过6-8年，（俄罗斯的）贫困人口将不复存在，‘贫困’一词也将与时代格格不入。”^①但这一群体的状况仍不尽如人意，因为社会结构一旦遭受灾难性的破坏，其深层创伤在短期内是难以弥合的。

二、俄罗斯“新贫”阶层的特征

俄罗斯“新贫”群体与官方所说的普通贫困者的特征不完全相同，他们并不属于缺乏资源型的贫困者。俄罗斯学者达维多娃利用一些研究指标，把贫困分为四个等级，以此确认“新贫”群体的贫困程度。这四个等级为：赤贫、贫穷、低保障、中等保障。其中赤贫是最高程度的贫困，这一群体缺乏正常的饮食（吃不上新鲜的肉食，鱼类），需要节约卫生用品，孩子不能根据年龄的增长更新衣服，买不起水果、果汁，没有诸如电视和冰箱之类的耐用品。贫穷的具体特征是不能持续拥有高质量的饮食（美食、巧克力、孩子的糖果、成年人的新鲜蔬菜和水果都是有限的），衣服鞋帽不完备（家里的大人不得不穿旧的），维持正常生活有困难，只拥有普通的日常家具，有时候一些宗教活动受限制（如丧葬、葬后宴请），一些维持生命的药品和医疗器械以及亲朋礼尚往来的资源都受限制。低保障群体的特征是，在购买特别讲究的食品、给亲人的礼物、报纸、杂志、书籍等方面的资金不充足，大人孩子的休闲质量降低，不能探访远方的亲人，应付不了付费服务，首先是医疗服务。中等保障的群体接近于中等生活水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生活方面属于普通俄罗斯人的范畴，他们的生活条件存在着进一步改善的需求，他们的生活状况是不稳定的，不能经常保证正常的社会生活标准，不得不缩减用于购买贵重耐用品、付费教育、公休服务、家庭休息和消遣的资金。^②为了进一步确认“新贫”的特征，相关研究还引入了39种能显示贫困特征的、与衣食住行相关的物品。这些特征既反映了贫困的本质，又反映了不同贫困群体的共性与个性，这些特征主要与各种生活标准和社会文化标准相关。（见附表）

通过对这两个资料的分析表明，有一些指标（营养、饮食质量、购置服装的费用等）低下，是公认的贫困特征，有这些特征的家庭就意味着贫困状况很严重，至少处于贫困的边缘地带，这不属于“新贫”的范畴。那些不断地失去属于中等生活水平标志的人，才是行将沦为“新贫”的人。需要指出的是，一些标志生活质量的

^① ВЦИОМ. 06.05.2008. <http://wciom.ru>

^② Давыдова Н. М. Депривационный подход в оценках бедности. Социс. 2003. №6.

消费支出（比如用于消遣、家庭外出休息的支出）等指标，看上去“赤贫”群体的比率比“贫困”群体的比率低，但这并不意味着“赤贫”群体就比“贫困”群体生活状况要好，而是他们对这些方面的要求降低了。“赤贫”群体在基本生活支出方面的困难的比率都要高于“贫困”群体。分析表明，“新贫”群体的贫困应当属于“赤贫”和“贫困”以外的其他两种程度的贫困，“新贫”在“赤贫”和“贫困”两个群体当中基本不存在。从综合性因素来看，“新贫”应该属于相对贫困的群体，他们原有的社会地位的保留，决定了他们与“旧贫”是有本质区别的。“新贫”群体还有一个区别于“旧贫”的重要特征是，他们几乎都有私有住宅和个人住房。这种对生存最有意义的资源，影响和决定着“新贫”的社会地位和生存质量与“旧贫”有本质的不同。资料表明，“新贫”中只有 3.29%没有住宅，7.69%还住在集体宿舍中，8.79%的人合住一套住宅，43.95%的人住在原来属于国有（现在归属个人）的住宅里，36.29%的人有私产或属于个人的住宅。^①从发展轨迹看，这一群体继续向贫困纵深发展的趋势并不明显，由于政策的不断调整和“新贫”职业地位的保留，他们被边缘化和被社会排斥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从主观认知来看，“新贫”群体的多数人认为自己属于边缘性贫困，因为他们认为，与真正的贫困群体相比，他们还没有完全陷入贫困状态。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与生活水平的不一致导致了严重的心理失衡，使其经常感觉自己处于缺少许多东西而不能满足理想的生存状态，不能过正常的生活。所以，这些人的精神面貌很不好，经常患得患失，一方面担忧国家经济不稳定会使生存状态更加恶化，另一方面又担心自身的劳动能力无法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这种窘迫感一直伴随着“新贫”，让他们变得紧张而焦虑，严重影响了他们奋斗的毅力和希望。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把“新贫”的特征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新贫”群体的生存状况还没有下降到赤贫或普通意义上的贫困程度，他们的生活水平基本上处于低保障或中等保障水平，与俄罗斯普通人的生活状态没有实质性的偏离，属于相对贫困或边缘贫困。正如俄罗斯学者彼得洛娃（Л. Е. Петрова）认为的那样，由于“新贫”是在保留了职业地位（他们不但有知识，而且还保留着某一领域或机关的工作岗位）的条件下经历了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这就意味着他们属于相对贫困；^②第二，“新贫”群体存在着向下流动的趋势，他们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之间的矛盾不断增长；第三，由于收入的大幅缩减，“新贫”不得不放弃一些属于普通生活标准

① Барсукова С. В. Самоидентификация «новых бедных» семей в процессе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й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2005. С.129.

② Петрова Л. Е. «Новые бедные» ученые: жизненные стратегии в условиях кризис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социология. Электронный журнал. Том. 2. 2001. №1. С.26.

的物品和行为方式，所以说，他们还是失去了一些标志其地位的本质性的东西。更令人担忧的是，他们之中有的人对贫困状态有了适应性从而失去了重建较高质量生活的希望。

三、制度因素：权力主导下的分配制度对俄罗斯“新贫”的影响

综合研究俄罗斯的“新贫”阶层，可以发现，导致这一群体形成的原因，主要是两大因素——结构性因素和个体性因素，其中结构性因素产生于制度化体系当中，是导致“新贫”群体产生的主要因素，也是首要因素。所谓结构性因素，是指构成社会结构诸要素中衍生出的一些影响因素，这些因素与“新贫”群体自身的能力没有明显的直接的关系。结构性因素通过财产分配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具体方式影响着“新贫”群体的产生。

财产与收入分配虽然是一种经济活动，但其实质却表现为组织之间以及个人之间的权力关系。换言之，分配制度在缺乏有效监管和控制的条件下，总是朝向权力一方倾斜的。收入分配制度的产生是利益主体凭借权力在分割占有过程中强制支配的结果，是权力依照自身意愿构建了资源分配方式，这也是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力的实质特征。正如穆勒所说，“……财富的分配这是一件只和人类制度有关的事情……决定这种分配的规则是依照社会统治阶级的意见和感情而形成的。这在不同的年代和国家内是很不相同的。并且，如果人们愿意，差别还可以更大一些。”^①从实践经验来看，这种权力资本化的结果不可避免地会给国家和社会埋下冲突的隐患。财产收入分配制度是考量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分配格局的标尺。萨缪尔森认为，政府在经济分配上的职能是保证效率、平等、稳定。虽然这里的“稳定”是指经济的稳定，也就是减少经济危机的风险，但是，如果分配制度按此规则运行，最终结果必然是社会的稳定。这一理论提示我们，在收入分配制度的作用下产生的收入差距如果过于悬殊，即使是市场因素导致的，也需要国家权力进行干预。但如果是国家权力为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目的而人为导致的收入差距悬殊，则应该有制衡机制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俄罗斯在急剧转型之初，由于新旧体制的断裂，许多方面都处于制度真空状态。此时，权力结构变动决定着国家制度结构的变动，财产和收入分配制度完全取决于权力结构。那些掌握权力的群体借私有化之机大肆攫取国有资产，分配到民众手中的所谓“有价证券”如同废纸。俄罗斯历史上从此产生了一个庞大的因转型而导致的“新贫”群体，同时也造就了一个迅速暴

^① 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

富的“新贵”群体，其结果是贫富差距迅速拉大，至今难以解决，给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埋下了隐患。多种研究资料证实，俄罗斯总收入的大约一半都集中在 1/5 的人手中，不到 1% 的收入最高的群体，其收入超过平均收入的 9 倍。以 10% 为单位计算的收入差距从 1990 年的 5 倍扩大到当前的 14-15 倍。^①俄罗斯科学院的研究资料表明，在调查过程中许多富人故意低报了自己的收入，其实这一差距实际上还要大些，可能有 20 倍。

俄罗斯的贫富差距使阶层结构极度扭曲，这一直都是制约俄罗斯社会结构良性运行和发展的桎梏。那些原本属于中产阶级核心的“新贫”群体的产生，使俄罗斯中产阶级的质量和数量都大打折扣。而“旧中产”的比例曾经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的相应比例。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在谈到社会分层和阶级的时候指出，阶级关系是一种建立在具有市场能力(market skills)和准技术关系^②之上的社会结构，市场条件下形成的劳动契约关系是阶级产生的前提。阶级的这一属性构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政治分离”的特征。^③俄罗斯社会转型后形成的阶级或阶层结构的特征与吉登斯所说的“政治与经济相分离”的特征相反，其社会结构具有政治与经济紧密相连的特征，俄罗斯巨富阶层的财富与政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俄罗斯“应用政治研究所”在改革之初进行的一项民意测验中，所评选出的最富有的人都是与权力具有强关系的人物，比如波波夫（莫斯科前任市长，经济学家）、戈尔巴乔夫（前苏联总统）和赖莎（戈尔巴乔夫夫人）、基什科夫（莫斯科市长）、盖达尔（俄前总理，后为“俄罗斯选择党”主席）、哈斯布拉托夫（前议长）等。俄罗斯学者罗伊·麦德维杰夫的研究资料也表明，今天活跃在俄罗斯商界的大多数人是 1980 年代的党、政、经济官员以及与党、政、经济官员有着密切联系的人。据 2000 年第 32 期《论据与事实》（Аргументы и Факты）披露，俄罗斯的 10 个寡头都是经济和政治紧密结合的产物。种种迹象表明，俄罗斯转型初期的财产分配制度是权力资本化的结果。而“新贫”群体产生的最主要的、也是首要的原因，是权力主导下的分配制度对其进行绝对剥夺的结果。

俄罗斯转型期间的收入分配制度造成的两极分化迅速而悬殊，收入差距在短短 3 年内就扩大到了两位数以上。1991 年底，俄罗斯 10% 的最高收入者是 10% 的最低收入者收入的 4.5 倍，到 1992 年底扩大到 7.5-8 倍，1993 年底扩大到 11 倍，1995 年则扩大到了 13.5 倍。1996 年，11% 的居民月收入低于 21.9 万卢布，而 8% 的富人月

① Политика.2007. №19-20. С.162-163.

② 吉登斯认为，劳动分工既是指市场关系中的劳资双方，又是指生产性组织内部的具体劳动任务的分配。吉登斯把基于后一种分工意义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称为准技术关系。

③ Anthony Giddens, *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 An Analysis of the Writings of Marx, Durkheim and Max Web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38-39.

收入却超过了 190 万卢布。^①俄罗斯行业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分配制度不平等的具体体现，教育、卫生保健行业、文化和艺术等领域的收入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一直都处于很低的状态中，而金融、信贷等行业的收入则大幅提高。（请见表 1）

表 1：俄罗斯改革前后各个领域的平均收入情况 %

年份 领域	1985	1990	1995	1998	2000	2004	2005
工业	110	103	112	115	123	117	
农业	92	95	50	44	40	41	43
建筑	124	124	126	127	126	118	104
卫生医疗保健	71	67	74	69	62	70	69
教育	78	67	65	63	56	62	64
文化艺术	65	62	61	62	55	64	-
科学和科技服务	102	113	77	98	122	129	-
金融、信贷、保险	96	135	163	199	244	247	261
管理	90	120	107	129	120	118	125

资料来源：Российски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2005.С.190;Россия в цифрах.2006.С.110-112.

从以上资料我们可以看到，本来收入就不高的教育和文化艺术领域在改革之后收入更少，一直未能超过 1985 年的水平。卫生部门与其类似，是属于收入最少的部门，改革后除了 1995 年比改革前提高了 3%，直到 2005 年都没有达到改革前的水平。农业领域的收入就更少了，收入比例不但逐年减少，而且 1998 年以后还不到改革前的一半。而金融、信贷、保险业的收入却在大幅增长，到 2005 年这些领域的收入是教育领域的 4 倍还要多。

表 2：俄罗斯生活水平的变化与收入不公平（以 1991 年为参照）

	1991	1992	1995	1997	1998	2000	2003	2004	2005
居民平均实际货币支出 (%)	100	52.5	57.5	61.7	51.8	50.9	70.8	77.8	84.8
实际工资收入 (%)	100	67.3	44.7	49.8	43.2	40.7	62.9	69.6	76.6
平均退休金 (%)	100	51.9	51.5	56.9	54.1	42.0	62	65.4	72.6
低于最低生活标准的居民 (%)		33.5	24.8	20.8	23.4	29.0	20.3	17.8	17.6
基尼系数	0.26	0.289	0.387	0.39	0.394	0.395	0.402	0.407	0.404
十分位数分布比情况	4.5	8	13.5	13.6	13.8	13.9	14.5	15.0	14.7

资料来源：Российски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М: Госкомстат России, 1995.С.77;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М.2006. С.185; Россия в цифрах 2006. С. 103, 104,109.

不但如此，俄罗斯工薪阶层的工资水平以及退休金大多低于改革之前的 1991 年，而且基尼系数不断增大。这是公职人员和退休人员沦为“新贫”群体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从表 2 资料可以看到，改革后一直到 2005 年，虽然属于工薪阶层的“新贫”群体的工资在波动中上升，但他们的工资收入一直都没有达到改革前的水平，到 2005

① 济齐娜等：《俄罗斯文化史》，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译序”，1999 年。

年才达到改革前的 76.6%。改革之初的 1992 年居民平均实际货币支出几乎比改革前降低了 1 倍，这就是主要靠工资生存的群体为什么变得贫困的原因了。改革后退休人员的工资也大幅缩减，几乎比改革前缩减了一半，2000 年更低，才相当于改革前的 42%，这使多数退休人员也沦为了贫困群体。从基尼系数来看，随着改革后工资收入差距以惊人的速度逐年扩大，该系数在 2004 年更是达到了 0.407 的最高点。十分位数分布比的情况与基尼系数反映的情况一致，都说明了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在改革后逐年拉大的事实。

拖欠工资现象是“新贫”群体产生的又一个原因。转型后，由于经济的衰退，俄罗斯的很多用人单位都出现了严重拖欠工资的问题，虽然俄罗斯的失业率与其经济衰退程度相比要低得多，但是由于拖欠工资现象过于普遍而产生了许多“就业的贫困者”，他们也属于“新贫”之列。俄罗斯学者麦德维杰夫等撰写的《社会不公平与公共政策》一书指出，多数俄罗斯人认为，他们的亲人、朋友、熟人的贫困是由于改革造成的，改革是导致失业和贫困的原因，持这种观点的人占 36%。30%的人认为不付工资和拖欠工资导致了他们的物质状况不稳定。还有 37%的俄罗斯人认为，保障的减少和国家与社会拒绝对穷人实施保障也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①

俄罗斯的保障制度在转型期间的缩水和监管制度的缺失，加重了“新贫”群体的生存负担，也加大了边缘贫困群体滑向贫困群体的可能性。俄罗斯改革后，由于经济的大幅衰退，不得不对国家统揽一切的保障制度进行削减，这就使俄罗斯居民在医疗、教育、保健、交通等方面的支出都相应增加。在总体收入水平下降的情况下，这些支出对俄罗斯居民来说更加沉重，因而使许多人的生活徘徊于贫困的边缘。此时，为了减轻和消除这一状况，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保障政策，但是由于在实施过程中监管制度的漏洞，出现了权利和义务严重脱节的现象：那些本该享受保障的阶层却往往得不到应有的保障，相反，那些不该得到的人却得到了这些保障。其结果不但没有使真正贫困的群体得到救助，而且还导致了贫者更贫、富者更富。资料表明，处于贫困线以下的 64%的贫困家庭的孩子并没有得到儿童补贴，这项补贴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可能占其家庭收入的 20%-50%。然而补贴款的 60%却分给了富裕家庭的儿童，而这些补贴仅占这些家庭收入的 1%-3%。其他社会补贴的发放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比如失业救济金的 40%以上都发放给了富裕家庭，而最贫困的 10%的人只领到了救济金的 1%。^②

社会政治和经济的重构，或者说结构性因素导致了大量贫困人口的出现，是研

① Медведев В. И., Красин Ю. А., Горшков М.К. Проблема бедност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Социальное неравенство и публич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М.: Культур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 2007. С.120-127.

② 李绍光：《养老金制度与资本市场》，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8 年。

学者的普遍共识。私有化后国家和人民财产的流失，使政府不得不降低国有预算部门的工资，社会—经济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些“新贫”群体先前的优势，他们从昔日的佼佼者沦为了贫困者。随着经济地位的降低，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摇摇欲坠。

四、影响俄罗斯“新贫”阶层形成的个体性因素

许多俄罗斯研究者都认为，除结构性因素外，贫困人口本身存在的一些个体性因素对他们生活水平的下降也有重要影响。所谓个体性因素是指结构性因素之外的属于个体自身方面的一些因素，比如适应性、思想观念等因素。

在诸多个体性影响因素中，“新贫”群体本身存在的“适应性”问题是影响“新贫”群体形成的主要因素。俄罗斯改革后几乎所有的人都经历了负面影响的冲击，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成了“新贫”，这就反映出一些人在适应性方面存在的问题。适者生存的观点不但被生物学家达尔文提出来并验证，社会学家认为这一理论也同样适用于个人和整个社会的发展。社会学家帕森斯的功能主义进化论就论述了适应性与社会变迁的关系问题。在《社会：进化与比较的观点》和《现代社会系统》两部著作中，帕森斯从行动系统角度考察了整个人类的进化过程。帕森斯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这种进化类似于有机体的进化，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演进过程。对于一个社会来讲，社会的“适应能力”的增强能够促进社会的进化，而对于生活在社会群体中的个人（个体）来讲，只有具备对外界的变化作出有效反应的能力才会进步。因此，人类社会和组成社会的个体具备了相应的适应能力就会进化。从进化的路径来看，又反映了进化的方向是“适应性”的不断增强，即社会（及个体）克服环境阻力而达到各种目标的能力的增强。帕森斯把社会分层的凸现看作是社会生活中不断增加的适应能力演化的一个重要方面，“适应性”是人类和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从俄罗斯“新贫”群体的实际状况来看，有一部分人确实存在着因“适应性”缺陷而致贫的问题。

就拿在俄罗斯的改革中受冲击最严重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对待改革的态度常常表现为两种非常极端的方式——激进型和得过且过型。前者往往是与过去的的生活决裂，有的选择移居国外，有的则告别多年的职业生涯下海经商，任由商海沉浮；得过且过型则根本没有任何应对措施，在原来的名存实亡的职位上混日子，而没有选择适时转换思维，尽快在市场经济中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社会位置和社会角色。知识分子当中有许多人都奉行“精神至上”的思想原则，这种原则具体表现为在科学和行为方面的保守性上。他们认为，工资收入与工作性质和兴趣相比，工作性质

和兴趣更重要，也就是说，工资收入的多少不是他们选择工作的主要标准，而兴趣则重要得多。调查表明，持这种看法的人在“高学历者”和“高地位者”、“专家”和“新贫困者”中占有较大的比例。尤其是对于“专家”和“新贫”来说，工作的价值要比工资收入的价值高出1-2.2倍，而对“现实者”而言二者几乎是一样的。^①在当代俄罗斯各阶层中，那些所谓的“高地位”阶层的人往往把工作看成是生活的第一需要，而那些适应新形势的人则常常把满足家庭利益的需要放在首位，工作的需要居于第二位。这说明，对于很多俄罗斯人来说，特别是从“高地位”阶层沦为“新贫”的群体而言，工作的意义远不是养家糊口，与自己专业相符和体现自身价值在任何情况下仍然还是工作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意义。从这一角度讲，他们没有从根本上很好地解决生存与精神追求的关系问题。

苏联时期形成的坐享其成的作风是“新贫”群体缺乏适应性的另一种表现。这种长期形成的作风使许多俄罗斯人不愿意去奋斗，也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不能或者不愿意积极地、富有进取心地、主动地去适应新的市场经济，他们总是幻想国家会像前苏联时期那样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社会学研究表明，俄罗斯有相当一部分调查对象都持消极坐等的态度，认为国家有义务保证所有劳动者的就业，并使他们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平。这种意识从他们对待失业的态度中可见一斑：1990年40%的人认为失业是不可容忍的，1993年这一比例增长到45%。而认为“一定的失业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正常的”人，从1990年的8%缩减到1993年的4%，1996年又降为3%。^②2000年在一些典型城镇进行的社会意见调查中，95%的人认为现行政府应当像苏联时期那样保证人民一定的生活福利，其中包括就业、稳定的工资、可预测的未来等方面的保障”。^③

这样的意识决定了“新贫”对现行社会—经济改革的态度。他们认为，他们的贫困境遇并不是自身的错误导致的，而是外部权力、政策等因素作用的结果。“新贫”的出现是因为俄罗斯存在着让少数利益集团营私舞弊的犯罪土壤，是这些少数人操纵利益作用机制造成的。他们的这种态度不但影响了自身对新形势的适应性，而且还对所有致富的群体都不加辨别地加以否定。“新贫”中的多数人都认为，从道德角度讲，“新富”都是一些不法分子。在“新贫”看来，由于劳动工资太低，连最低生活水平都无法保障，这不但使他们变得物质贫困，同时也限制了他们的人身独立和自由，他们把自身的境地完全归因于外部因素，没有积极地去应对和适应新的形势，

① Барсукова С. В. Указ. соч., С.156.

② Бедность в Росс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реакция населения. Под ред. Д. Клузмана. Всемирный банк. Вашингтон, 1998. С.107-108.

③ Мониторинг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2000. № 3 (47). С.39.

把自己生存环境的改善寄希望于政府改变经济—政治方向和现行政策。因此，这些人一直以保守、消极的态度对待社会改革，他们在社会政策的选择上经常对那些保证“回到过去美好时光”的人投赞成票。1996年在俄罗斯南部地区的“竞选执政党事件”^①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证，他们梦想俄共会把他们带回过去的“美好时光”。

如果抛开其他因素的影响，这些缺乏适应性的“新贫”群体在塑造自身生命轨迹的过程中，由于放弃了与其他行动者竞争的愿望而把自己置身于贫困的境地，从这个角度讲，是他们自己选择了贫困。这些人在置身于社会变迁的新情境时，过多地受到了过去“他们所知道”的东西的诱导，这正是他们的适应力顺利形成的障碍，而他们优先选择的则是路径依赖的生存方式。许多社会变迁的研究者都认为，社会变迁时不断地进行“轨迹调整”(trajectory adjustment)或者是“轨迹校正”(trajectory correction)的人，往往是拥有最多样化资本形式的人，他们最有能力调整自己的轨迹，从而能够成功满足社会变迁的需求。

五、“新贫”群体对俄罗斯社会的影响以及政府的应对措施

改革后出现的贫困问题是俄罗斯转型期间最尖锐的社会问题之一。贫困使许多人以及他们的家庭处于边缘化状态，这决定了社会结构断裂现象的发生，衍生了许多其他社会问题的出现，阻碍了国家的顺利发展，引起了人们对制度转型的质疑。同时，贫困问题还限制了相当一部分俄罗斯居民的发展资源——高收入的工作、高质量的服务、高质量的教育和健康保健、青年和儿童顺利社会化的机会等。“新贫”问题已经引起了俄罗斯政府的高度关注，不断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缓解和解决。

(一)“新贫”群体的产生引发了国内外学者对制度转型的质疑与讨论

俄罗斯转型期间大量新贫困人口的产生，以及相伴而生的许多其他社会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对俄罗斯这次变革的质疑与讨论。俄罗斯学者对这一时期的制度持有两种对立的看法，一种认为，俄罗斯的社会转型以及制度体系是建设性的，它会使俄罗斯这个原社会主义国家有效地发展出民主的市民社会；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些制度都是破坏性的，是西方强加于俄罗斯的，这种转型与制度体系将最终导致俄罗斯经济、社会秩序和精神基础的彻底崩溃。而西方的一些研究者对俄罗斯此时的评价也基本分为两大流派——进化的和内卷的。进化论认为，俄罗斯转型后，政治经济方面所采用的运行机制是先进的，会把俄罗斯引向发展之路；另一派学者则

^① 当时俄罗斯共产党在竞选中获得多数选票，这主要是多数知识分子支持的结果。知识分子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都认为共产党重新执政的事实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又可以回到过去的美好年代了。在这种情况下，当地出现了只有在备战时期才会出现的抢购风潮。

认为，俄罗斯的政治改革并没有达到民主化进程的目的，在经济上也没有实现真正的市场化机制甚至是倒退的。我们认为，俄罗斯社会转型中的主要问题是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变迁在时间上的非同步性，社会结构的变迁明显滞后于经济结构的变迁。俄罗斯在旧有社会整合机制被打破之后，新的可以替代它的社会整合机制并没有及时地建立起来，以至于叶利钦时代政府频频解散的闹剧不时上演。政治的混乱导致了俄罗斯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新贫”群体的出现就是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

普京执政时期，其“铁腕”政治手段更是遭到了西方的不断质疑，其治理手段被冠以多种名称——“软独裁主义”、“可控制的多元化体制”、“依法独裁”、“不成熟的民主”政治等等。其实，俄罗斯特殊的历史造就了特殊的政治现象，不能简单地以内卷还是进化来对其政治形式加以评价，而应当以实际治理效果来界定其是否具有合理性和进步性。基于俄罗斯的历史文化传统，实行“可控民主”（这样的提法比较中性些）是当前俄罗斯国家和人民必然选择的一种社会管理模式。这一模式实际上是对民主的抽象肯定和具体的否定，它是对民主的一种操控，是一套特殊的政治统治术。俄罗斯在转型前的政治形式表现为过度控制，人们在这种体制下感觉倍受压抑，正如许多俄罗斯人所说的那样“我们只知道不能做什么，却不知道能够做什么”。事实证明，俄罗斯在改革之初选择的全盘西化的方式并不奏效，使俄罗斯社会在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至今还难以解决。

普京执政后把转型前后这两种看似对立的统治方式进行了适当的整合，使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得到了有效的治理和控制。不难看出，普京的政治路线与黑格尔的“反正合”思想是不谋而合的——当两种方法都矫枉过正的时候，各取所需的“合”就是最好的选择。俄罗斯在转型前后所选择的政治道路都与俄罗斯的实际状况严重偏离，普京的执政方式汲取了这两种方式中较为合理的因素，逐渐使转型后的俄罗斯步入了正轨。从这一角度来讲，普京的执政方式是顺应俄罗斯特殊的历史进程的，基本上达到了内在的相对集权与外在的民主形式的和谐统一。

（二）“新贫”群体的产生降低了国家的管理效率，导致社会问题丛生

转型期间，俄罗斯大量贫困人口的产生不但给人民、也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灾难。由于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改革十几年来贫困人口的营养状况严重恶化，与改革前的1990年相比营养品明显缺乏，个人对肉及肉类食品的获得缩减到原来的40%，牛奶和奶制品缩减到原来的45%，鱼类及鱼类制品缩减了一倍以上。而同一时期发达国家的个人需求的相应指数则是提高到了原来的1.5倍。贫困人口物质资源的极度匮乏，致使1/2的人不能与其他阶层一样享用付费服务，90%的人不能选择付费教育，95%以上的人不能利用保健服务，约60%的人不能享有医疗服务。与贫困生活相伴的是高发病率和死亡率高现象的衍生。从1990年到2000年，俄罗斯的发病率增加了

13%，其中传染病患者占 28%，肿瘤患者是原来的 1.5 倍，俄罗斯联邦的结核病患者在改革前的 1970 年到 1990 年减少了一倍多，而到改革后的接近 2000 年时却增加了 1.6 倍，梅毒患者增加了 14 倍，从 1990 年到 2000 年青少年吸毒者增加了 16 倍。^① 国家忙于解决贫困问题的同时，无法全力顾及其他问题，致使这一时期俄罗斯的犯罪率也不断攀升，有组织的犯罪组织活动猖獗，从 1990 年至 1993 年短短的三年时间，犯罪团伙组织就增加了 2.5 倍，达到了 12431 个。^② 例如以排外为主旨的犯罪团伙“光头党”的存在，引起了俄罗斯社会的极度混乱和恐慌，外国投资者对此心存惴惴，严重影响了外资的引进。贫困使家庭归属和教育功能弱化，大量青少年被吸纳进犯罪组织中，使这些组织不断壮大。俄罗斯内务部的资料显示，当时，其中的一些犯罪组织已经成功地控制了经济、甚至是政治大权。^③ 贫困衍生出的问题给社会埋下了多重隐患。

（三）对贫困复制功能的畏惧使“新贫”群体的生育意愿降低，加剧了俄罗斯人口问题的恶化程度

俄罗斯学者的有关研究表明，多子女不但会增加贫困的几率，而且这种家庭还有“贫困定型化”的特征——多子女的贫困家庭往往会复制出贫困的子女。这是“新贫”家庭不愿意生育的重要原因。^④ 因为按照他们以前的生活质量标准，养育一个孩子需要很大的一笔支出，而现实的生活状态根本无法保证这一愿望的实现。因此，“新贫”对于生育以及对于孩子的未来都充满了忧虑，他们担心孩子因得不到良好的教育而重复他们自己艰难的生活。这一观点在 2003 年 4 月的一次调查中得到了印证。社会学家在这次调查中向俄罗斯人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认为孩子获得成功的机会是否平等”（调查对象为 1700 人），只有 10% 的人认为机会是平等的，90% 的人认为不同家庭的孩子得到的机会是不平等的。调查对象普遍认为，孩子的成就主要取决于父母的富裕程度，贫困家庭的孩子根本就没有成功的机会。^⑤ 众所周知，在当今的世界上，失去了享有良好教育的机会就意味着失去了向上层流动的可能性。所以，从这一点讲，贫困家庭的孩子大都面着重蹈其父母贫困生活的威胁。

“新贫”群体对复制功能的担忧和畏惧，使俄罗斯的人口减少问题雪上加霜。从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显现的这一问题，在社会转型后更加恶化。1993 年以来，俄罗

① Почему мы так бедные//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КПК.2004.3.

② Аргументы и факты.1994. № 5. С.3.

③ Беспредел времен передела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Уголовная Россия)// Известия.1994. № 5.

④ Римашевская Н. М. Социальные последств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й В России. Социс.1997 №.6. С.87.

⑤ Россияне считают, что успех детей зависит от уровня благосостояния их родителей. 30.04.2003. <http://www.jobbank.ru>

斯的人口一直处于负增长状态,出生率在1990年至2002年间从1.34%缩减到0.98%。^①2010年11月结束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目前俄罗斯人口为1.41亿,比2002年减少了300多万人。^②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早在2003年就声称,如不采取措施,到2050年俄罗斯将只有1亿人口,比2003年锐减30%。俄罗斯总统普京警告说:“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俄罗斯将面临存亡威胁。”俄罗斯对这一问题的解决采取了很多方法,比如提高生育补助金、提高未成年人的生活补助,以移民的方式补偿人口的减退等,但人口减少的问题并没有显著改善,同时却滋生了出一些民族问题。如何刺激人口增长,已成为俄罗斯政府的当务之急。

(四)“新贫”群体的边缘化使阶层结构的合理性遭到破坏,短时间内难以弥合

由于知识分子和国家公职人员占据俄罗斯“新贫”群体的大部分,使俄罗斯中间阶层的核心遭到了重创,“新贫”群体因为在社会中找不到自己合适的位置而处于社会结构的边缘状态。俄罗斯大多数学者都是以“边缘状态”(过渡状态、暂时状态)的角度来分析“新贫”群体的,因为“边缘化”这个概念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和博大,能够揭示俄罗斯转型期社会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学者曼钦(M. Манчинь)认为,边缘状态大概由三个特征形成——经济的剥夺、政治的剥夺、社会的剥夺。彼得洛娃通过访谈,发现了俄罗斯贫困群体中存在着第一种和第三种剥夺。她认为,边缘状态是一种“潜在的阶层偏移”。^③在这里,所谓的阶层偏移是指这一阶层有向低层次阶层滑落的征兆和倾向。

“边缘化”对社会的危害极大,它使边缘人物被甩出社会结构之外,还会使这个阶层定型化。从社会流动的角度看,它使社会向下流动加速;从阶层角度讲,会形成一个稳固的“社会底层”,而贫困、失业、社会和经济的动荡、希望的渺茫、规则的破坏都会使居民边缘化的过程加快。据俄罗斯学者里玛舍芙斯卡娅(H.M.Римашевская)以及其他学者的研究表明,俄罗斯被边缘化的人占有居民的10%以上。^④这些成为社会底层的边缘化人物的特点是,对恢复正常的生活和融入到市场关系中几乎完全失去了信心。

(五)俄罗斯政府对“新贫”问题的反应

俄罗斯“转型性贫困”群体的产生拷问着改革后新一届政府的执政能力与执政理念。当时的政府对这一问题的反应还算及时,在1992年即出台了《关于俄罗斯联邦居民最低消费预算体系》的总统令。由于这一总统令的仓促出台存在着不少漏洞,

① Почему мы так бедные.//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КПК.2004.3.

② <http://www.hinews.cn>

③ Петрова.Л.Е. Указ.соч..С.31.

④ Римашевская Н.М. Указ.соч. С.56-57.

1997年10月24日，又出台了由国家杜马劳动和社会支持委员会制定、联邦劳动部首肯的《俄罗斯联邦最低生活保障法》。这一法律获得了俄罗斯国家杜马的通过，自1998年1月1日起生效。这是俄罗斯国家历史上在后苏联时期第一个为保障公民的社会福利而制定的法律。这一法律对最低生活保障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同时采用世界上许多国家使用的标准预算法——根据人们生存的需要来制定贫困线，最终确定了最低生活保障的构成和标准，从法律上保障了有针对性的反贫困措施的实施。为保证这一法律的合理性，条文中明确规定了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批准和修订的程序，确定了资金的来源——困难补助金由联邦政府和联邦主体政府共同负担。这样，不但保证了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来源，而且实施过程中透明度的提高也有效地避免了随意性的操作行为。为了加大公信力，相关部门还规定了对执行结果实行信息公开制度——凡是涉及全国和地区最低生活保障的所有信息必须在相应的联邦政府和联邦主体政府出版物上予以定期公布，周期为一个季度。这些措施不但使贫困问题得到了有效的解决，而且还有力地保证了制度职能最大化效应的发挥。

到了普京执政时期，在整体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的基础上，政府还专门为知识分子提高了工资。2005年4月，政府把科研人员的月平均工资提高到了10102.3卢布（折合363.3美元），从而达到了苏联解体以来的最高水平。^①不过，“新贫”群体的工资还是处于很低的水平。

时至今日，俄罗斯的“新贫”问题仍然影响和制约着社会结构的良性发展和运行。这一群体的产生，不但减弱了俄罗斯中产阶级发展的冲力，降低了中产阶级的发展速度，还严重影响了中产阶级的总体质量。俄罗斯中产阶级的现状，影响了这一群体正常发挥社会“调节器”的作用，使俄罗斯改革初期形成的贫富差距悬殊的状况得不到有效的缓解。尽管国家不断进行政策调整，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并不理想。俄罗斯“新贫”群体的产生主要是分配制度不公平的产物，尽管也有个体适应性致贫的因素，但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制度。俄罗斯的这一现象提示我们，对于转型国家来讲，国家分配制度的起始公平对结果的公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规则的公平应当贯穿分配过程的始终，并及时进行修正和调节。分配制度切忌利益倾斜，要兼顾各阶层的利益，让所有的人都能够享受改革的成果。如果一次分配的结果不够理想，应当寻求再次分配的公平性与合理性，这样才会给人民足够的希望和信心将改革进行到底。从现实情形来看，俄罗斯的二次分配制度是比较成功的，起到了稳定社会和缓解阶级矛盾的效果。俄罗斯舆情研究表明，这些年俄罗斯民众的乐观情绪不断增长。^②

① *Время новостей*. 25.06.2007.

② 参见庄晓惠：“俄罗斯的社会转型与社会心态”，《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0年，第4期。

附表：以教育、医保工作者为代表的“新贫”群体对当代俄罗斯贫困特征的认同（%）

具体特征	赤贫		贫困		不太贫困		不贫困	
	教育工作者	医保工作者	教育工作者	医保工作者	教育工作者	医保工作者	教育工作者	医保工作者
营养不良	93.3	77.4	6.7	22.6				
一周内保证不了两次鱼或肉类食品	55	54.8	43.3	45.2			1.7	
不能定期买水果和果汁	43.3	54.8	51.7	41.9	5	3.2		
过节不能买特别讲究的食品	46.7	29	36.7	54.8	11.7	16.1	5	
必须的卫生用品质量不高	51.7	61.3	40	32.3	5	6.5	3.3	
欠缺为所有家庭成员更新衣物的钱	56.7	51.6	43.3	48.4				
欠缺为所有家庭成员更新鞋子的钱	61.7	29	38.3	71				
没有且不能获得冰箱	56.7	9.7	41.7	87.1	1.7	3.2		
没有且不能得到最普通家具	68.3	32.3	28.3	58.1	1.7	9.7	1.7	
没有且不能获得黑白电视机	80	45.2	13.3	48.4	5	6.5	1.7	
没有且不能获得洗衣机	51.7	3.2	41.7	83.9	5	12.9	1.7	
没有且不能获得电话	30	3.2	28.3	67.7	36.7	29	5	
没有且不能获得时尚彩电和录像机	28.3	9.73	31.7	74.2	31.7	12.9	8.3	3.2
住在宿舍、公共住宅里，没有钱购买独立住宅	36.7	16.1	50	71	13.3	12.9		
宿舍没有自来水	48.3	51.6	33.3	35.5	13.3	9.7	5	3.2
宿舍没有集中供暖设备且没有钱付暖气费	50	45.2	41.7	45.2	8.3	9.7		
宿舍里没有热水且没钱购买热水器	35	29	48.3	54.8	15	16.1	1	
人均住宅面积低于5平米且没有钱扩容	30	29	46.7	38.7	21.7	29	1.7	3.2
不能及时维修住宅	43.3	12.9	36.7	64.5	16.7	19.4	3.3	3.2
不能保证每个家庭成员都有独立的房间	16.7	9.7	45	51.6	30	35.5	8.3	3.2
无钱买药品和医疗器械	56.7	58.1	38.3	38.7	1.7	3.2	3.3	
不能付费看病	38.3	29	45	58.1	13.3	12.9	3.3	
没有两年一次的家庭外休息的钱	6.7	12.9	51.7	61.3	40	25.8	1.7	

保证不了一个月一次的付费消遣	3.3		28.3	67.7	51.7	25.8	16.7	6.5
得大量借债才能进行宗教仪式典礼	41.7	19.4	40	74.2	15	3.2	3.3	3.2
没钱探望远方的亲人	21.7	3.2	50	87.1	23.3		5	9.7
没有钱订阅报纸和杂志	15	22.6	40	64.5	36.7	6.5	8.3	6.5
缺少在重大事件和节日里宴请宾客的资金	10	19.4	51.7	74.2	33.3	6.5	5	
没有钱给朋友和亲人买礼物	10	12.9	48.3	77.4	38.3	9.7	3.3	
没有起码的生活资料支出，家庭经常陷于债务中	50	38.7	45	58.1	5	3.2		
有孩子的贫困家庭的补充特征								
不能定期给孩子买水果	55	67.7	40	32.2	5			
缺乏孩子在学校的营养费	55	64.5	40	29	5	6.5		
有时甚至不能给孩子买甜点	65	67.7	31.7	29	3.3	3.2		
不能给孩子买适龄尺码的服装鞋帽	65	61.3	33.3	35.5	1.7	3.2		
没有钱让孩子野营、去疗养院、住膳宿旅馆	40	41.9	41.7	54.8	15	3.2	3.3	
没有钱让孩子去学前机构	56.6	48.4	35	48.4	5	3.2	3.3	
没钱为孩子的继续教育付费	31.7	22.6	46.7	67.7	16.7	9.7	5	
保障不了学生的学习用具和教科书	50	45.2	50	51.6		3.2		
缺乏孩子中学毕业后继续学习的资金	31.7	32.3	61.7	67.7	6.7			

资料来源：Барсукова.С.В. Указ.соч..С.156.183-185.

【Abstract】 A noticeable group is emerging in the social transition of Russia, which is entitled as “the transitional poor” (compared with the poor before the transition, the group is referred to as “the new poor”), not only specially composed but also in large numbers. The majority of this group comprises the intellectual, civil servants, and key skilled workers, who were of the core group of the middle class during the Soviet period.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poor resulted in over half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being in poverty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form in Russia. The new poor shall be classified as

relatively poor or the marginalized poor in light of their social professions and life characteristics. The emergence of this group reflects deep-rooted problems embedded in the system during the Russian transition, among which, a series of structural factors, for instance, the inequality of distribution system, the widened income disparities between industries, and the shortage of safeguard measures, constitute the main causes of this; meanwhile, some individual factors to poverty, for example, the group itself failing to adapt to the new situation well also play the roles.

【Key Words】 “the transitional poor”, Russian transition, system, equality, income disparities, individual adaptability

【Аннотация】 В России в процессе социальных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й в обществе образовалась вызывающая большой интерес группа — «бедняки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й» (в отличие от бедняков до начала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й, мы будем называть их «новыми бедняками»), эта группа не только стала особенной, но также и самой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ой. Большинство из них — это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служащие и квалифицированные работники, относившиеся к среднему классу в период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Появление «новых бедняков» привело к тому, что число бедн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России в начале реформ превысило половину от общей численности населения.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ой занятости и особенностей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и «новых бедняков» они либо принадлежат к нищим, либо находятся на краю бедности. Появление этой группы отражает глубо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й системы России в период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й, среди которых — несправедливая система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я, большой разрыв в доходах между отраслями, отсутствие мер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ряд иных структурных факторов, являющихся основными причинами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я данной группы,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у данной группы также существует ряд вызывающих бедность, относящихся к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ым, факторов, как, например, не очень хорошая адаптация к новой ситуации и др.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Бедняки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й»,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в России,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ая система,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ь, разница в доходах,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ая адаптация

(责任编辑 姜睿)

俄罗斯产业结构与经济成长的互动关系研究*

郭晓琼**

【内容提要】产业结构与经济成长的互动关系是经济学界长期关注的问题。运用钱纳里的产业结构演进模型可以对俄罗斯的产业结构变动进行刻画，并对俄罗斯第三产业先于第二产业达到拐点给予解释；而运用产业分解模型则可以考察产业结构对俄罗斯经济成长的影响。在综合两方面的实证分析基础上，可以总结出俄罗斯产业结构面临的问题，并得出必要的启示。

【关键词】俄罗斯 产业结构 经济成长 互动关系

【中图分类号】F269.51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1)03-0119(16)

结构调整是经济成长的重要议题，也是转型经济体面临的难题。俄罗斯是世界规模巨大的转型经济体之一，从目前表现出的三、二、一产业结构特点来看，俄罗斯似乎踏上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那么真实情况是否如此？俄罗斯产业结构的演进逻辑是什么？产业结构对经济成长的影响究竟怎样？俄罗斯的实践经验或许值得借鉴，或许能带给我们若干启示。

一、主要文献回顾及评述

关于经济成长对产业结构影响的最早论述是“配第一克拉克”定理。该理论主要描述了人均收入增长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并依据产业特点划分经济发展的阶段。^①库兹涅茨在《各国的经济成长》一书中，不仅考察了不同产业结构的产值特点，还考察了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的份额变化。^②钱纳里和塞尔昆最早通过计量方法考察了

* 本研究得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重点课题“俄罗斯产业结构研究”的资助。

** 郭晓琼，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俄罗斯经济室助理研究员，博士。

① Colin Clark, *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 London: Macmillan Co. Ltd, 1940.

② [美] 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成长》，常勋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产业结构变动的规律。^①他们构造的二次方程^②可以很好地描述产业结构比例先上升后下降或者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

总的来讲，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农业为主的低开发经济社会，这一阶段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水平都很低，其他产业都未得到充分发展；第二阶段是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社会，人均收入和劳动生产率都有极大的提高，这一阶段劳动力从农业向制造业转移，农业产值占比呈下降趋势，工业产值占比呈上升趋势；第三阶段是以商业、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社会，这一阶段工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大幅提高，对劳动力的吸收作用有限，劳动力向商业和服务业转移，工业产值占比逐渐下降，服务业产值占比逐渐提高。

上述关于产业结构的变动规律都是基于需求角度对产业结构的解释，如人均收入和人口总量的解释。然而需求的增长也要供给的匹配，供给面导致产业结构的变动也存在自身规律。庞巴维克提出迂回生产理论，即先生产生产资料（或称资本品），再用这些生产资料去生产消费品。通过这种方式，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迂回生产”在解释经济呈集约式增长的同时，也解释了第二产业相对于第一产业扩张的原因。^③霍夫曼在《工业化的阶段和类型》一书中研究了制造业中消费资料工业生产与资本资料工业生产的比例关系，得出了霍夫曼系数。^④这一研究成果实际上是“迂回生产”理论在第二产业内部结构的一个应用。格鲁伯和沃克在《服务业的增长原因与影响》一书中指出，服务业的增长主要来自生产性服务业的贡献，而生产性服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却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因为生产性服务使用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投入，能够很好地解释除劳动力、资本以及技术因素之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⑤这一理论在解释增长之谜的同时，实际上也解释了经济结构高级化为什么表现为第三产业比重较高。

国内关于俄罗斯产业结构问题已展开较多研究，研究较为深入和全面的包括：程伟、殷红针对俄罗斯产业结构优化的表象提出质疑，他们指出产业结构优化的背景是经济增长，而俄罗斯产业结构优化却是在经济下滑的情况（1991-1998年）下出现的，这就与产业结构变动的内在规律相矛盾。一方面，收入的下降会减少服务业的需求；另一方面，一、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不能为第三产业提供充足劳动力。

① [美]钱纳里、[以]塞尔昆：《发展的型式 1950-1970》，李新华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

② 一次方程只能描述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单向关系。

③ [奥]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陈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

④ Hoffmann W.G. Das Wachstum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seit der Mitte des .Berlin: Jahrhunderts, 1965.

⑤ [加]格鲁伯、沃克：《服务业的增长原因与影响》，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

针对这一矛盾现象，文章从转型的政策变迁效应以及资源禀赋的角度进行了解释。^①关雪凌、宫艳华也注意到上述现象，但他们侧重从国际分工的角度进行分析，并指出俄罗斯作为“全球原料供应基地”的现状很难改变。^②曲文轶则专门从资源禀赋的角度分析了其与俄罗斯产业结构以及经济增长关系，文章不仅分析了原材料部门发展产生的产业关联效应，同时也涉及了货币金融层面的因素，即原材料部门过度发展是否导致汇率升值，进而产生制造业萎缩（即“荷兰病”现象）。^③总的来讲文章的基调是肯定的，尤其指出了原材料部门发展为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此外荷兰病的病症也不明显，而目前产业结构存在的隐患并未引起足够重视。

上述文献为俄罗斯产业结构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石，但还存在如下缺陷有待完善：第一，现有文献并没有从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展开研究，即并没有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考虑；第二，现有文献大都采取描述性的论述方式，很少有采用计量方法进行精确研究的；第三，各种关于俄罗斯产业结构质疑的解释几乎都是基于宏观方面的，本文给出一个微观解释。

二、俄罗斯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一）理论模型

钱纳里和塞尔昆构造的产业结构演进模型很好地刻画了产业结构随时间呈不同方向变化的趋势。本文使用一个简化的钱纳里模型研究俄罗斯的产业结构变化。模型如下：

$$\ln x = \alpha + \beta_1 \ln y + \beta_2 \ln^2 y + \gamma \ln n \quad (1)$$

其中， x 是用比重表示的产业结构， y 是以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收入（人均GDP）， n 是总人口。

对（1）式 y 求导，并乘以 y 得：

$$\frac{\partial X}{\partial Y} \cdot \frac{Y}{X} = \beta_1 + \beta_2 2 \ln y \quad (2)$$

对（1）式 n 求导，并乘以 n 得：

① 程伟、殷红：“俄罗斯产业结构演变研究”，《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9年第1期，第37-41页。

② 关雪凌、宫艳华：“俄罗斯产业结构的调整、问题与影响”，《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117-125页。

③ 曲文轶：“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与俄罗斯经济增长”，《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1期，第26-33页。

$$\frac{\partial X}{\partial n} \cdot \frac{n}{X} = \gamma \quad (3)$$

其中(2)式表示产业结构的收入弹性。若观察期内人均收入(人均GDP)是增加的, $\beta_1 + \beta_2 2 \ln y$ 的估计为正, 表示该部门比重上升, 为负表示该部门比重下降; 反之则反是。(3)式表示经济结构的人口弹性。 γ 的估计值表示总人口增加 1%, 该部门比重上升(γ 为正)或下降(γ 为负) γ 个百分点。通过观察三次产业对人均GDP 的弹性, 可以判断一国产业发展所处的阶段。

(二) 数据说明

表 1 俄罗斯 GDP、产业结构、人口及人均 GDP 情况 (以 2000 年不变价格计算)

时间	GDP (十亿卢布)	第一产业占比 (%)	第二产业占比 (%)	第三产业占比 (%)	人口数 (百万人, 年末值)	人均 GDP (千卢布)
1995	6748.2	5.98%	33.33%	49.55%	150.40	44.868
1996	6504.9	5.88%	32.47%	51.30%	149.60	43.482
1997	6594.6	5.95%	32.22%	51.58%	148.90	44.289
1998	6242.2	5.10%	32.31%	52.63%	148.20	42.120
1999	6638.6	5.62%	33.22%	50.61%	147.30	45.068
2000	7305.6	5.75%	33.92%	49.15%	146.30	49.936
2001	7677.6	6.10%	34.14%	48.45%	145.60	52.731
2002	8041.8	5.99%	33.82%	48.84%	145.00	55.461
2003	8632.7	5.90%	34.24%	48.65%	144.17	59.879
2004	9249.4	5.66%	34.15%	48.98%	143.47	64.467
2005	10579.6	5.03%	35.79%	47.06%	142.75	74.111
2006	12075.0	4.61%	34.92%	47.86%	142.22	84.903
2007	13277.5	4.11%	34.69%	48.89%	142.01	93.497
2008	14605.2	4.08%	34.23%	49.34%	141.90	102.923
2009	12623.8	4.34%	32.27%	51.35%	141.91	88.954
2010	13305.7	3.68%	32.87%	49.20%	-	-

资料来源: 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www.gks.ru.

表 1 给出了 1995 年至 2010 年以不变价格计算的 GDP、人均 GDP、产业结构以及人口变动情况。现将所有以现价表示的 GDP 转换成 2000 年不变价格的 GDP 的方法概如下: 目前从俄罗斯统计局网站可查找到的数据包括三段: 第一段, 1995 年至 2000 年以 1995 年价格表示的实际 GDP; 第二段, 2000 年至 2004 年以 2000 年价格表示的实际 GDP; 第三段, 2002 年至 2010 年以现价表示的 GDP。在第一段和第二段之间, 2000 年是重合点, 以 1995 年价格表示的 2000 年 GDP 和以 2000 年价格表示的 2000 年 GDP 的总量是相等的, 因此根据两个数值可得出一个换算系数, 然后

将 1995 年至 2000 年之间的所有数据乘以这个换算系数，可得出以 2000 年价格表示的实际 GDP。对于第三段数据，首先将所有以现价表示的 GDP 换算成以 2004 年价格表示的实际 GDP，然后根据 2004 年这个重合点，求得以 2004 年计价的 GDP 乘以 2000 年计价的 GDP 的换算系数，最后将 2004 年后的 GDP 都换算成以 2000 年价格表示的 GDP。由于 2002 至 2004 年都是重合点，也可选择其他年份进行换算。

表 1 中的三次产业占比之和并不为 1，原因有两点：第一，1995 年至 2004 年数据采用的是非市场性产品生产和市场性产品生产的分类方法，前者并没有分行业的数据；第二，2002 年至 2010 年数据的统计方法尽管与国际接轨，但 GDP 的核算采用的是增加值法和收入法的混合，即各行业的除净税收的增加值加上政府的净税收。对于政府的净税收我们并不清楚主要来自哪些行业，因此在计算各产业占比时也无法对其进行分配。为尊重数据原貌，我们也没有用各行业的增加值除以它们相加的总和，因为这也并非实际的情况。从表 1 反映的情况看，三次产业占比之和大体保持在 90%±1%的水平，相对稳定，不会对计量结果造成实质性影响。

从表中所列数据可以总结如下特点：第一，GDP 增长和人均 GDP 整体呈上升趋势，但 1998 年俄罗斯金融危机以及 2008 年由美国次级贷款引致的全球金融危机都造成了俄罗斯经济的衰退；第二，俄罗斯各产业占比表现出“三、二、一”的结构特点，但从发展趋势看，第一产业整体呈下降趋势，二、三产业的发展趋势并不明朗；第三，俄罗斯的人口数量一直呈下降趋势。

（三）模型计量结果

根据表 1 数据，参照钱纳里的简化模型进行建模，运用 Eviews6.0 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本文分别得到俄罗斯三次产业关于人均 GDP 和人口的回归结果。

从表 2 反映的回归结果来看，方程的拟合优度为 0.935，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为 0.918，各回归系数在 99%的置信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ln n$ 在 90%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整个方程在 99%的置信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DW 统计量在 2 附近，经查表得方程不存在自相关。该方程的整体拟合效果较好。

从表 3 反映的回归结果来看，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为 0.721，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为 0.644， $\ln y$ 和 $\ln^2 y$ 的回归系数在 95%的置信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ln n$ 和常数项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整个方程在 99%的置信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DW 统计量在 2 附近，经查表得方程不存在自相关。该方程的整体拟合效果稍差，但我们仍接受上述回归结果。

表2 钱纳里模型对俄罗斯第一产业的回归结果

因变量: LNX1 ^①				
方法: 最小二乘				
日期: 04/01/11 时间: 12:05				
样本: 1995 2009				
观察个数: 15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t统计量	概率
C ^②	-47.84300	15.10673	-3.166999	0.0090
LN ^③	10.79186	2.145890	5.029083	0.0004
SLNY ^④	-1.309558	0.245115	-5.342622	0.0002
LNN ^⑤	4.577322	2.235663	2.047411	0.0653
R ²	0.935223	因变量均值		-2.939441
调整的 R ²	0.917556	因变量标准差		0.145411
回归标准差	0.041752	赤池信息准则		-3.290967
残差平方和	0.019175	施瓦兹准则		-3.102154
对数似然比	28.68225	汉南-奎因准则		-3.292978
F统计量	52.93773	DW统计量		2.318323
相伴概率	0.000001			

表3 钱纳里模型对俄罗斯第二产业的回归结果

因变量: LNX2 ^⑥				
方法: 最小二乘				
日期: 04/01/11 时间: 12:07				
样本: 1995 2009				
观察个数: 15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t统计量	概率
C	-7.761498	6.375634	-1.217369	0.2489
LN ^③	2.202813	0.905650	2.432301	0.0333
SLNY	-0.253954	0.103448	-2.454885	0.0320
LNN	0.388946	0.943538	0.412221	0.6881
R ²	0.720613	因变量均值		-1.085669
调整的 R ²	0.644417	因变量标准差		0.029550
回归标准差	0.017621	赤池信息准则		-5.016281
残差平方和	0.003415	施瓦兹准则		-4.827468
对数似然比	41.62211	汉南-奎因准则		-5.018292
F统计量	9.457314	DW统计量		1.585652
相伴概率	0.002218			

- ① LNX1 表示第一产业占比取对数。
 ② C 表示常数项, 表 2 中的变量含义同表 3、表 4。
 ③ LN^③ 表示人均 GDP 取对数, 表 2 中的变量含义同表 3、表 4。
 ④ SLNY 表示 LN^③ 的平方, 表 2 中的变量含义同表 3、表 4。
 ⑤ LNN 表示人口数取对数, 表 2 中的变量含义同表 3、表 4。
 ⑥ LNX2 表示第二产业占比取对数。

表4 钱纳里模型对俄罗斯第三产业的回归结果

因变量: LNX3 ^①				
方法: 最小二乘				
日期: 04/01/11 时间: 12:08				
样本: 1995 2009				
观察个数: 15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t统计量	概率
C	13.63855	7.352662	1.854914	0.0906
LN _Y	-3.455870	1.044435	-3.308841	0.0070
SLN _Y	0.399115	0.119301	3.345439	0.0065
LNN	-1.389184	1.088129	-1.276672	0.2280
R ²	0.662805	因变量均值		-0.701307
调整的 R ²	0.570843	因变量标准差		0.031020
回归标准差	0.020321	赤池信息准则		-4.731123
残差平方和	0.004542	施瓦兹准则		-4.542310
对数似然比	39.48342	汉南-奎因准则		-4.733135
F统计量	7.207362	DW统计量		1.567078
相伴概率	0.006036			

从表 4 反映的回归结果来看, 方程的拟合优度为 0.663, 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为 0.571, $\ln y$ 和 $\ln^2 y$ 的回归系数在 99% 的置信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常数项在 90% 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ln n$ 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整个方程在 99% 的置信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DW 统计量在 2 附近, 经查表得方程不存在自相关。该方程的整体拟合效果略差, 但我们仍接受上述回归结果。

根据上述计量结果, 三次产业的回归方程可写成如下形式:

$$\ln x_1 = -47.843 + 10.79186 \ln y - 1.309558 \ln^2 y + 4.577322 \ln n$$

$$\ln x_2 = -7.761498 + 2.202813 \ln y - 0.253954 \ln^2 y + 0.388946 \ln n$$

$$\ln x_3 = 13.63855 - 3.45587 \ln y + 0.399115 \ln^2 y - 1.389184 \ln n$$

(四) 简要说明及结论

尽管上文给出了回归方程, 但不能很好地反映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下文通过产业结构的人均收入弹性和人口弹性加以说明。

1、产业结构关于人均收入的弹性说明

人均收入弹性反映了人均收入变动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根据公式 (2), 第一产业的人均收入弹性为 $10.79186 - 2.61912 \ln y$, 表明当人均 GDP 达到 $e^{4.1204} \approx 61.585$ 千卢布 (以 2000 年价格计算) 之前, 人均 GDP 的增长将导致第一产业比重增加, 但增加的速度是下降的 (因为 $\ln y$ 的系数为负), 当达到 $e^{4.1204} \approx 61.585$ 千卢布之后, 人均 GDP 的增长将导致第一产业比重减少。第二产业

① LNX3 表示第三产业占比取对数。

的人均收入弹性为 $2.202813 - 0.253954 \ln y$ ，表明当人均 GDP 达到 $e^{4.3370} \approx 76.480$ 千卢布（以 2000 年价格计算）之前，人均 GDP 的增长将导致第二产业比重增加，在这之后，人均 GDP 的增长将导致第二产业比重减少。第三产业的人均收入弹性为 $-3.45587 + 0.79823 \ln y$ ，表明当人均 GDP 达到 $e^{4.32942} \approx 75.900$ 千卢布（以 2000 年价格计算）之前，人均 GDP 的增长将导致第三产业比重减少，在这之后，人均 GDP 的增长将导致第三产业比重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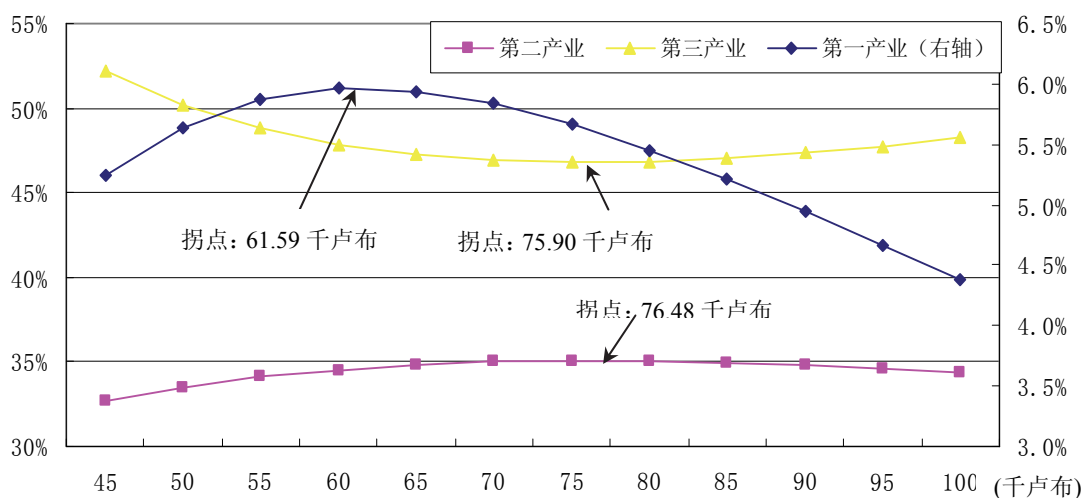


图 1 人均GDP增长对产业结构影响的动态模拟^①

图 1 给出了假定人口不变的条件下，人均GDP增长对产业结构影响的动态模拟图。它较好地刻画了俄罗斯产业结构的演进规律：随着人均GDP的增长，第一、二产业经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而第三产业经历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这与配第一克拉克以及库兹涅茨阐述的“一、二、三”产业渐次发展的规律大体是一致的。但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俄罗斯的第三产业先于第二产业达到拐点，这意味着俄罗斯的经济增长跳过了工业化阶段而直接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对此现象，许新^②从转型时期工业衰退的角度予以解释，如军工企业的大面积转产导致工业产值下降，但这并没有解释转型时期第三产业的快速增长。程伟、殷红指出：“服务业的迅速起步和发展，是短缺经济的大背景和激进的转轨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③短缺经济背景下，

① 上述动态模拟假设人口数不变，为 1995 年至 2009 年的均值，145.32 百万人。

② 许新：《重塑超级大国——俄罗斯经济改革和发展道路》，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277-280 页。

③ 程伟、殷红：“俄罗斯产业结构演变研究”，《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9 年第 1 期，第 38 页。

长期抑制的消费需求在转型政策作用下突然获得释放，这就促使了那些服务最终消费的产业快速发展，“居民消费品批发与零售贸易率先崛起”。本文并不否认上述宏观方面的原因，但拟提供一个新的微观视角来进行解读。

麦金农在《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中提出了“货币与资本互补性”理论。^①他指出，在给定收入的条件下，如果意愿资本积累增加，收入与投资的缺口就会增加。如果企业持有的实际现金余额增加，就增加了实物资本投资的可能性。此时，货币与资本之间表现出互补性而不是竞争性。这种互补性通过两个渠道发生作用：第一，许多技术投资具有不可分割性，实际货币余额的数量越大，意味着越多的投资机会；第二，持有货币余额意愿的增强，降低了使用内部储蓄购买资本品的机会成本，从而使得资本积累的金融渠道得以拓宽。

俄罗斯转型的一大特点是证券私有化过程。第二产业作为资本密集型行业，按照“货币与资本互补性”理论，对其投资越大，所持有的实际货币余额应该越多。然而，证券私有化过程导致大量货币余额用于购买股份，削弱了用于实际投资的货币余额。此外，由于恶性通货膨胀，货币的实际余额是下降的，进行投资的能力也相应下降，货币与资本互补性的第一条途径不复存在；货币实际余额的下降还导致持有意愿的下降，居民和企业大都转向存货进行储蓄，这使得外源性融资的机会大大降低，货币与资本互补性的第二条途径也不复存在。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第三产业，初创时的第三产业规模较小，所需资本相应较小，在少量的货币余额条件下，根据货币与资本互补性原理，可以快速发展。正如麦金农所言，一旦市场放开，小规模私营资本主义，即小店主、小农户、小手工艺人等等，会迅速涌现和发展^②。在俄罗斯，我们看到的正是这样一幅图景，即第三产业中批发零售及餐饮业占有相当的比重。

2、产业结构关于人口的弹性说明

第一产业对人口的弹性为 4.577，表明在人均收入不变的条件下，人口增长 1%将导致第一产业比重增长 4.577%。第二产业对人口的弹性为 0.389，表明在人均收入不变的条件下，人口增长 1%将导致第二产业比重增长 0.389%。第三产业对人口的弹性为-1.389，表明在人均收入不变的条件下，人口增长 1%将导致第三产业比重下降 1.389%。

三次产业人口弹性的符号恰好反映了俄罗斯的现实国情：第一产业是土地密集

① [美] 罗纳德·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李瑶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第30-49页。

② [美] 罗纳德·麦金农：《经济自由化的顺序：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金融控制》，李若谷、吴卫红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第134页。

型的，所以人口增加产生正的规模效应，而第二产业是资本密集型的，人口增加同样产生正的规模效应。当前俄罗斯人口一直呈下降趋势，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第一、二产业的萎缩，这说明人口因素已成为制约俄罗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因素。第三产业的人口弹性为负，当人口增加时第三产业比重却下降，这反映了俄罗斯第三产业中劳动密集型行业已趋于饱和（当前正是人口总量的下降导致俄罗斯第三产业占比上升），因此当前俄罗斯第三产业必须依靠科技和知识资本的投入。

三、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理论模型

罗默认为，长期经济增长是由技术进步（含经济制度变迁）贡献的，而短期经济增长是由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的增加所贡献的。然而，资本、劳动和技术是在一定产业结构中组织在一起进行生产的，因此不同的产业结构会导致不同的产出。^①我们构建一个包含产业结构的产出模型： $Y = F(X_1, X_2, \dots, X_k, A)$ ，其中 Y 表示总产出， X_i 表示第 i 产业的产出，由于资本、劳动和技术都内含于各产业的产出中，因此 A 仅表示各产业不能解释的制度因素。对上述函数求全微分可得：

$$dY = \frac{\partial Y}{\partial X_1} dX_1 + \frac{\partial Y}{\partial X_2} dX_2 + \dots + \frac{\partial Y}{\partial X_k} dX_k + \frac{\partial Y}{\partial A} dA$$

上式可转换为：

$$\frac{dY}{Y} = \frac{X_1}{Y} \frac{\partial Y}{\partial X_1} \frac{dX_1}{X_1} + \frac{X_2}{Y} \frac{\partial Y}{\partial X_2} \frac{dX_2}{X_1} + \dots + \frac{X_k}{Y} \frac{\partial Y}{\partial X_k} \frac{dX_k}{X_1} + \frac{A}{Y} \frac{\partial Y}{\partial A} \frac{dA}{A}$$

记 $\beta_i = \frac{X_i}{Y} \frac{\partial Y}{\partial X_i}$ ， $\beta_0 = \frac{A}{Y} \frac{\partial Y}{\partial A} \frac{dA}{A}$ ，则上式可写为

$$\frac{dY}{Y} = \beta_1 \frac{dX_1}{X_1} + \beta_2 \frac{dX_2}{X_1} + \dots + \beta_k \frac{dX_k}{X_1} + \beta_0$$

该式的含义是：经济产出增长率等于各产业增长率与贡献度的积和，再加上制度的贡献度。

（二）计量模型设计和数据说明

^① [美]戴维·罗默：《高级宏观经济学》（英文版），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三章。

在上文中，我们主要考察了经济增长和人口因素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这里我们重点考察各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我们首先考察三大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然后考察细分行业对 GDP 的贡献率。上文分析表明，俄罗斯从工业化发展阶段直接跃入“后工业化”阶段，可能是工业化衰退的结果，同时也伴随着第三产业的低级化。因此我们的计量模型设计将工业分为采掘业和其他工业，主要考察低级工业对 GDP 的贡献度是否较高。对于第三产业，我们则将其区分为低端行业（包括批发与零售贸易、餐饮和旅馆业、交通和通讯业三个行业）和其他行业。

关于 GDP 的增长率和三次产业的增长率可以通过表 1 换算，样本区间为 1996 至 2010 年。关于细分行业的增长率数据，目前可得绝对额数据最早为 1999 年，故样本区间为 2000 至 2010 年。所有数据为经过物价指数平减的实际值。表 5 为细分行业的增长率数据。

表 5 细分行业产值增长率

时间	实际 GDP	农业	采掘业	其他工业	商业+餐饮旅馆 +交通通讯行业	其他服务业
2000	10.05%	12.68%	39.39%	24.16%	9.90%	2.51%
2001	5.09%	11.40%	5.02%	1.64%	4.41%	2.41%
2002	4.74%	2.91%	8.67%	1.16%	7.51%	2.72%
2003	9.18%	5.69%	20.65%	21.64%	7.08%	10.29%
2004	15.25%	2.91%	81.78%	31.87%	9.89%	8.96%
2005	14.38%	1.52%	46.11%	27.67%	6.95%	13.55%
2006	14.13%	4.60%	21.28%	21.43%	15.31%	16.77%
2007	9.96%	-1.92%	14.32%	25.87%	10.28%	14.54%
2008	10.00%	9.27%	15.28%	26.18%	10.10%	12.60%
2009	-13.57%	-8.01%	-9.74%	-19.56%	-19.86%	-0.07%
2010	5.40%	-10.67%	32.36%	21.17%	4.79%	-1.75%

资料来源：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www.gks.ru.

（三）计量结果及说明

表6给出了三次产业对GDP贡献度的回归结果。方程的拟合优度为0.997，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为0.996，三次产业的贡献度在99%的置信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常数项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整个方程在99%的置信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DW统计量为1.08，可能存在自相关性，但查表结果表明，虽然不能证明无自相关，但也不能判定是正自相关还是负自相关（这时的DW统计量属于不能判定的情况）。

根据上述各种检验结果，我们认为方程的拟合是可接受的。从方程的回归系数来看，俄罗斯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度最大，第二产业的贡献度次之，第一产业的

贡献度最小。值得注意的是，代表制度变量的常数项却为负数（尽管没有通过 t 检验并且值很小），这说明，当前的产业结构现状可能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表6 三次产业对GDP贡献度的回归结果

因变量: DGDP ^①				
方法: 最小二乘				
日期: 04/01/11 时间: 11:46				
样本: 1996 2010				
观察个数: 15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t统计量	概率
C ^②	-0.000323	0.001509	-0.213937	0.8345
DX1 ^③	0.081699	0.015155	5.391073	0.0002
DX2 ^④	0.353396	0.009778	36.14139	0.0000
DX3 ^⑤	0.555119	0.016571	33.49891	0.0000
R ²	0.997203	因变量均值		0.048976
调整的 R ²	0.996440	因变量标准差		0.075469
回归标准差	0.004503	赤池信息准则		-7.745145
残差平方和	0.000223	施瓦兹准则		-7.556332
对数似然比	62.08859	汉南-奎因准则		-7.747157
F统计量	1307.374	DW统计量		1.087124
相伴概率	0.000000			

表 7 给出了细分行业对 GDP 贡献度的回归结果。方程的拟合优度为 0.982，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为 0.964，采掘业、低端服务业、其他服务业通过 t 检验，常数项、农业、其他工业没有通过 t 检验，整个方程在 99%的置信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DW 统计量为 2.66，由于样本容量较小，DW 统计量并不能反映方程是否存在自相关。对此我们进行了 LM 检验，方程无自相关性。

根据上述各种检验结果，我们认为方程的拟合是可接受的。从方程的回归系数可以总结俄罗斯产业结构的三个特点：第一，第二产业内部，以能源为代表的采掘业对GDP的贡献高于其他工业。这一检验结果说明，除了制造业自身的退化造成俄罗斯直接进入所谓“后工业化”阶段，能源部门的过度发展更是加速了制造业部门的衰退^⑥。第二，第三产业内部，以批发与零售贸易、餐饮和旅馆业、交通和通讯业

① DGDP 表示 GDP 增长率，表 7 的 DGDP 含义相同。

② C 表示常数项，表 7 的 C 含义相同。

③ DX1 表示第一产业增长率，表 7 的 DX1 含义相同。

④ DX2 表示第二产业增长率。

⑤ DX3 表示第三产业增长率。

⑥ 郭晓琼：“关于俄罗斯是否患上‘荷兰病’的实证分析”，《俄罗斯研究》，2009 年第 5 期，第 91-101 页。该文不仅讨论了油价上升是否导致汇率上升，还探讨了能源部门过度发展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影响。结果表明，无论是从产值还是劳动力角度，俄罗斯都存在相对的“去工业化”现象。

为代表的低端服务业对GDP的贡献度高于其他服务业。这些低端服务业大都表现为消费性服务业，它们较少地参与再生产过程，因此整个经济的增长是粗放式的。实际上，由于制造业部门的萎缩，它引致的生产性服务业（如研发、商务、职业培训等服务）亦不能得到充分发展。^①第三，常数项表示的制度因素为负，这个方程给出了更为确切的原因。制造业部门因为激进式转型的历史原因长期萎缩，生产性服务业很难通过“迂回生产”的方式进入生产循环；工业的命脉转而系于能源行业，而能源定价权却不被本国掌控，由此导致的经济的大起大落严重损害了增长的可持续性。这样一种产业结构组合的直接表现，就是制度因素为负。

表7 细分行业对GDP贡献度的回归结果

因变量：DGDP				
方法：最小二乘				
日期：04/02/11 时间：00:32				
样本：2000 2010				
观察个数：11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t统计量	概率
C	-0.004893	0.008348	-0.586093	0.5833
DX1	0.065484	0.079316	0.825609	0.4466
DX2_1 ^②	0.097495	0.032588	2.991727	0.0304
DX2_2 ^③	0.044981	0.083913	0.536043	0.6149
DX3_1 ^④	0.505249	0.112052	4.509048	0.0063
DX3_2 ^⑤	0.235180	0.100377	2.342977	0.0661
R ²	0.982188	因变量均值		0.076918
调整的 R ²	0.964377	因变量标准差		0.079646
回归标准差	0.015033	赤池信息准则		-5.254740
残差平方和	0.001130	施瓦兹准则		-5.037706
对数似然比	34.90107	汉南-奎因准则		-5.391550
F统计量	55.14296	DW统计量		2.663807
相伴概率	0.000226			

① 郭晓琼：“俄罗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研究”，《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0年第3期。第45-50页。该文探讨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微观动因和宏观表现，运用投入产出表对俄罗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进行了国际比较分析。该文的分析结果更为清晰地表明俄罗斯的服务业发展是低级化的。

② DX2_1表示采掘行业增长率。

③ DX2_2表示其他工业增长率。

④ DX3_1表示批发与零售贸易、餐饮和旅馆业、交通和通讯业增长率。

⑤ DX3_2表示其他服务业增长率。

四、结论及启示

俄罗斯目前表现出“三、二、一”渐次递减的产业结构，对于这一产业结构是否合理，本文通过计量分析从需求面和供给面两个角度进行了深入考察，其结论是否定的。第一，俄罗斯的第三产业先于第二产业进入拐点，这有违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现实考察表明，制造业部门因为激进式转型大幅萎缩，而发展起来的服务业是以低端为主的。第二，关于细分行业对 GDP 贡献度的分析不仅印证了上述观点，而且能源贡献度的值较高，更是增加了产业结构不合理的证据。由于制造业不发达，同时能源定价权并不为俄罗斯所掌控，工业依靠能源发展的模式增加了经济的波动性。第三，从人口角度看，俄罗斯的产业结构也是不尽合理的。俄罗斯的农业是土地密集型，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人口因素在这两个产业中的规模报酬都是递增的（回归系数表明了这一点）。俄罗斯在人口长期下降的趋势下，却把人力资源配置在收益最低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上，这更加剧了产业结构的不合理。

尽管分析结果表明俄罗斯目前的产业结构并不合理，但从其演进趋势来看，它又表现出与其他国家产业结构变动相一致的地方，即第一、二产业占比表现出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第三产业占比表现出先减少后增加的趋势。动态模拟的结果表明俄罗斯第三产业的发展较第二产业先进入拐点，这是与其他国家产业结构变动相比表现的特殊之处。导致这一特殊性的主要原因包括：转型时期军工企业大面积停产使得第二产业产值迅速下滑，居民消费服务业因过去被压抑的需求获得释放而迅速崛起，本文提及的实际货币余额减少导致的制造业投资不足和消费性服务业投资过多。此后由于经济增长的需要，能源和原材料行业因其自身禀赋成为主要贡献者，而至此形成的“看似优化、实则畸形”的产业结构模式很难发生改变。

俄罗斯的产业结构案例是一面镜子，以下三点值得中国借鉴与警惕：

第一，转型的经验教训。转型的方式有“激进式”和“渐进式”之分，从目前实践经验看，“渐进式”转型是成功的。这除了教科书中所说的转型“可逆成本较低”、“逐渐获取信息”等原因外，我们从俄罗斯产业结构的案例中学习到的还是“稳定大于一切”的思想。俄罗斯产业结构的衰退，实际上是过早地“分蛋糕”而没有“做大蛋糕”。证券私有化导致了用于投资的实际货币余额大量减少，这对于需要巨大资本的工业是致命的，而拥有较长生产链条和较高效率的工业对经济的贡献度则很高。“稳定大于一切”的作用在于保证了做大蛋糕的基础，尤其是保证了资本积累的可持续性，这正是增量改革的意义所在。

第二，发展的现实国情。各国的经济发展都应选择与本国资源禀赋、制度环境相适应的道路。俄罗斯在产业结构的人口配置安排上，将重点放在低端服务业上，

这显然是无视整个俄罗斯人口呈下降趋势的国情。俄罗斯改革的另一个失败案例是农业改革。对于俄罗斯农业而言，土地资源是丰富的，与之相伴随的是农业机械化大生产，俄罗斯集体农庄的解体直接造成了资本分割，农产品产量下降。因此，在农业机械并未实现专业化外包服务的前提下，当时俄罗斯的农业改革应着重改善集体农庄的激励机制，解决“吃大锅饭”的问题。

第三，产业结构合理也是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传统经济安全观大都针对单一门类产品并基于重要性原则，如粮食安全、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等。俄罗斯产业结构的失败案例告诉我们，经济安全观还应针对系统并基于协调性原则。在全球化的今天，各国经济都与外界保持着紧密联系，任何事件造成的产品扰动都可能传导至国内并产生系统性影响，这就要求国内的产业结构合理，其目标是满足人民最终消费并能够有效满足社会大生产的再循环。在一定意义上，如果全球治理是好的，甚至能创造出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那么基于国家层面的经济安全考虑是没有必要，各国完全可以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参与国际分工。实际上许多国家并不认同上述观点，美国甚至在这次危机后提出了“再工业化”的观点，其目的并不在于恢复传统制造业，而在于加快传统产业的科技创新，以改变金融过度发展导致的“产业空心化”。

【Abstract】 It is a long-term concern for the economics on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s of Russia can be described by Chenery's evolution model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which also serves as an explanation to the fact that tertiary industry comes to the inflexion earlier than secondary industry does in Russia. Meanwhile the industrial decomposition model can be applied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o Russian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the integrated empirical analyses of the two approaches, the conclusion can be drawn on the problems facing Russian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necessary enlightenment can be attained as well.

【Key Words】 Russia, industrial structure, economic growth,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Аннотация】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между промышленной структурой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м ростом всегда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особый интерес для экономистов. Используя модель эволюции промышленной структуры Ченери, можно описать изменения в структуре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России, а также объяснить причинного того, что в России сфера услуг раньше вторичных отраслей достигла поворотного момента; используя модель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разложения, можно рассмотреть воздействие

промышленной структуры н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рост в России. На эмпирической основе комплексного анализа двух аспектов можно обобщить проблемы, стоящие перед промышленной структурой в России, а также получить необходимые послания для дальнейш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оссия, промышлен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рост,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责任编辑 封帅)

俄罗斯大事记

(2011年3-4月)

3月

- 1日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Sergei Lavrov) 在日内瓦举行的裁军会议上表示, 中东最近发生的事件表明, 在该地区建立一个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的紧迫性正在上升。
- 2日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 (Dmitry Medvedev) 祝贺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 (Mikhail Gorbachev) 80岁寿辰, 并就其重大贡献向其授予象征俄罗斯最高荣誉的“圣安德烈 (St Andrew) 勋章”。总理普京也在贺词中将巴尔戈乔夫列为现代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之一。
- 3日 俄罗斯庆祝废除农奴制 150周年。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指出, 废除农奴制法令的签署是 19世纪俄罗斯历史的转折点。
俄罗斯总理普京会见独联体执行秘书列别杰夫 (Sergei Lebedev) 时表示, 进一步加强与独联体国家的关系是俄罗斯的优先任务。
- 4日 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部长绍伊古 (Sergei Shoigu) 宣布俄向位于突尼斯和埃及边界的利比亚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 5日 车臣议会召开紧急会议, 一致同意现任共和国总统卡德罗夫 (Ramzan Kadyrov) 连任。
- 6日 俄罗斯赫尔辛基小组 (Moscow Helsinki Group) 领导人柳德米拉·阿列克谢耶娃 (Liudmila Alexeeva) 指责西方因为对俄罗斯能源资源的依赖而不敢就人权问题批评莫斯科。
- 7日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了议会通过的结束 68种罪行的监禁和准许法庭在判罚上更为灵活的联邦法律。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称, 俄认为谴责利比亚国内针对民众的暴力行为是有必要的。
- 8日 在重启俄罗斯世贸组织成员资格谈判的前夜, 格鲁吉亚官员重申, 其条件为俄罗斯首先承认格鲁吉亚对俄罗斯与阿布哈兹 (Abkhazia) 及南奥塞梯 (South Ossetia) 交界处边检站的控制权。
- 9日 俄罗斯总理普京命令能源部长考虑建立新的液化天然气工厂作为南溪项目一部分的可能性。
- 10日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禁止向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出口武器的法令。
- 11日 俄罗斯紧急情况部称, 俄罗斯已经准备就绪向受地震和海啸侵袭的日本直接或通过联合国渠道提供帮助。同时还表示, 2010年建成的保护千岛群岛的海啸早期预警机制能够在9分钟内启动, 可以让一万一千人撤离危险区。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支持非盟关于不与利比亚政府进行军事对抗的决定。
- 13日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称, 如果第比利斯继续坚持其政治化的立场, 俄罗斯可能在没有格鲁吉亚同意的情况下成功加入世贸组织。
- 14日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法令, 禁止利比亚总统卡扎菲 (Omar Mouammer al Gaddafi)、其最高级别的副手和亲属进入或经过俄罗斯。
- 15日 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签署关于建设白俄罗斯第一座核电站的协议。该核电站位于临近立陶宛边境的格罗德诺 (Grodno) 地区, 将于 2018年开始运营。
- 16日 俄罗斯总理普京在欧亚经济共同体国家间委员会会议以及俄白联盟国家部长理事会会议结束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 如果乌克兰就加入关税同盟问题开始与有关国家谈判, 俄罗斯将表示欢迎。
- 17日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俄罗斯—土耳其合作委员会致辞时强调了 this 成立仅一年的委员

会的益处。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Recep Erdogan）则宣布，两国将从四月起开始实行互免签证的制度。

- 19日 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俄罗斯 1 台在计划之外播出了关于西方联盟在利比亚行动的新闻简报，其中俄外交部长谴责了联盟的行动，并敦促利比亚各方尽最大努力避免民众伤亡和尽快结束暴力。
- 20日 俄罗斯总理普京称，俄罗斯已准备好中长期项目，可帮助日本克服电力短缺。
- 24日 俄罗斯公众健康机构禁止来自日本四个地区的农产品的进口。
- 25日 俄罗斯驻白俄罗斯大使称，俄罗斯的贷款是有条件的，白俄罗斯需要在 10 至 12 天内起草经济改革的计划。
- 26日 俄常驻北约代表罗戈津（Dmitry Rogozin）称，联军在利比亚的地面行动将会被视为占领。
- 27日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总裁基里延科（Sergei Kirienko）称，没有核能源的俄罗斯没有未来；核能源对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 28日 全国人口普查的初步结果显示，俄罗斯在过去八年里减少了 2200 万居民。
俄罗斯总统阿富汗事务特使卡布洛夫（Zamir Kabulov）称，俄准备向阿富汗捐赠 3 架直升机，但没有供应其他武器的计划；俄也有可能投资阿富汗的能源项目。
- 29日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支持成立利比亚问题国际联络小组的想法。
- 30日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通过了 2011 至 2016 年禁毒战略。
俄罗斯总统助理德沃尔科维奇（Arkadi Dvorkovich）向公众列举了已被通知离开国有公司董事会的各位部长的名单。
- 31日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了核准对俄罗斯境内主要管道的“无差别使用权”的法令。

4 月

- 1日 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合资成立的企业 GazPromNeft-Aero-Kyrgyzstan 开始为玛纳斯(Manas)机场的美国转运中心提供燃料。
- 2日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重申，所有部长和总统办公厅官员均应在 10 月 1 日前离开国有资产公司的董事会。
- 4日 俄罗斯总理普京称，俄罗斯的失业人数正在下降。他将会为失业人员的社会需求拨款 1050 亿卢布（约合 37.1 亿美元）。
- 5日 俄罗斯外交部呼吁科特迪瓦冲突双方立即停止流血冲突。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不排除从科特迪瓦疏散俄罗斯公民的可能性。
- 6日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证实，俄罗斯不会参与调解北非局势的军事行动，但将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此前已经通过的决议。
- 7日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Abdallah II）在莫斯科与俄总统梅德韦杰夫进行会晤，讨论了经济、军事和投资合作以及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等问题。
俄罗斯和美国同意在本年底向阿富汗交付总价值为 3.675 亿美元的 21 架米—17 俄罗斯军用直升机。
- 8日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法律，正式批准俄罗斯和挪威 2010 年 9 月 15 日在摩尔曼斯克签订的关于海洋划界以及在巴伦支海和北冰洋合作的协议。
俄罗斯总理普京称，俄罗斯在没有成为世贸组织成员之前不会遵守该组织规则，这与俄经济发展部副部长克列帕奇（Andrei Klepach）的说法相矛盾。
- 10日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与波兰总统科莫罗夫斯基（Bronislaw Komorowski）出席了波兰前总统卡钦斯基和波兰代表团在斯摩棱斯克（Smolensk）遭遇空难一周年的悼念仪式。
- 11日 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兼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祖布科夫（Viktor Zubkov）

称，总统梅德韦杰夫和总理普京将会亲自挑选新董事会候选人。俄罗斯副总理谢钦（Igor Sechin）辞去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董事会主席一职；他的职权将由俄罗斯科学院副院长涅基佩洛夫（Alexandr Nekipelov）暂代。

- 12 日 俄罗斯总理普京在与乌克兰总理阿扎罗夫（Mykola Azarov）会面时称，乌克兰加入俄白哈关税同盟后，每年能获益 65 亿至 90 亿美元。
- 13 日 俄罗斯总理普京否认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同意重新考虑天然气定价原则。普京称，已生效的合同应予执行，但俄做好了研究任何声称数字不准确的准备。
欧洲委员会会议代表大会俄罗斯代表团邀请格鲁吉亚代表重新开始因 2008 年南奥塞梯事件而中止的对话。
- 14 日 包括俄罗斯在内的金砖五国领导人在中国三亚进行会晤时就中东和西北非的动乱发表了拒绝使用武力解决地区争端的声明。
- 15 日 俄罗斯总理普京鼓励统一俄罗斯党加强党内竞争，以成功应对与其他公共组织和政党的竞争。
- 18 日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总裁米勒（Alexei Miller）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天然气协议都是在完全的市场透明条件下确立的，俄拒绝任何修改或取消现有协议的想法。
- 20 日 俄罗斯总理普京称，政府不会介入秋明—英国石油公司（TNK-BP）的内部矛盾，如果存在问题，也应以法律方式解决。
- 21 日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警告说，在利比亚进行地面军事行动的外国部队可能面临“非常危险和完全难以预料的后果”。
俄罗斯总理普京额外拨款 4200 亿卢布（约合 150 亿美元）用于多种形式的社会援助。
- 22 日 俄罗斯正式批准与南奥塞梯的免签证旅游协议，该协议允许没有俄罗斯国籍的人员进入俄罗斯联邦。
- 24 日 上海合作组织（SCO）成员国国防部长在北京会晤时承诺加强相互间的军事关系以及国防和安全合作。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与利比亚总理马哈茂迪（al-Mahmudi）的电话交谈中，呼吁利比亚政府停止对平民的军事袭击，并称在此基础上，俄罗斯做好了帮助非盟和联合国使利比亚局势重返政治—外交轨道的准备。
- 25 日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告诉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秘书长葛利亚（Angel Gurría），俄罗斯很快将会加入经合组织和世贸组织。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称，俄罗斯坚持必须严格遵守联合国安理会对利比亚的决议，并认为北约的空袭没有经过联合国认可。
- 27 日 俄罗斯总检察长尤里·柴卡（Yuri Chayka）称，北高加索仍是俄罗斯境内恐怖威胁的主要发源地，接近 80% 与恐怖主义有关的犯罪都发生在那里。
- 28 日 俄罗斯能源部副部长库德里亚绍夫（Sergei Kudriashov）称，国家控制石油产品价格的可能性已被排除。
俄罗斯外交部在回应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主管阿什顿（Catherine Ashton）对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 4 月 25 至 26 日访问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所表达的关注时，呼吁欧盟对南高加索的局势持更为现实的态度，因为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的独立是不可逆转的。
- 30 日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发文重申俄罗斯对 4 月 29 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关于叙利亚局势的决议的不满，称这并没有代表近一半成员国的意见。

（胡彦 辑）

俄罗斯研究 (双月刊)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RUSSIAN STUDIES

2011年第3期

(总第169期)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致本刊读者与作者

《俄罗斯研究》自创刊以来,一直得到广大读者和作者的热情关心和大力支持。正是由于这种关心和支持,十几年来,《俄罗斯研究》获得了坚实的进步与发展。编辑部对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近年来,在世界形势发生广泛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的俄罗斯问题和相关领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长足的进展,这对我们办好刊物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本着办刊宗旨,《俄罗斯研究》将一如既往地关心国际形势和俄罗斯问题的各方面人士提供切实、有效的服务。作为核心学术期刊,《俄罗斯研究》将努力把自己打造成体现我国俄罗斯问题和相关领域研究成果和水平的重要平台之一,为推进我国的俄罗斯问题和相关领域的研究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此外,为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相互了解和沟通,《俄罗斯研究》还将把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作为工作的一个重要目标。

为了与我国俄罗斯问题和相关领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相适应,《俄罗斯研究》除了继续关注重点放在俄罗斯现状以外,还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空间,栏目设置也将更加多元。

《俄罗斯研究》热忱欢迎广大俄罗斯问题研究者、各方面学者专家继续关心和支持本刊工作,不吝赐稿。

《俄罗斯研究》热忱欢迎广大读者和作者继续对本刊提供批评意见和建议,以帮助我们不断改进工作。

(赐稿者如需了解本刊的有关规范,请登录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网站 <http://www.rus.org.cn>, 查阅“最新期刊”栏目中的“《俄罗斯研究》投稿须知”。)

主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 021-62233816 021-62232113

排版: 俄罗斯研究中心电脑室

印刷: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发行: 本刊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电子信箱: russiastudies@163.net

网络电子版代理: 龙源期刊网

网址: www.qikan.com www.qikan.com.cn

· 公开发行 ·

定价: 12.00 元